

理论与实践

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性月刊

2

1958



目 录

广东省发展农业生产的远景	张根生 (1)
試論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 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	何国文 (6)
怎样贯彻社会主义教育方针	阮鏡清 (12)
坚持勤俭办学，加强劳动教育 ——学习長葛县第三中学、仁怀县群力农场业余初級中学 的办学經驗	黄焕秋 (16)
苏联的教育制度和成就	汪德亮 (19)
孙中山在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斗争中的历史地位	H. F. 謝宁 (25)
关于陈白沙的哲学思想問題	章 沛 (34)
关于譬諭	杜守素 (42)
释龟蛇	秦 牧 (44)
百年前广州絲織工人的生活情况 及其参加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史料	胡希明 (47)
1898—1899年广东遂溪人民反抗法帝国主义 侵略广州灣地区的斗争(續完)	(51)

动 态

“毛道乡黎族合亩社会調查报告”即将出版
广东省的瑶族社会調查工作
去年广州发现古墓百余座
广东省1958—1962年科学工作规划在編制中

广东省发展农业生产的远景

張根生

目前，广东省已經掀起空前未有的生产大高潮，1,500万人的劳动大軍正在热火朝天地投入兴修水利、积肥和改良土壤运动，城市的数万机关干部也已陸續下放，支援农业生产，整个农村出现了蓬蓬勃勃的新气象。在这时候，具体分析一下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性，概括地說明广东省农业生产发展的远景以及广东省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和有利条件等等問題，对当前的实践，有重要的意义。

我們知道，解放以后，我們国家的工作最初几年主要是着重于經濟的恢复和社会制度的改革，在这一方面曾取得了巨大的成績。1953年开始了社会主义經濟建設，到1957年底止，已胜利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計劃，工业增長了130%，这是我国历史上工业发展从来没有过的速度。农业方面虽然因为1954年和1956年这两年全国有許多地方鬧水灾，收成受了影响，計算起来，五年当中，只有两年丰收，一个平年偏丰，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們的粮食还增产了20%，农副业总产值則增加25%以上，这也是个很大的胜利。可是，拿工业发展的速度比較起来，显然，农业生产是相对地落后了。农业生产相对落后，使得原料和粮食跟不上国家工业发展的需要，这样下去，就要影响工业建設的速度，影响工业产品市场的广阔发展。特别要考虑到象我們这样原来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工业的发展更离不开农业的发展。农业支援工业，工业的发展又促进农业

的发展，互相配合，互相促进。农业发展的快，工业也就可以更快的发展。农业发展慢，也就直接影响到工业的发展，几年来的事实看得很清楚，1954年長江流域大水灾，农业减产，便影响到1955年工业建設的速度；1955年农业大丰收，1956年工业也就有一个大跃进；1956年国内又有部分省份严重受灾，一部分經濟作物因灾减产，1957年的工业建設，从而也受了影响，这充分說明工农业的密切关系。这是由于发展工业的原料和資金都是和农业生产的发展有直接关系的。农业不仅为国家提供了农业稅，而更重要的是可以大量提供輕工业原料。輕工业投資較少，积累資金較快。如建立糖厂，投資后一年或二年就可拿回原本。我們广东的工业更主要是輕工业、食品工业，70%的原料来自农业，因此，对这一点有更深刻的体会。輕工业不仅可以直接积累資金，而且在稅收上亦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輕工业产品。因此，实际上国家財政收入中有一半左右都是和农业生产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的。发展重工业是我們建設的重点，投資也应该占最大比重，但其本身資金周轉較慢；特别是现在发展重工业的資金，必須靠农业和輕工业支持。所以，农业发展的快，資金积累就快，也就可以保証重工业更快的发展。加以我国建設需要的一些工业器材，还要从外国进口，因此，就必须出口一部分物資来換取外汇，而出口的商品中农产品也占主要的比重。从积累工业資金，供应工业原料，发展工业产品

的銷售市場和提供外匯等方面，都說明發展農業的重要意義。

我國是一個6億多人口的大國，這6億多人的吃飯穿衣，就是大問題。別的差一點還可以，可是飯總得吃飽，衣服總得够穿才行，而且應該逐步有所提高，吃穿都和農業生產有直接關係，所以吃飯穿衣問題就是農業問題。不發展農業，吃飯穿衣，從那裏來？現在的6億多人要吃要穿，這是一個問題。但人口還在源源的增加，差不多每年增加1,000多萬人口。1953年，我國統計有6億人口，現在，據估計，可能已增加到6億幾千萬了。人口增多，自然，要吃和要穿的東西也要隨着增加。要保證人口增多所帶來的吃穿需要，一個辦法是：降低每一個人的吃、穿定量，但這不是可行的辦法。好的和可行的辦法，應該是：發展農業生產，增加棉花和糧食的產量。我們還要求逐步把生活改善一點，穿得好一點，吃得好一點。隨着國家經濟建設的大規模進行，國家投資多，人民的收入增加，購買力也不斷在增長。如廣東省現在決定第二個五年計劃撥出3億元以上來興修水利，這筆款的一部分固然要用之于購買鋼筋水泥，但比較起來，數量不大，最大的數量還是購買本地的器材和工資的支出等，那就增加了人民的收入。人民收入增加，自然要求逐步改善自己的生活，這是正當的。問題是：如果不發展農業生產，生活的改善，便沒有可靠的物質基礎。因此，從解決人民的生活需要上說，亦要求我們進一步發展農業生產。

中共中央提出第二個五年計劃建設方針是：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基礎上、發展工業和發展農業同時並舉。這一方針，是根據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建設經驗和我國的經濟情況提出的，和第一個五年計劃對比起來，就是要在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實施期間，更要加強農業的建設，更快地發展農業生產。自然，重工業是基礎，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是不能動搖的；明確提出發展工業和發展農業同

時並舉，是完全符合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情況的。這樣不但不會影響工業化速度，而其結果可能使工業發展得更快一些。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國家投資於農業的數字也將有所增加。為了貫徹中央的方針，加強農業的領導，我們廣東省已經確定，第二個五年計劃，以至第三個五年計劃都繼續以發展農業為重點。

為了根本改變我國的農業面貌，使在過渡時期，不僅建立起現代化的工業，而且建立起現代化的農業，1956年1月中共中央提出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同年7月，中共廣東省第一屆黨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討論通過了“廣東省7年農業建設規劃（草案）”，1957年10月中共中央公布“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廣東省委根據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的要求結合廣東省的實際情況和兩年來的實踐經驗，經過修改補充，擬訂出了“廣東省1956年到1967年農業建設規劃（修正草案）”，這一規劃，在中共廣東省第一屆黨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已經討論通過，現正提交全省人民結合討論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進行討論，準備再作修改，在今年省人民代表大會討論通過，作為正式規劃。從廣東省12年農業建設規劃的內容來看，這是一個極為宏偉的計劃，是一個具有革命精神的大躍進的計劃。實現這個規劃，廣東省農業生產就會高速度的發展。對支援工業建設，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都將發生巨大作用。實際就是廣東省建設社會主義農業的成功。

廣東省農業建設規劃要求糧食產量，由1955年每畝平均440斤，到1967年提高至900斤，總產量由218億斤，增加到432億斤以上，中共廣東省黨代表大會討論通過這一規劃時，還決議爭取1962年達到800斤，提前5年實現全國農業綱要，爭取1967年達到千斤省，總產量達到480億斤；經濟作物由現有的700萬畝（內多年生的占300多萬畝），發展到2,600萬畝，主要的作物甘蔗將增加

5倍多，蚕桑增加10几倍，各种水果也都有几倍或10几倍的增加；畜牧、水产业也将有大发展，生猪由现有年存量的300万头发展到3,000万头，全年饲养量则达到4,500万头，水产由1955年的年产52万吨发展到250万吨。全省要完成绿化，消灭水、旱、虫等自然灾害，农业生产逐步走上机械化，建立起四通八达的水陆运输网，基本消灭四害，基本消灭文盲，普及小学义务教育。这个规划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十分美好的远景，到那时，我们广东农村将会是一个幸福的社会主义农村，按产量来计算，粮食，每人将平均达到1,000斤；糖，每人平均100斤；猪，每人平均一头；鱼，每人平均100斤；果树，每人平均几十棵；森林，每人平均3亩，这也就是我们广东人民世代向往的真正鱼米之乡，水果之乡，产糖之乡，森林之乡了。到那时，我们就可以把更多的物资供应全国人民需要。我国工业主要指标要在15年内赶上并超过英国，到那时，只广东一省的食糖产量，就可以超过英国一、二倍以上。而农业生产的大发展大跃进，也必然会促进工业的大发展，整个广东的经济建设事业就焕然一新了。

无疑的，这一伟大规划的实现，也将给我们科学研究工作开辟更宽广的境域，通过实际的生产建设，必然会大大充实和丰富理论研究的内容，科学研究的进步也将更迅速的推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保证农业规划的实现，是全省3,000多万人民中每一个人，所有机关学校企业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干部都应尽的责任，科学研究部门也应该积极的投入这一斗争，为实现这一伟大规划而尽一份力量。当然，我们发展农业生产，也要有明确的重点，规划虽然是36条，但着重点是第二条和第三条，特别是第二条，即发展粮食生产问题。一切都围绕这一条。因为粮食是每一个人每天都需要的，我国有6亿多人口，只要每人每年多吃10斤粮食，就是60亿多斤，这数字是惊人的。目前我国粮食供应的紧张情况还没有完全解决，人口正在逐日增多，

尤其我们广东省的人口增长速度比国内许多省份都高，全国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2%，而广东差不多是2.5%，有个别的乡还高达5%。现在，广东省是3,800万人，到1967年预计可能达到4,700多万，人口增长这样快，特别是人们生活的改善，对粮食要求也就要增加，因此，不大力增加粮食，就不能适应人民的需求。过去，曾经有人提出广东适合发展经济作物，应该少种粮食多发展经济作物来增加收入，让别的省多种粮食来供给我们，殊不知别的省也是适合种经济作物的，如棉花、烟等就都是北方种的，如果大家都只为了收入多，而不愿种粮食，那不就成了大问题。因此那种只强调发展经济作物而轻视粮食生产的观点和作法，显然是错误的。当然，经济作物也是需要发展的。经济作物为国家工业所需要，出口价值很大，广东自然条件很适合发展热带、亚热带作物，因之必须在优先发展粮食的同时，积极发展经济作物。既要发展粮食，又要发展经济作物，这有一定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扩大土地耕植面积，就是说：去开荒。现在，广东省有5,700万亩耕地，其中有4,800万亩种粮食（另有约200万亩是社员自留地不计在内）。这4,800万亩是不能减少的，而且要逐步调整为最好的田地，但也不准备再扩大很多，主要是要努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扩大经济作物面积，当然只有靠开荒来解决，10年后，广东省准备发展到2,600万亩，即增开荒地1,900万亩（包括向山区、丘陵发展），全用于种植经济作物，土地不够的问题就解决了。另一个办法是：提高经济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这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广东省的经济作物单位面积产量还很低，一般的都比粮食产量提高的慢。如花生，湖北省红安县亩产达600斤，还提出要在今年达到1,000斤，但广东省的花生亩产量平均只有100斤多一点，简直不能相比。甘蔗、黄麻等产量也提高的不够快，这一方面说明过去我们对此注意不

够，另一方面说明潜力还很大，只要重视和努力，就可以迅速的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广东省特别适宜于种植亚热带的经济作物，我们必须更加重视发展甘蔗、蚕桑、水果、油茶以及热带作物的橡胶、油棕、香料等生产。为了有计划的发展生产，不发生和粮食争地的矛盾，应作全面的安排，如增加甘蔗，主要安排在海南岛及雷州半岛，这就不会侵占珠江三角洲和韩江三角洲的高产稻田，今后建糖厂都要去那里建。果树、蚕桑和茶等则主要向山上和丘陵发展。

广东省地处亚热带，气候温和，雨量充足，还有不少荒地和丘陵山岗可以开垦利用，同时有足够的农村劳动力，对发展农业生产也积聚了很多精耕细作的经验，特别重要的，是广东农村已经实现合作化。合作社的集体生产对小农经济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1955年冬到1956年春，合作社刚办起来，问题还很多，实际是一手办社，一手生产，但农业生产还是取得了空前未有的成绩：修了1,000万亩水利，积了20多亿担肥料，使1956年增产粮食达20亿斤，该年还出现了6个粮食千斤县、592个千斤乡、3,669个千斤社。1957年又出现了化县那鄗社二造亩产2,663斤稻谷和惠阳县群星社二造亩产2,325斤稻谷的高额丰产田，澄海县也出现了3,000斤（包括甘薯折谷部分）以上的大面积丰产田。此外，如甘薯也出现了潮安县东光社平均亩产20,000斤、最高产量亩产29,000斤的纪录，蚕桑出现了南海县五星社平均亩产7,290斤桑叶的纪录，塘鱼出现了中山县小榄镇郊农业社平均亩产743斤、最高亩产1,954斤的纪录，养猪最多的乐昌大富社已经达到平均每户13头。现在全省合作社的基础比过去有了进一步的巩固，特别是经过最近几个月的社会主义教育和民主整社运动，社会主义制度在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已经取得更巩固的绝对优势，合作社的公共积累增加了，管理工作也改进了许多，尤其在最近冬季生产中取得的巨大成绩，更充分显示了合作化的优

越性，因此，实现这一规划，不仅有可能，并且完全可以提前实现。

而且，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我国工业化的进行，工业方面将更大的支援农业，如化学肥料，我国已能大量制造，广州市今年正建设一个年产50,000吨合成铵（可制硫酸铵20万吨）的大化学肥料厂，湛江也要建一个年产20万吨的磷肥厂，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时，广东省就可以年产120万吨以上的化学肥料，全国将可以年产1,500—2,000万吨以上的化学肥料，以一斤化学肥料可以提高粮食产量3—5斤计，2,000万吨化学肥料所起的作用多么大，谁都能把这惊人的数字计算出来。科学技术方面，也将为农业培养出大批的农业专家和技术人员，并且在培育优良品种，创造新的栽培技术，改良土壤，消灭病虫害方面，更好的为农业服务。还有，全省正在大修水利，最初各地只计划在去冬今春修水利550万亩，经过反对右倾思想，提高到了1,000万亩，现在又提高到了2,600万亩，超过过去8年所修水利的总和，而且在质量上也比过去好得多，其中受益10,000亩以上的重点工程，就有248宗。据水利部门说，解放前全省只有一宗这样大的工程，解放后8年来也只修了140宗。最近一个多月完成的面积，已达1,400多万亩，比去年一年修的还多二倍。全省并已确定要在今明两年内争取全部消灭旱灾（抗旱能力初步达到40天以上）。因此，我们对实现和提前实现这一大跃进的计划是完全有信心。

去年12月在中共广东省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在讨论这一规划时，不仅具有充分的信心，而且一致认为还可以更提前一些，因此决定在1962年达到700斤争取800斤，1967年争取1,000斤，最近经过全省各地农民展开讨论，积极性更加高涨，各地纷纷提出竞赛，要提前实现农业纲要，今年就已经有33个县（市）计划达到800斤和800斤以上，其中千斤县可能达到12个以上，因而

全省完全可以保證提前5年實現農業綱要，即要在1962年保證達到800斤並有可能實現1,000斤的畝產量。其他方面也在飛躍發展，如綠化造林、消滅水災、消滅四害等也都在爭取而且完全可能在5年內實現。自然，我們也認識到，這是一個極為躍進的計劃，實現這一計劃，是會碰到很多困難的。每一斤糧食，每一斤糖，每一棵樹木都要用勞動去換取。但是，如上面所說的，我們有充分的條件，也已經有許多地方做出了榜樣，因此只要能夠徹底克服各種右傾保守思想，拿出革命的英雄氣概，苦戰三年、五年，就能夠戰勝任何困難。蘇聯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時，比我們今天遇到的困難要大得多，但他們完全克服了困難，建成了人類最理想的社

會主義社會，這也充分證明社會主義制度是有無比的優越性。今天，我們比之蘇聯當時的條件好了許多，有了蘇聯的榜樣，所以只要我們堅決相信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認真地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是一定可以更快建成社會主義的。我們過去發展農業生產的工作雖有很大的進步，但進步是無止境的，為了我們今后的幸福生活，為了我們子孫萬代的幸福，我們應該進一步認識發展農業生產的重要意義，立即行動起來，以戰鬥的精神，頑強的意志，愚公移山的毅力，堅決地向右傾保守思想做鬥爭，向一切困難做鬥爭，實現我國歷史上從來未有過的農業生產發展計劃，做出我們前人連做夢也不敢想的偉大的豪邁的事業。

“毛道鄉黎族合畝社會調查報告”即將出版

廣東省少數民族社會歷史情況調查組，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民族委員會與地方黨政的直接領導下，成立了海南分組和連南分組，分別就海南黎族和連南瑤族的社會歷史情況，進行了前後共兩期的調查。海南分組共調查了保亭縣毛道鄉七個村、雅袁六個村、毛枝大村、樂東縣番陽鄉、白沙縣毛貫鄉等六個點；另外還在瓊中、保亭、樂東、東方、白沙各縣收集了碑刻、歷史傳說以及黎族合畝社會的有關情況的資料，調查了黎族的社會生產力、社會所有制和階級情況等許多具體的資料。海南分組已將第一期對毛道七個村、雅袁六個村、毛枝大村三個點的調查綜合材料付印，並根據這三個綜

合材料，進行分析研究後寫成“毛道鄉黎族合畝社會調查報告”，提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民族委員會於去年3月間召開的第一次會報會議討論，這個報告稍事修正後即可公開出版。這些資料對於民族工作和研究工作，都是很必需的。

海南分組在調查工作中，收集了新石器七十多件，服飾、生產工具八十多件，其中東方美孚黎的制棉、紡紗、繅花染色、織布的全部工具都收集齊全，還有銅鑼六個、刻竹契約等，均已一併交由中央民族學院保藏。這些文物對於科學研究工作是有相當參考價值的。

（易謀遠）

試論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 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針

何 国 文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和超额完成，使我国工农业生产都有了很大发展，但农业的发展，同人民生活的需要以及国家建设的需要比较起来，同工业的发展比较起来，还是落后了一步。因此，在即将开始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党中央为了进一步发展农业，提出了“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針。

贯彻这个方針，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正确道路。为了实现工业化，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針；而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方針的提出，主要是加强农业的发展，使农业在发展中彼此衔接得更好，以保证国家建设的不断扩大和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从而保证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建設方針得到更好的贯彻。优先发展重工业与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是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間，发展国民經济总方針的不可分割的两个組成部分。

一、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 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針

中国共产党领导我国人民进行革命，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建成共产主义。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罪恶統治之后，立即便开始了国民經济的恢复工作，1953年又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争取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以便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在我们这样一个落后的大农业国中，过渡时期的任务，在生产关系的变革方面，是要消灭剝削，把私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在經济建設方面，则要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以便建立巩固的国防、满足人民需要和对整个国民經济各物質生产部門进行根本性的技术改造，建立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經济制度的物質基础。

我們在經济建設方面，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針，集中主要力量搞重工业建設，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間，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有些人认为我国现在建設社会主义，与苏联当年的环境和条件不同，我們不仅不是四面受敌孤立奋斗，而且还有工业发达的强大的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和我們站在一起，因此，我們可以不必集中主要力量来搞重工业，可以多搞一些輕工业，以更多的消費品来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甚至认为可以由苏联多发展重工业，我們則多搞輕工业，这样来实行“国际分工”。所有这些論調，在我们中国的具体情况下，都是极端錯誤的。无疑，我們现在搞社会主义建設，和苏联当年的条件比较起来，是有利得多了，但帝国主义侵略的威脅仍然存在，美英帝国主义就一直在叫嚣着要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并且实际上也曾发动了侵略战争，只是由于我們的力量强大，美帝才不得被迫在朝鮮停战，才不敢再輕易发动侵略战争。如果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缺乏警惕，就会犯大錯誤。只有积极地发展重工业，加强我們的国防力量，和平才有保证。我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人口众多，需要极大，完全有足够的条件而且有必要迅速在本国建立起完整的强大的工业体系，只有这样，才能迅速地把我国国民經济从技术极端落后的状况彻底地改变过来。无论从加强整个社会主义陣营力量的观点出发，或从我国国民經济全面改造的观点出发，都必须在我国迅速建立一个强大的完整的工业体系，特别要迅速发展重工业。我們并不反对社会主义陣营内部的国际分工。我国与东欧某些人民民主国家的具体情况不同，东欧某些人民民主国家，例如阿尔巴尼亚等，她們面积小，資源不全面，如果在一个小国内，在进行工业化时，一定要迅速建立一个以重工业为核心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就会有許多困难。这不仅因为国家小，

人民負擔太重，而且因資源不全面，原料特別成問題。如匈牙利建立了許多大規模的機器製造工廠，但匈牙利的礦產資源除鋁的蘊藏量比較豐富外，煤和鐵都比較少，因此缺乏鋼鐵，要依靠進口，這就會造成許多困難。所以，東歐某些具有這樣情況的人民民主國家，就有必要根據本國所擁有的資源的實際情況，優先發展在本國有利於發展各種工業，不一定強調要建立完整的工業體系，有某些特定條件的個別國家甚至也不一定強調優先發展重工業。由於社會主義陣營各國基於兄弟般互助和平等互利的經濟合作與合理的分工，不僅不會削弱各國的經濟發展，反而因各國更合理更節約地從事經濟建設而得到更好的發展，從而導致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經濟的全面高漲。我國無論在各方面，都具備了迅速建立起一個以重工業為核心的完整的工業體系的足夠條件。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由於執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的結果，重工業的發展速度大大地超過了整個工業的發展速度，在五年內，我國的生產資料工業產值增長了兩倍左右，平均每年增長24%以上。我們還建立了一系列的新工業部門，改變了我們過去工業基礎薄弱和殘缺不全、互不配合的狀態，變成一個擁有飛機製造業、汽車製造業、高效率蒸汽機車製造業、新式機床製造業、發電設備製造業、冶金和礦山設備製造業及高級合金鋼和重要有色金屬冶煉業的國家。這樣，我們就成功地建立了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這是我們在經濟建設方面的偉大勝利。但是，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執行過程中，由於我們的農業發展相對地落後了一步，加上我們還缺乏經驗，在計劃工作方面還有若干在前進中發生的缺點，曾出現了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供應緊張的現象。右派分子就別有用心地夸大缺點，歪曲事實，硬說我們集中主要力量搞重工業建設是太“左”了。他們實際上是想奪取黨對經濟建設的領導權，要取消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即要取消工業化，讓資本主義復辟，為帝國主義的政治和經濟侵略服務。我們必須反擊右派分子的進攻，繼續堅定地執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揭穿和粉碎右派分子的陰謀。

我國經濟建設的中心是重工業，這是不能有任何懷疑的，因為工業是國民經濟的領導力量，而重工業是社會主義擴大再生產的物質基礎。沒有重工業的迅速發展，就不可能使我國各個物質生產部門實現技術改造，就不可能現代化；沒有重工業的優先增長，就沒有擴大再生產。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擴大再生產的理論為

根據而制定的。關於擴大再生產要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理論，在馬克思的“資本論”中，已經由資本有機構成不斷提高的學說在原則上闡明了。列寧則更進一步深刻地論證了擴大再生產的規律，他在考察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時，把技術進步這一個本質因素考慮在內，根據自己的分析，作出了天才的結論，指出：“增長最快的是製造生產資料的生產資料生產，其次是製造消費資料的生產資料生產，最慢的是消費資料的生產”^①。列寧還指出：“生產資料增長最快這個規律的全部意義和作用就在於：機器勞動的代替手工勞動（一般指機器工業時代的技術進步）要求加緊發展煤、鐵這種真正‘製造生產資料的生產資料’生產”^②。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擴大再生產的經濟理論，雖然是在分析資本主義社會時提出的，但只要把它所反映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改變為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其一般原則，還是適用的。因為馬列主義關於社會再生產的理論，是以社會生產一般的自然形態為其物質基礎的。例如，社會生產按其自然形態分為生產資料的生產和消費資料的生產，這在任何社會生產中都是同樣的，而這一基本原理卻是全部再生產理論的基礎與出發點。在關於擴大再生產的理論方面，由列寧所首先正面論證並加以表述的優先發展生產資料的規律，也同時由列寧規定了是要優先“發展煤、鐵這種真正‘製造生產資料的生產資料’生產”，也就是說要優先發展重工業而不是優先發展任何生產資料生產。在社會主義下，社會生產同樣主要是在機器生產這種技術基礎上進行的，即已經具備了生產資料生產優先增長這一規律發生作用的物質基礎^③，因此，這一個擴大再生產的規律也就同樣會發生作用。黨認識了經濟發展這種客觀必然性，制定了優先發展重工業這個方針，這不僅在我國今天要求加速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時期要如此，即使在工業化實現以後仍然要坚持這個基本方針。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我們的工業建設，特別是重工業建設必須繼續高速度地發展。李富春同志在中國工會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指出，到1962年，我們應當爭取鋼產量達到一千二百萬噸左右，煤產量達到二億三

① 見列寧全集第1卷，第71頁，人民出版社版。

② 同上書，第88頁。

③ 我贊同朱培興同志關於“生產資料生產優先增長規律的物質基礎”的提法。朱文見新建設1957年第9期。

千万吨左右，发电量达到四百四十亿度左右，化学肥料达到七百万吨左右，水泥产量达到一千二百五十万吨左右，农业机械的产量将根据实际需要大量的增加。我们以这样高速度来进行重工业建设，使我们有可能在今后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内把我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能够在今后十五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二、关于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

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行，随着重工业建设的高速度发展，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很大的发展。国民经济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国民经济的发展，要求各物质生产部门之间和再生产各个领域之间有一定的比例或配合关系，这种一定的比例或配合，是社会生产发展的一种客观必然性。任何一个经济部门的发展，都不是孤立的，它必须以其他有关的部门底相当发展为条件，同时，它本身的发展，又将给予其他部门以相当的影响，作为其他部门发展的条件等等。在资本主义下，这种一定的比例关系，是由私有经济通过残酷的竞争而自发地形成的，必要的平衡不断地通过比例的破坏而得到实现，在不平衡中实现了一定的比例与平衡，所以资本主义社会国民经济的发展就表现为周期性的繁荣与危机，造成大量的浪费。在社会主义下，公有制的确立，决定了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必然性。国民经济发展中各个物质生产部门之间和再生产各个领域之间的比例关系之具有怎样的性质，如何具体规定，由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结合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具体经济条件和最重要的政治经济任务来决定。为实现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最重要最迫切的政治经济任务和为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全高，如何制定能确切反映这种客观经济规律要求的方针政策，如何具体确定各种比例的性质和配合，这就是国家领导机关特别是计划机关的任务，就是国家对经济进行组织与领导的职能的基本内容。

我国当前在经济建设方面的首要任务，是迅速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在几年来的建设实践中，经验证明，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对于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就很强调地提出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这就因为国民经济发展要求各个部门有相当的比例关系，不能孤立地搞重工业，不能忽略其他部门的发展，不能忽视人民改善生活的要求。

毛主席指出要“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示，是以对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有深刻认识为依据的。这一指示，要求迅速大力加强发展农业生产。

农业在我国的国民经济中处于特殊重要的地位，这是由我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大农业国这个基本情况决定的。

第一，农业在我国社会生产中占很大比重。1957年农业总产值在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仍占50.3%（计划），而就净产值计算，则占三分之二左右，即全部国民收入中，有三分之二左右为农业所创造，由此可见农业生产对国民经济影响之巨。

第二，我国人口众多，人口增长又较快。据统计，几年来，我国的人口每年大约增长2.2%左右，超过世界上别的一切国家^①。这样，对生活消费品的需要量就很大。农业是人民衣食的主要来源，如果农业发展慢和长期落后，且不说必然会严重地影响到国家工业建设的发展，就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直接地受到影响，这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会带来严重后果。

第三，说到对工业建设的影响，那就十分重大了。首先受影响最直接最显著的是轻工业的发展问题。我国轻工业所需的原料，约有80%是依靠农业供给，因此，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而在我国整个工业中，轻工业所占的比重还占50%左右，因此，农业的丰歉，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就很显著，农业发展快，工业的发展也快，反之，农业发展慢，结果也就相反。“如1952年和1955年农业丰收，1953年和1956年的国民经济就发展得比较快，如工业总产值（包括手工业，下同。）分别增长了30.2%和28.2%；1954年和1956年农业歉收，1955年和1957年的国民经济就发展得比较慢，如工业总产值分别只增长5.6%和4%左右（计划，实际会超过）”^②。除通过原料问题影响工业发展外，农业还从建设资金的积累、建设器材的输入和作为工业品的市场这三方面来影响整个工业的发展，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就建设资金的积累来看，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直接或间接受农业影响的部分约占55%左右。农业税固然是建设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而轻工业品的利润就更加重要。我们知道，轻工业品

^① 见1957年3月5日人民日报社论。

^② 见人民日报1957年11月14日第4版。

是能够迅速提供大量利潤的，例如糖厂，一般投入生产后两年即可收回全部投資，以后每年又可向国家提供大量利潤作为建設資金。此外，其他各种与农产品及农产品加工品有关的如商业及运输等部門的稅收和利潤，都是国家財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农业生产的丰歉，对我国財政收入的增長影响极大，“由于1952年丰收，1953年比1952年增長了24%，由于1954年歉收，1955年就比1954年只增長了3.7%；1955年丰收，1956年就比1955年增長了15.8%，1956年歉收，1957年就只比1956年計劃增長1.9%”^①。国家建設資金，是由国家財政收入中拨出的，由此可见农业生产对国家建設資金的内部积累影响之巨。而資金問題却是决定着我国工业化速度的关键問題之一，沒有自力更生地积累大量的建設資金，要在我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大农业国中迅速实现工业化，大规模地搞重工业建設，是不可想象的，根本就談不上贯彻优先发展重工业。就建設器材的輸入來說，在第一个五年計劃期間，我們机器设备的自給能力虽然达到60%以上，金屬材料的自給能力虽然也已达到80%以上，但还是必要輸入，这只能靠对外貿易輸出商品去換回来。在我国出口貿易总額中，农产品和畜产品及其加工产品約占75%左右，因此，发展农业对我国重工业建設有巨大作用，因为我們所輸入的建設器材，主要是最新式的重工业基本建設所必需的。1957年国家出口的畜产品总价值，預計可以換回一百一十多万噸鋼材。如換工厂设备，就相当于进口十多个无缝鋼管厂的全套设备。最后，就作为工业品市场这一方面來說，我国广大农村不仅是輕工业品的主要市场，而且是重工业的重要市场。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沒有廣闊的市场是不行的，这是生产与消費的平衡关系問題，关系到資金周轉，关系到再生产的实现問題。农业的发展，一方面对輕工业提供大量原料，另一方面因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对生活資料的需要大大增長，大量吸收輕工业品，从而反过来又大大促进輕工业的发展。同时，农业的发展使合作社的公共积累增長，必然促进扩大再生产。最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已通过了关于适当提高农业生产合作社公积金比例的决定，就是为了适当滿足农业生产合作社进一步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扩大再生产，必要进行一系列的技术改革，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随着农业技术改革的进行与逐步发展，随着农业的日益现代化，就日益要求更多地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机械、肥料、水利建設、电力建設和运输建設等等，这就为重工业的

发展开辟了廣闊的道路。即使在我国目前大规模的农业技术改革还没有进行的情况下，“市场上供应的重工业品中，供应农村的比重，生鉄占12%以上，煤占50%以上，煤油占80%以上，木材占30%左右，化学肥料和农药，几乎全部供应农村，此外还有大量的农业、水利等机械。实际上，許多重工业品都远远不能滿足农村的需要”^②。我国农业已經彻底摆脱了私有制的束縛，由小农經濟轉到了公有的集体經濟的基础上，給生产力发展开辟了非常廣闊的道路，而且我国农村又非常辽阔广大，人口众多，这是一个无限广大的国内市场。从以上所列举的理由中，可以看出农业对我国工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这样說：农业是我国工业发展的基础。进一步大力发展农业，不仅不会影响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反而会促进重工业的发展，因为它从粮食、資金、设备和市场等各方面保證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建設方針的贯彻。

既然农业在我国的国民經济中占有这样特殊重要的地位，所以必須加强农业的发展。农业的迅速发展，不仅从上述意义上促进了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針的贯彻，还在克服生活資料的生产和人民生活改善需要之間的不平衡状况方面，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并在这个意义上保證了工农业发展之間的銜接与相互配合，促进整个工业建設，特别是重工业建設的順利进行。我們知道，生产与消費之間的关系，是再生产各个领域之間的关系中最基础的一个关系，生产与消費之間的不平衡或脫节，会导致生产的破坏或需求的相对紧张。在資本主义下，广大劳动群众的貧困化根源于資本主义的所有制，这种劳动群众的貧困化，决定了資本主义下消費的最終的不足，以致終于会周期性地爆发生产过剩的經济危机。可是，在社会主义下，事情正好相反。不是人民的日益貧困，而是人民大众收入的日益增長；不是大规模的經济建設不能迅速地不断兴办，而是不断地大量进行各种經济建設；不是消費的不足，而是需求的日益增長。在我們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与消費的平衡关系，主要表现于生产資料的生产和国家建設之間的平衡，生活資料的生产和人民生活改善需要之間的平衡。我們社会主义建設要搞工业化，要进行大规模的重工业建設，就要有大量的資金，即要把国民收入中相当一部分作为积

① 见人民日报1957年11月14日第4版。

② 同①。

果，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会制约着个人消费的过于增长，但这主要是就非生产消费而说的，至于属于扩大再生产的消费，则仍然是会有很大增长的。因为既然要搞建设，总得把这部分资金支出。这种大规模的重工业建设，时间长，投资大，在企业基本建设进行过程中，它不仅未能提供出产品以满足市场的需要，反而要在社会中取去大量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因为基本建设需要大量器材，而且因大量使用劳动力，工资支付也很巨大，这种大量的工资支付出去，又使得人民收入增长，导致了对生活资料需求的迅速增长。这种情况，不仅在搞重工业建设时特别显著，即使在建设能够提供生活资料的轻工业企业时，由于往往不可能在当年建成并投入生产，也会造成对生活消费品需求紧张的现象。如果我们计划周到，在进行大规模建设时，能使工农业的生产基本上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消费需求平衡，建设就会更顺利地与发展，并导致政治上的更加巩固；否则就会造成很大的困难，在政治上也会导致不良的后果。在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方面，近年来由于国家建设规模的扩大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市场上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供应情况都比较紧张。就生产资料的供应问题来说，调节其与消费的平衡关系，是较易做到的。因为生产资料生产比较稳定，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小，增长速度也较快，它的消费比较容易控制，在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下，可以通过计划，更适当地安排基本建设速度，而且还可采取进口办法来帮助克服一些困难，问题就容易解决，平衡就可得到。在这一方面，我们国家的计划机关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在生活资料的供应问题方面，由于主要依靠受自然条件影响极大的农业生产来解决，生产不够稳定，增长速度较慢，而我们对生活资料的消费又不容易控制，同时我们外汇有限，既要搞工业化，就不应该大量进口生活消费品。这一切都会使问题复杂化，因而问题就不容易迅速解决。人民收入的增长，人口的增加，对生活消费品的需要必然会增加，这一个生产与消费的平衡如果长期不能很好的解决，就会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既然生活资料的生产主要取决于农业，因此，解决问题的最根本办法，就是积极大力迅速发展农业生产，而不是降低工业建设的速度。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消除市场上生活资料供应的紧张情况，克服生活资料的生产 and 人民生活改善需要之间的矛盾，使之形成一个符合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平衡关系，这样，一方面工业建设继续得以高速度顺利进行，另一方面人民生活又在生产

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地得到改善，社会主义工业化才能迅速地顺利地实现。所以，这实质上也就是使工农业发展之间得到平衡，使工农业之间的发展能够互相衔接与更好地配合，从而促进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的顺利贯彻。工农业之间的平衡，其意义并不仅仅限于农业生产和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发展规模之间的平衡关系，其意义及内容要比这深广得多。

根据上述各种理由，可见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的重大意义，证明了“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方针的必要性与正确性。正因此，我们说，贯彻执行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正确道路。

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应当包括工业和农业互相配合和互相促进的内容在内。我们已经着重地讨论了大力发展农业对工业发展的促进作用，谈到了农业迅速发展对工业发展的配合与平衡关系。在此，还必须讨论一下工业发展对农业发展的配合与促进关系，这实际上是关系到如何才能贯彻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问题。为了农业的能够迅速发展，工业必须尽可能给农业扩大再生产提供必需的和足够的生产资料，只有这样，农业才可能实现以技术不断进步为基础的扩大再生产，才能逐步现代化，才能紧密地与日益发展的工业建设相配合，以保证工业方面逐年扩大再生产能够顺利进行。所以，如果忽略了工业对农业发展的配合与促进作用这一重要方面，在实践上必然不可能实现同时并举的方针。重工业是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物质基础，为了担负起给社会主义农业提供扩大再生产所必需的生产资料这个任务，重工业内部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发展关系，应该有相应的结构与配合。社会主义生产有计划地按比例的发展，不仅在各个大的物质生产部门之间有一定的比例关系，而且要求一个部门内部各个部分之间也要有一定的比例。这种部门内部的比例，不仅取决于本部门内部生产条件及各种情况，而且还受各个大的部门之间的关系所制约。为了进一步加强农业的发展，根据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重工业在发展中应该适当地调整内部关系：“同农业、轻工业有直接关系的重工业应当发展得快一些，其中化学工业必须有更大的发展，除化学肥料工业外还要注意为合成纤维工业建立基础。目前供应较紧的为发展农业生产和改善农民群众生活所需要的冶金、煤炭、石油和电力工业也都应当有较快的发展。机械工业，

應該在生产上統筹安排……努力增产农业所需要的坚固、輕便和适用的各种农业、水利和运输等机械，增产小型的农村用的发电設備”^①。李富春同志在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也指出：“在第二个五年計劃期間，我們必須使重工业繼續高速度地发展，总产量增長一倍以上；并且为着促进农业的发展，必須使那些直接或间接为农业服务的部分发展得快一些。到1962年……化学肥料产量达到七百万吨左右，……农业机械的产量將根据实际需要大量的增加。”全国許多有基础的重要工业城市，在条件允許下，也都为支援农业发展而大力发展一些相应的工业。例如1958年1月3日人民日报消息报导，天津市就把支援农业生产作为工业发展的重要方向，根据全国的需要和天津市地近渤海，化学工业资源丰富和有一定技术力量等有利条件，1958年天津市的地方工业，將着重发展有关促进农业增产和解决人民吃穿的化学工业。所有这些，都表示着工业发展对农业发展的配合与促进作用。只有这样，在实践中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針，而不是空喊口号。为了大力发展农业，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57年10月提出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綱要（修正草案）”就具体地規定了許多增产措施，其中“兴修水利”、“增加肥料”以及“改良旧式农具和推广新式农具”三項，

就迫切地要求工业方面的紧密配合与支持。

在第一个五年計劃期間，我們已經胜利地在生产关系的变革方面实现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这就彻底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为其发展开辟了非常广闊的道路，这是我們可以迅速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的基本先决条件。同时，由于第一个五年計劃的超額完成，我国工业已經有了相当的发展，工业支援农业生产的力量大大增加了。因此，要贯彻执行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針，完全具备了充分的条件。国家在第二个五年計劃中，为了促进农业的发展，將采取許多有效措施，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国家的大力支援下，在合作化已取得胜利的基础上，由于党的正确领导，充分发挥全国农民建設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我們可以迅速提高农业生产，赶上工业发展的需要。目前全国人民都以最大努力来支援农业的发展，这不仅表现在工业建設方面要适当增加为农业生产发展服务的部門的发展，而且还表现在国家机关广大干部的“上山下乡”运动这方面，这个伟大的运动將大大加强农村基层單位的领导力量，同时会給农业增加一批劳动力，給农村帶來文化，給农业生产帶來新气象。

^① 见人民日报1957年11月14日第4版。

怎样贯彻社会主义教育方针

阮镜清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957年6月周恩来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也说：“我们今后的教育方针，应该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身体健康的劳动者”。毛主席和周总理所指示的这个方针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教育方针，特别由于它把培养劳动者这一最本质的问题明确地提出来，更充分反映着我国教育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具体内容。这个方针，对于我们今后十五年要争取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文化科学的社会主义强国，具有重要的意义。

所谓劳动者，当然是指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劳动者而言。按照这个方针，在普通中小学方面，应该是以培养有文化的体力劳动者为主。为什么今天的普通教育要培养劳动者呢？

教育原是起源于劳动的。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人类是在劳动过程中形成起来的。人类在劳动过程中获得了各种知识，特别是关于生产斗争的知识，把这些知识不断积累、增长，在劳动的过程中又由上一代传授给下一代，使下一代继续参加生产，改进生产。这就是最早的教育。所以教育是在生产劳动中产生，而且原来就是为生产劳动服务的。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由于剥削阶级掌握了教育权，教育才片面地成了培养“治人”的“劳心者”的工具，而脱离了生产劳动。直到机器生产日益发展，复杂的生产工具要求人们学习生产的基本知识时，教育才又重新要求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培养手脑并用的劳动者。虽然如此，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由于剥削关系的存在，被压迫阶级受教育的权利仍有着重重的限制，这种限制，只有到了社会主义社会，才能打破，劳动者受教育的权利才能逐步实现。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使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不但是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

增加社会生产，同时也是为了培养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全面发展的新人。这是我们社会主义教育方针为什么要培养劳动者的主要理论根据。

任何社会的上层建筑都要为它自己的基础服务，自然，我国的教育事业就要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服务。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事业，正在飞速发展，农业生产也正处在飞跃的发展时期，农业战线特别需要加强，以适应工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因此要求大批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劳动生产，特别要求参加农业生产，以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同时根据经济建设的需要和社会劳动分工的需要，体力劳动者不但是决定的因素，而且他们的队伍总要比脑力劳动者大得多。苏联是世界上生产最发达的国家，它的工程技术人員也只占职工总数的十分之一左右(1954年统计约占10.8%)；全国大约有一千万高级和一般知识分子，约占人口总数5%左右罢了。所以我国今后每年虽然会有更多的中小学毕业生继续升学，培养成为具有更高文化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者，但必然会有不少的中小学毕业生直接参加体力劳动。这是完全正常的，符合于社会主义的教育原则的。

当然，我们今天所要培养的劳动者，是要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身体健康的新型的劳动者。

我国目前基本的政治形势，虽然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問題已经基本解决了，阶级关系发生了大变动，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还在进行，有时还是很剧烈的。为了在这两条道路的斗争中争取社会主义的彻底胜利，以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必须使每一个劳动者都能有坚定的社会主义方向，有明确的工人阶级立场，有深厚的集体主义思想，并能在党的领导下全心全意参加劳动生产，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到底。可是，目前我国青年学生中，由于他们的家庭出身和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还不高，特别是必须认识到在资本主义所有制虽然被消灭了，但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却将相当长期

地对人們起着作用。如果不进一步提高他們的社会主义觉悟，难免不为资产阶级思想或封建残余思想所影响而誤入歧途，更談不上为社会主义服务了。例如表现在目前学生求学的目的問題上，他們許多人都是从个人主义出发，片面地強調繼續升学，做專家，并提出所謂“先專后紅”的个人主义論調。他們为了达到升学的目的，平时集中一切精力，准备功課，生怕考試不及格不能升学，产生严重的不同政治的傾向。去年广州有一个高中毕业生居然这样說：“我如果不能升学，就要去投河了。”在这种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下，“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便成了这些青年学生的奋斗目标。在这些青年学生中，甚至反映士大夫的封建思想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观点，也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此外，不少人仍有只顧个人利益，不管公共利益，只講自由，不要紀律，只講民主，不要集中，怀疑合作化的优越性，反对統購統銷，以及鬧不正当恋爱，浪費金錢和偷窃行为等等。如广州市郊区同德乡有一个十七岁的学生，由于被资产阶级思想所侵蚀，由抽烟、貪小吃、揮霍金錢、偷窃发展到誘騙一个同学到蔗林里去，搶劫手表，犯了謀財害命的罪行。这些都說明他們受资产阶级思想毒害之深，同时也說明了現在我們的学校教育距离这个社会主义方針的要求还很远。如果不是不断地采取正确的、有效的教育措施来提高他們的社会主义觉悟，我們的教育怎能为国家培养出社会主义社会所需要的、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呢？

当然，我們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不只要要求他有社会主义的觉悟，而且要有文化。我們知道，要建設一个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文化科学事业的社会主义社会，沒有一支具有相当文化科学水平的劳动者大軍，是不可能的。特別在目前要求农业生产大发展，以促进工业建設和适应人民生活日益扩大的需要的新形势下，自然每一个劳动者都必須是具有一定的文化科学知識和有从事生产劳动的实际本領的，如能使用拖拉机和各种新式农具来进行农业生产，能用化学肥料来上地，能用科学方法来改良种子，栽培作物，防治病虫害，并能总结經驗，联系实际，以促进农业生产，改进經營管理的。但是目前有不少中学生低估了现代化农业生产的要求。他們認為农村劳动者不需要有文化，特別要高中毕业生下乡去参加劳动，就說什么“大才小用”，“浪費人材”。这还不是剝削階級輕視劳动，輕視劳动人民的观点嗎！又由于学校的教学方法存在一些問題，理論脱离实践，学生虽然学了

不少書本知識，还是不能应用到生产实践上，如有些学校教师对他們虽然講过米丘林的无性嫁接的方法，但具体应用起来，便无从着手。这就是因为他們平时沒有經過实践鍛煉——实际操作的原故。有些学生虽然作了一些实验，但也很不够。广西橫县一个中学有一个初中学生名叫朱庄，在学校时会参加过米丘林小組，进行月光花嫁接紅薯，把一条薯藤接上二条月光花，所得紅薯产量，一莧达到四十斤。但他毕业后参加槎江农业合作社时，总结了在学校的經驗，有意識地把一条薯藤接上三条月光花，使多生枝叶，并注意土壤、肥料、水分等等条件，結果去年冬栽培出来的紅薯，一莧竟高达一百三十一斤，創造了全国最高的丰产紀錄（见广西日报1958年1月9日）。这个事实，說明了这个学生在学校的时候，虽然已有了一些实践，但因为教师沒有帮助他注意总结經驗，所以不能提高，只有到了合作社后，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我們希望一切劳动者都有文化，更要求学校教育能切实地把学生培养成为真正有文化的劳动者。

至于身体健康方面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沒有健康的体魄，就沒有胜任任何劳动的基本条件。为了使我們培养出来的具有社会主义觉悟和文化科学知識的学生，能够在劳动中發揮作用，必須教育学生重視体格的鍛煉。

所以，我們这个教育方針，是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社会主义教育方針，它實質上是与全面发展教育方針相一致的，是全面发展教育在当前社会主义建設和社会主义革命形势下的具体化，是要把新中国的劳动者都培养成为新型的劳动者。这就是要在加强社会主义教育和重視文化知識修养的同时，直接間接地尽量把教育同生产劳动結合起来，加强劳动教育，注意各种同工农实际的联系，通过各式各样的体力鍛煉，以培养出合乎社会主义要求的劳动者。

在实际工作上，我們如何貫徹这个方針呢？这当然要整个教育工作的各方面都同时采取正确的措施，互相配合起来切实进行。如在教育制度上，可以考虑所有中小学校学生毕业后都要参加生产劳动一、二年才能升学；或学校招考新生时，应优先录取曾参加过劳动的毕业生；在大城市中开办一些二年制的初級职业学校，以照顧年龄太小一时不能参加生产劳动的小学毕业生等。又如中学的教学計劃和大綱上，也可考虑在生物学和物理学中增加一些同生产劳动和机械运用等有关的知識，而且应大大增加劳动教育的时数。根据苏联新的教学計劃，四

年級學生每周有兩小時的手工勞動。農村的五年到七年級生每學期要勞動十二天，城市的五年到七年級生每學期要勞動六天。八年級以上的高年級生每周要到工廠、企業、農莊、機械拖拉機站去實習四小時，要求他們在三年的實習期間達到普通工人的技術水平（見南方日報1958年1月12日）。這可供我們參考。特別在農忙的時候，我們應組織學生到田野中協助農民勞動，以加強鍛煉。

當然，要正確貫徹上述教育方針並使其收到實際效果，還須改進教學方法。我認為：今後在課堂教學中，必須貫徹教學同勞動生產密切結合起來的原則。首先是各科要尽可能結合具體情況來加強勞動教育，凡與勞動創造世界、勞動改造思想、勞動增進健康、勞動促使人們全面發展、勞動人民的光榮偉大等有關的問題，都要通過教學內容使學生有深刻的認識，以培養他們的勞動觀點、勞動態度和對勞動人民的深厚感情，並在這個基礎上更好地通過各種勞動實踐，來培養他們的勞動習慣，鞏固他們的勞動觀點和態度。這些勞動實踐可在教學的其他形式中，結合各科具體情況來進行。如高年級的課堂提問，可以适当結合中學的勞動實際和農業合作化等方面提出問題。又如各科作業或實習，各年級可根據實際情況，聯繫農村生活中的問題，分別進行，如測量、繪圖、小型水利設計、自制標本、模型、器具等活動。總之我們要使學生具有勞動觀點，養成了勞動習慣後，還要能把他們所學到的知識應用到勞動生產上去，解決生產問題。關鍵問題在於勞動實踐，我們必須通過勞動實踐來消除過去教學同生產脫節的現象，並從而加強學生對勞動的認識，改變對勞動的錯誤態度，鞏固和發展他們所學到的生產知識。

人類的生產知識原是從生產鬥爭的實踐中得來的，是鬥爭經驗的總結。我們學了這些知識後，必須再用於生產鬥爭，再總結經驗，以指導後來的生產。上面說到的廣西橫縣一中學生朱莊栽培紅薯的過程，就是一個最顯著的例證。所以中小學生不但只學習知識，而且還要能確確實實地結合着生產鬥爭的實際，經得起實踐的考驗，知識才不致流於空洞。但是實行起來，我們還必須注意使學生克服一切心理障礙。因為在有些實踐過程中，他們由於不善使用生產工具，初時不免有所顧慮，感到困難。這時教師要教他們從簡單的基本的操作學起，使逐步養成習慣。因此學校不但要有一定的設備，而且教師也應有一定的準備，進行教學時，要對學生講清道理，必要時應作示範教育，並幫助他們提高信

心。這樣他們的顧慮便可逐步消除。

這里我想把北京市第十四女中初一班學生的木工實習作為例子，加以說明。該班學生在進行木工勞動實習時，對實習的目的和意義最初原是認識不足的，加以對刨子和鋸的使用也不熟悉。刨出來的木材不光不平，也鋸不直。大家都急得滿頭大汗，對木工實習不感興趣，也沒有信心在學校能真正學會木工。這時教木工實習的老師覺得自己的責任，是在木工勞動過程中，培養學生對勞動的興趣和感情，逐步改變其輕視木工勞動的思想。因此每當學生們不耐煩時，他總是從一件產品的設計、構圖，一直到如何掌握和使用各種工具，進行操作的具體知識，諄諄誘導，講給大家聽，做給大家看，以啟發學生們努力學習，熱愛勞動。結果在勞動中，大家按照老師使用工具的方法，了解到自己原來所以刨不平、鋸不直，是因為用力過猛的原故；從而逐步學會了把工具放穩，均衡地運用力量進行操作。這樣既不費大氣力，又能把一根木材刨平鋸直。當大家學會使用工具，能做出一種材料，最後合成一件成品時，都深深地感到木工勞動光凭蠻干可不行，這里面還有一種技術。經過這樣的勞動實踐，學生們才恍然大悟，原來上木工實習課，不單純是為了當木匠，而是為了聯繫實際，鞏固已經學到的知識，培養對基本生產知識的了解和勞動技能的鍛煉，並為今後其他學科的學習進一步打下基礎。這是一種非常生動而值得我們教師參考的教學方法。

最後，要貫徹執行這個社會主義的教育方針，把學生培養成為社會主義的勞動者，教師必須繼續改造自己，即教育者首先要受教育，把自己改造成為又紅又專的工人階級知識分子，成為社會主義的教師。因為學校教學工作的取得成績，主要是依靠教師，如果教師本身不能起模範作用，那是難以教好學生的。應該承認，我們的教師幾年來經過思想改造，一般在政治上已有很大的進步，在工作上也是積極努力的。但是也還有不少人因為對於社會主義的政治方向始終不夠明確，因而對於我們要把學校辦成什麼性質的學校，把學生培養成什麼樣的人這個根本問題，還相當模糊。這表現在他們的教學工作上還存在着嚴重的脫離政治、脫離生產和忽視勞動教育的現象。他們片面強調學生升學，覺得學生畢業後當農民是可憐可耻可怕的事。為了幫助學生升學，他們每年把畢業班的功課提早結束，復習試題，惟恐學生考不上學校。這充分反映了他們濃厚的資產階級思想。我們認為這種思想是同社會主義的教育思想背道而馳的，必須加以批判，不斷改

造自己，逐步提高社会主义的觉悟，才能为贯彻社会主义的教育方针创造条件。所以我们说：贯彻社会主义的教育方针，培养社会主义的劳动者问题，是学校教育中当前两条道路的斗争问题。而首先就要求教师有正确的立场，才能够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带领学生前进。

目前有相当一部分教师是从旧社会出身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四肢不勤，五谷不分，对实际生活缺乏了解，对工农群众缺乏联系。要把这样的知识分子改造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决不是一时可以完全成功的。这也是一个长期的思想改造过程。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下坚决改变立场，除了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积极参加政治斗争，特别是参加当前在中小学校开展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外，更重要的还必须争取机会，上山下乡，参加一定期间的体力劳动，同农民一道生活，一道工作，以加强锻炼，使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密切结合起来，使思想感情产生根本的变化。这

样才有充分条件去当社会主义的教师，贯彻社会主义的教育方针。我们不能想象一个教师，如果他自己是轻视工农，不愿从事体力劳动的，而却能胜任愉快地培养出合乎社会主义社会要求的劳动者来。

我们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非常重视体力劳动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作用，这是因为知识分子只有通过体力劳动，才能够彻底改变阶级立场、观点和方法。因此，只有教师们重视思想改造，热爱劳动，才能使教育结合政治，结合生产劳动，以培养合乎社会主义要求的劳动者。

社会主义的教育方针是适用于我国各级学校的。各级学校在实际工作上应如何贯彻这个方针，现在还没有经验。以上只就中小学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个人一些不成熟的意见，作为我们今后教学工作的参考。希望我国中小学老师们互相勉励，积极创造条件，创造经验，加以推广。

1958年1月

广东省的瑶族社会调查工作

广东省的瑶族分布地区辽阔，除连南和韶边瑶族自治县及粤北各县外，粤南的十万山僮族瑶族自治县有一定的数量的瑶族，而且他们和粤东的畲族也有某些关系。从族源来说，广东瑶族还和湖南、广西及越南瑶族有历史上的联系。

解放前，中山大学和岭南大学曾就一些地区进行过调查，但局限性很大，解决的问题不多。解放后，为了贯彻党的民族政策，中央访问团和前中南民委会和广东省民委会先后作了一些比较普遍性和专门性的调查。1956年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所组织的广东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情况调查组连南分组，以连南瑶族的经济结构和社会制度作为调查的中心，经过一年的努力，已初步整理出约五十万字的综合性调查资料。

在这次调查中，还在连南南岗排发现了明朝万历和崇祯年间的古墓碑各一座，对于说明瑶族定居连南的历史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在大掌收集到天启年间明朝官府发给瑶族人民的地界执照一份，对说明瑶汉关系提供了一些历史上的线索；此外，还搜集到清乾、嘉以来的瑶族买卖地和借贷契据多份，对于分析解放前瑶族社会性质有一定的帮助。关于瑶族祖先来源的歌谣传说资料，亦在此次调查中有许多新的收获。

现在，调查组正在总结经验，审查材料，准备用三年时间从连南瑶族的调查开始，来完成广东整个瑶族的调查工作，以便收集更多的材料，编写广东省的瑶族志和广东省瑶族社会发展历史等。

（黄朝中）

坚持勤俭办学，加强劳动教育

——学习長葛县第三中学、仁怀县群力农场业余初級中学的办学經驗

黃煥秋

1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河南省長葛县第三中学、貴州省仁怀县群力农场业余初級中学学生勤俭办学的新聞，令人感到振奋。这两所中学的教师和学生的革命首創精神和对党的办学方針、原則采取严肃認真的态度，是值得我們学习的。

首先是長葛县第三中学和仁怀县群力农场业余初中的教师和学生，他們坚持了勤俭办学、勤俭求学的方針，用实际行动来响应党中央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的号召，克服了重重困难，做出成績，为我們办好社会主义学校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正如人民日报“两个好榜样”这一篇社論所指出的：“在各級学校中推行动俭求学的办法，是革新学习风气、进一步促进我国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一件大事”。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民主革命胜利之后，即关怀广大工农群众文化水平的提高，关怀社会主义知識分子的培养，关怀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以及科学和艺术的繁荣。我們的国家采取了許多的具体措施和拨出巨額的經費来帮助工农子女及其他家庭经济困难的青年入学，在各类学校設置了人民助学金，开设工农速成中学，高等学校贯彻向工农开門的方針，工农成分逐年增長，中学小学迅速地发展。新中国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使我們亲切地体会了馬克思的教育学說首先提出的一个原則：只有在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專政以后，才能把文化与科学由资产阶级的独占变为人民的财产，才能引起了新一代教育的根本改变。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对文化教育的要求日益增長，学生的人数愈来愈多。我們的国家有六亿多的人口，工业农业建設的任务十分繁重，經濟上还存在着不少的困难。要求国家支付更多的經費来开办学校，繼續要求国家把学生的困难全部包下来，实在是不可可能的。否則就会削弱工业农业建設的发展。一方面要节省国家的开支，积累建設

資金，另一方面要适应年青一代的入学要求和保証学生的生活需要，最好的办法就是要大力节约现有各級学校的开支，发动群众自己办学，开设更多的学校，容納更多的学生。在学生方面则要贯彻勤俭求学的方針，提倡勤工俭学，克服事事依賴国家的思想，使学生以自己的劳动收入，解决自己全部或一部分学习和生活的費用，減輕国家办学校和家庭供养子女讀書的經濟負担，并使更多的家庭貧苦的子弟获得入校求学的机会。長葛县第三中学学生勤工俭学、边讀边耕，仁怀县群力农场业余初級中学学习文化同时建設山区的經驗，具体的执行了勤俭建国的方針，解决了青年人求学的愿望，正符合我們艰苦奋斗建設社会主义的要求。这两所中学的經驗，繼承了我国劳动人民勤工俭学的优良传统，繼承和发扬了我們过去革命根据地勤俭办学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为我国勤俭办好教育事业提供了一个好的榜样。

这两所中学坚持勤俭办学的經驗，对我們高等学校來說，是一种严厉的批評。从整风运动中所揭露的大量事实，說明我們高等学校中的浪費现象是十分严重的。主要是人員編制庞大，工作效率不高；校舍求新貪大 使用率低；教学設備貪多求新，甚至盲目購置；助学金、福利費照顧面寬等等。由于学校领导沒有严肃对待党的勤俭办学的方針，不重視勤俭、朴素、爱护公共财产的思想教育工作，不仅使国家在兴办教育事业上浪費了許多宝貴的資金，要求超出了国家的可能負担，而且在教工同学思想上漸漸滋長着一种资产阶级的享受思想，怕艰苦、追求名利地位，影响是很坏的。必須痛下决心，发动全校教工同学克服大少爷的作风，树立艰苦奋斗的作风。

第二，長葛县第三中学和仁怀县群力农场业余初中的办学方法，生动地体现了馬克思的教育学說中生产劳动与教育結合的原則。这是我們社会主义

国家教育事业的根本方向。

社会主义学校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正如毛主席所指示的：“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马克思、恩格斯曾明确指出了改造资产阶级教育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就是要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才能以革命的方式，把资产阶级的教育改造成为真正人民的、真正科学的全面发展人的教育。消灭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对立，实现体力与脑力发展的统一，是使人全面发展的唯一手段和基本原理。要消灭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对立，实现体力与脑力的统一的发展，就必须使劳动与教育结合起来，使劳动成为人们生活所必需，使教育成为全民普遍的义务。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这样说过：“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期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现代工农业的状况要求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结合。当所有劳动者认真而牢固地掌握理论知识和实际运用这些知识的技能，现代工农业才能达到高度的劳动生产率。只有将生产劳动与教育结合起来，才能使教育的内容体现现代技术和所需的科学知识。密切结合生产劳动的需要和不断发展、提高的要求，才能使工人、农民的文化技术的水平提高，培养出与工农血肉联系的新型的知识分子，培养出新一代的劳动者。

劳动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是人的生活 and 幸福的源泉。学生的任务首先就是学习劳动。学生要从事智力劳动，还必须在体力劳动方面要有一定的锻炼，才能担负起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通过劳动使学生养成牢固的劳动观念和劳动习惯，增加学生的生产知识和生活能力，并进而提高学生的政治思想觉悟。因此列宁教导我们要在自觉的、有纪律的劳动中教育所有的青年，培养他们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培养青年们正确对待公共财物、爱护社会主义财物的态度。通过劳动，使受教育者体现劳动的意义、劳动的光荣和劳动者的责任。这两所中学的教师在劳动过程中教育年青一代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认识共产党在把落后的中国改造成为先进的社会主义中所起的作用，和我们国家的远景。使他们知道，在我们获得目前的成就以前，在与敌人和自然作斗争中，曾经流了多少血汗，费了多少劳动。教育年青一代对社会主义祖国和共产党的无限热爱，决心为人民为祖国的幸福而劳动，决心保卫党的领导，保卫社会主义的果实，保护人民的利益，保护祖国的光荣。这样的进行政治思想工作

十分正确的。

长葛县第三中学和仁怀县群力农场业余初中生动地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结合起来，把业务教育与政治教育结合起来。他们从根本上抛弃了旧教育的影响，打破各种成规，具体地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教育的根本原则，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的发展，明确了方向。他们在整个学习过程中，针对学生存在的思想情况进行政治思想工作，是生动、具体而且是成功的。他们培养出的学生是具有高度社会主义觉悟，坚强的劳动观点和熟练劳动技术的人才，学生各方面的成绩都很好。新闻报导中有这样的字句：“培养了社会主义劳动者，这是长葛三中最主要的丰收”。的确，他们的成绩是十分重要的。他们的辛劳，不仅在当地劳动人民中开了花，而且在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中，发放出夺目的光辉。

长葛县第三中学和仁怀县群力农场业余初中在实现生产劳动与教育相结合这一原则所取得的经验，使我们感到是一次生动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我们试检查一下，就会发现在我们高等学校中，不少教师强调理论教学，轻视实验、实习，只注意知识传授，忽视思想教育，只注意课堂教学，忽视同实际生产劳动的结合，教书不教人的现象相当普遍。学生中忽视政治、轻视劳动的现象也很突出。这种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是和社会主义国家教育原则根本不相容的。要改变这种情况，首先要要求教育者本身要重视自我改造，重视生产实践的活动。马克思说：“教育者必须先受教育”。要求教师有明确的政治立场、思想作风，才能担负起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的任务。教师要关心本国及各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建设的先进经验和研究成果，不断充实和丰富教学内容，要热情关心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帮助学生解决困难，提高社会主义觉悟。长葛县第三中学和仁怀县群力农场业余初中这两所中学的教师和学生同劳动、同学习、同娱乐，生活在一起。这种精神是值得我們钦佩的。他们根据具体的条件提出了学生参加劳动的方式，虽然不一定完全适合于每一个学校，但说明一个问题，在学校中必须十分重视劳动教育，组织学生参加校内与校外的服务性劳动，倡导学生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组织学生在假期参加工农业生产。这两所中学的经验，使我们更加深信：只有在生产劳动过程中，才能使建立与工农结合、全心全意为工农服务，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思想。只有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才能培养出新一代全面发展的

劳动者。

第三，長葛县第三中学和仁怀县群力农场业余初中把学校的任务与当前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结合起来，在教学方法上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亦获得显著的成績。

列宁教导我們，考察和规定我們学校的基本任务的出发点，是当前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必須將青年全部教育、教养、教学与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与工人农民建成社会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只有把教育、教养、教学每一步驟，同社会主义建设现实任务联系起来，青年們才能成为真正共产主义者。

長葛县第三中学和仁怀县群力农场业余初中从学校的实际情况出发，确定办学方針，具体体现了当前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对农业建设大跃进的要求。長葛县第三中学的学生，一面讀書，一面劳动。附近的农民对这所学校的学生的評語是：“在校是勤工俭学的模范，出校是地地道道的新式农民。”仁怀县群力农场业余初中的方針是：“以生产为主，在保証生产自給的前提下，争取三年完成初級中学的教学任务”。劳动与学习的安排是半天讀書，半天生产，晴天少讀，雨天多讀。学习的課程与普通中学一样，学校的生产管理与农业社一样。这两所中学的办学方針紧密地实现着党对当前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任务。为国家培养新一代的农民，做出了很大的成績。从当地农民对办学的支持，对学生的評語就可以看出农民对他們的亲切爱护，看出这两所中学有着充沛的生命力。

仁怀县群力农场业余初中的教学方法是課文紧紧結合生产，如上植物課时，就結合积肥，教学生们学会掌握高溫速成堆肥和漚肥的科学知識和技术。这样的教学方法切实、生动，学生理解也深刻。經過教学实践和思想教育，原来怕学不到“知識”，誤了“前途”的学生，坚定下来了；对学校的发展前途缺乏信心的学生，稳定下来了。学生们发挥了可貴的劳动和学习的热情，努力地劳动，并没有放松了学习，不但沒有降低教学質量，而且提高了教学質量，使学生迅速掌握了劳动知識和技能。这些有力的事实对我們高等学校中那些持有资产阶级教育观点的人——他們空談理論，脱离实际，強調“正常系統”，要学生强記書本知識，背誦条文——实在是一課最好的教育。

列宁教导我們：“旧时资本主义社会所遺留給我們最大的祸害之一，就是書本与实践完全隔离”。

“沒有工作，沒有斗争，那末單从共产主义小冊子和著作中求得書本上的共产主义的知識，可以說一文錢也不值，因为这种知識，仍旧会把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可惡的特征，即理論与实践隔离的现象保持下去”。我們对于高等学校中教学上理論与实践隔离的现象并未采取严肃的态度，認真开展斗争。在反右斗争中所揭发出来的許多严重事例，对我們來說應該是深刻的教訓。右派先生們，拿着他們空談理論、脱离实际的旧衣鉢，在人民講坛上宣传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散布腐朽的頹废的个人主义思想；用馬克思列宁主义詞句来传播修正主义的毒素，企图迷惑青年。列宁早就提醒过我們了：“在任何学校里，最重要的是講授的思想政治方向。这个方向由什么来决定呢？这完全而且只能由教学人員来决定。……任何監督、任何教学大綱等等，絕對不能改变由教学人員所决定的課业方向”。从这里我們應該了解，任課教师的政治思想面貌是我們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最根本性的問題。我們要辨別誰是忠誠拥护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否决心抛弃理論与实际脱离的惡习，是一个最好的尺度。为了保卫社会主义的办学原則，我們必須严肃地对待当前教学上两条路綫的斗争，我們要反对空談理論、脱离实际；我們也要反对忽視政治、忽視理論指导。现在办好学校的关键問題在于我們要通过生产劳动的实际鍛煉和認真改革教学工作，在教学上积极开展两条路綫的斗争中，培养出一支能坚持社会主义办学原則的，忠誠于工人阶级事业的教师队伍。

今天党号召我們要在十年至十五年內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文化科学的社会主义国家。全国人民正信心百倍地在工业农业战线大进军。毛主席指示我們，经济建设的高潮必然会出现文化建设的高潮。在全国工业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同时，全国文化教育事业經過整风运动，积极贯彻阶级路綫和勤俭办学的方針，已出现了新的面貌。長葛县第三中学和仁怀县群力农场业余初中的办学經驗，生动地体现了我們社会主义国家教育事业的根本方向。是我們社会主义办学方針原則的胜利。这两所中学办学經驗的报导，是党在我国文化教育事业大跃进中，指示我們前进的方向。

这两所中学办学的經驗，对我国办好社会主义学校的影响將是深远的。更多的新型的社会主义学校將蓬勃地涌现出来。

苏联的教育制度和成就

汪德亮

1917年10月俄国劳动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这是人类自有历史以来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在短短四十年里，苏联的文化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是空前的：由一个主要是文盲的国家，文化落后的国家，变成为教育普及，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这并不是什么好心肠的所谓“普及教育家”提倡教育的结果，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胜利。

革命前，俄国在教育方面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在各类中小学里学习的人数仅有八百万人，占学龄儿童的五分之一。1913年列宁说过：“就教育文化和知识来说，欧洲没有一个国家象俄罗斯有这样多的文盲。”在这种情况下，革命能否取得胜利呢？这是一个发生过争论的问题。孟什维克认为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条件不够，因为工人阶级文化太低，应该先提高文化，然后再革命。列宁并不否认建设社会主义需要具有高度的文化，但指出问题在于怎样取得这样高度的文化。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真理，驳斥孟什维克的反革命理论，列宁证明政治经济的变革是文化革命的前提，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保证文化的最高发展。就是说，先用革命方法夺取政权，然后以苏维埃制度为根基，再在文化和其他方面赶上先进国家。事实证明：列宁是正确的，他的预见完全实现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苏联文化发展的前提，苏联工人阶级取得政权了，文化革命开始了。从此苏联工人和农民真正享受教育的权利。十月革命后第三天，成立了国家教育委员会和教育人民委员会，全国各级各类学校都掌握在劳动人民的手里。这就保证全国人民不分男女、不分民族，完全平等，都有受教育的机会。

苏维埃政权成立以后，在二十年期间内，就做到人人都有读写能力。如果按照沙皇时代的教育家

们的计划，要达到人人能写能读，在中亚细亚各民族，需要一千年，而文化比较发达的俄罗斯民族，也需要二百五十年（凯洛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发言）。这说明在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人剥削人的制度消灭了，国家的财富就可以全部用来建设社会主义，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水平，这是一方面。同时，劳动人民本身是渴求知识的，他们深深知道：知识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既然决心赶上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自己必须负起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责任，也就是说必须掌握知识。

以上说明苏联社会主义教育的发展，与政治革命是分不开的，教育的发展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的。当然，苏联教育范围很广，这里仅就主要方面，而且是与解决我国当前教育问题有直接关系的方面作简单的阐明。

苏联教育培养了共产主义新型的人

早在1919年联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党纲中，就已指出国民教育的任务，是使学校由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变为完全消灭阶级的工具。教师应该把自己看为不仅是普通教育的推行者，而且是共产主义教育的推行者。这几句话指出了苏联教育的革命性及其伟大意义。苏联整个教育的制度、内容和方法，都是为了完成一个崇高的任务，就是培养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人，培养共产主义社会的积极建设者。全面发展的人，是一个新型的劳动者：是一个手脑并用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结合的劳动者；是一个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劳动者；是一个有文化修养，精力充沛，生气勃勃的劳动者。

馬克思根据社会发展规律，曾經指出大工业的性質，要求全面发展的人。他說：“把生产劳动和智育体育結合起来，这不仅是增加社会生产的方法，并且是唯一的产生一个全面发展的人的方法”。这不是理論上的或可望不可即的人，而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实实在在的人，社会主义社会新型的人。这样的人，已經出现了。

在苏联人民伟大的卫国战争中，出现了千千万万英勇坚强，不屈不挠，热爱祖国，仇恨敌人，在战斗中不顧生死的苏联英雄。这不仅是軍事的胜利，同时是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成功，因为这些英雄是苏联学校培养出来的。在和平建設时期，在苏联的工厂里、农场上和企业机关中，到处可以看见勤劳負責、有创造性的工作人員，苏联已經出现了千百方斯达哈諾夫工作者，1956年一年之中，苏联工业企业中有一百三十万人提出二百三十七万件改进生产技术合理化的建議和发明。这些成就，不仅是工业的进步，也是苏联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劳动教育的成功。

沙皇时代俄国人民平均寿命是三十二岁，現在已經达到平均六十岁。苏联四十年来，体育活动已成为群众性的活动，每十个居民就有一个运动員。这不仅是治疗医药的效果，而且是苏联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教育在体育卫生方面的成功。

苏联平均每千四百人有一个圖書館。苏联政治与科学普及协会，几年来做了三百多万次的报告，听众三亿人次，可见爱好讀書，迫切求知識，已成为苏联人民的习惯。这是苏联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教育在智育方面的成功。

沙皇时代仅有二百多个俱乐部，是资产阶级消遣享乐的地方；而現在苏联有十多万俱乐部，是供人民娱乐的。有上千个戏院、剧院和歌剧院，其中三十个歌剧院在一年的統計，共演出大歌剧一万次，观众約一千万人次。苏联还有約六百所音乐学校。苏联人民爱好艺术，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这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教育在美育方面的成功。

世界各国，不知有多少青年学生讀过物理化学，但一般都限于書本知識，然而現在苏联有数百万中学生，在与科学基础知識密切配合下，都会开拖拉机，駕駛汽車，装配修理无綫电收音机等等。这就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教育在綜合技术教育方面的成功。

日丹諾夫这样描写新旧的俄罗斯：“俄罗斯人已經不是1917年那时候的俄罗斯人了。我們的俄罗斯，也不是从前的俄罗斯了。我們的品質也不和以

前的品質一样了。我們已經随着根本改变我們国家的面貌，那种空前的大改革，改变过来，并長成起来了”。新俄罗斯人怎样？新型的人品質怎样？概括來說：就是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質的、有科学知識的、具有創造力的、积极的劳动者。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他們能英勇牺牲，战胜敌人；而在和平日子里，能掌握现代科学生产技术积极参加生产，身体健康，爱好高尚艺术。这样的人不是个别的突出的人，而都是普通的苏联人。

有两位苏联教育工作者这样写道：“在苏維埃政权时代，苏联人民在經濟政治和文化建設的一切方面，都取得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苏联在国民教育方面的成就，是这样显著，以致某些对苏联心怀恶意的外国人开始对此发出了警号，認为苏联国民教育的进步，比苏联經濟威力的增長，对資本主义的威脅更大，他們所发出的警号，是可以理解的”（见苏維埃教育学杂志1957年第4期）。的确，帝国主义者必然要感到惊慌的。四十年前一个俄国人——衣服襤褸，目不識丁，出入門口要划十字的农奴，四十年之后，他的兒子，一个身体强壮的，受过十年制中学教育的，对共产主义无限忠誠，热爱劳动的年輕小伙子出现了，并且全国都是这样的人。帝国主义者不能想象有这样的人，更不能想象怎样培养出这样的人。他們不愿意也不可能理解这样的簡單道理：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文化科学的进步，不是一件孤立的工作，而是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基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共产党的組織和领导分不开的。

苏联实现了世界上最民主的教育制度

（一）苏联是第一个真正实行普及中等教育的国家

帝俄时代的教育制度，是维护資本家貴族和僧侶的利益的，当时大多数人沒有受教育的机会（特别是中等和高等学校），在校学生的成分多数是貴族官吏商人的子女。1887年沙皇亞历山大第二时代教育部竟然頒布法令不許馬夫、仆人、厨工、洗衣女工的子女进入中学。十月革命后，列宁就指出：“文盲是管不了政治的，必須首先教他們識字。”苏維埃政权成立后二十年內，就扫除了五千万文盲。目前苏联不仅沒有文盲，而且做到每四个居民中，有一个人脫产或不脫产在学校学习，全国的普

通学校达到二十一万多間，容納学生約五千万人。发展經過是这样的：1930年联共（布）党中央頒布了关于普及义务教育的決議，在1934年苏联普及四年制的初等教育完全实现了。1952年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时，全国已經基本上普及了七年制义务教育。預計1960年第六个五年計劃完成时，全国將基本上普及十年制义务教育。这样，就可以实现联共（布）党綱关于十七岁以下的全体男女兒童受到免費的普通教育和綜合技术教育的规定了。

苏联教育家岡察洛夫說：“实施中等普及教育这种真正民主的任务，世界上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也沒有提出过”（見“关于最近十五至二十年內苏联国民教育发展的远景計劃”）。号称教育发达的美国，还有三分之一学齡兒童沒有入学机会，这就可看出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鮮明对比。

苏联中等教育普及了，高等教育当然也有大发展。在約八百所高等学校里，1957年的大学生已达到二百万人，这个数字超过所有欧洲、亞洲、非洲和澳洲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高等学校学生的总数。苏联的高等教育已占世界第一位，仅莫斯科一市的高等学校学生，就多于英国或法国。

（二）苏联是一个各民族真正享受教育权的国家

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以十五个自由平等的民族苏維埃共和国在自愿的基础上組成的一个联盟国家。由于列宁的民族政策的成功，苏联各民族的經濟与文化，有了空前的发展。

列宁曾經說过帝俄是“各民族的牢獄”。斯大林說“沙皇政府故意在边区施行宗法的封建的压迫，以使民众停滯在奴隶和无知状态中”。为了使这个“各民族的牢獄”变成一个各民族的大家庭，在1921年第十次联共（布）党代表大会上就決定必須以民族語言发展民族的新聞、杂志、学校、戏院、俱乐部事业以及一切文化教育設施。

据1897年的調查，俄国一些民族人民，差不多完全不識字：土尔克明人識字的是0.77%，塔吉克人几乎全是文盲，有的民族甚至根本沒有自己的文字。自革命后，有四十八个民族是在苏維埃政权下，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文字。

现在各共和国都实行了七年制的义务教育，有些共和国已開始实行十年制的普及教育。吉尔吉斯共和国1914—1915年只有一間学校，现在有四百零

六間。在帝俄时代全国有一百所高等学校，其中多数設在俄罗斯民族地区。原来白俄罗斯、立陶宛和烏茲別克等地区，連一所都沒有。现在白俄罗斯有九十八所，立陶宛有十六所，烏茲別克有三十五所高等学校。

革命后三十年內，苏联新建学校九万所，其中有三分之二是設在各民族苏維埃共和国內的。这說明社会主义各民族的利益是一致的，不分彼此的，說明苏联各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我們看看独立以前的印度，在英国殖民統治了二百年的教育狀況吧：有五分之四的印度人民被剝夺讀書識字的机会，英語几乎成了印度的国語，大学全部用英語教学。美帝国主义統治菲律宾五十年，一手扶植的是地主买办階級，虽然办了一些学校，劳动人民子女并沒有机会入学。据統計一百个小学生升入中学的仅三人。美国黑人与白人分校讀書，最近阿肯色州小石城事件，充分暴露出美国在教育方面的民族歧視。

（三）苏联是第一个真正在教育上男女平权的国家

在十月革命前几十年甚至一二百年，就有人提出法律上男女應該平等的要求，但是沒有一个国家能够实现。为什么？列宁答复說：“因为凡是还存在着资本主义的地方，保存着土地私有制、工厂私有制的地方和保存着资本主义政权的地方，男子是享有特权的”。在封建社会，女子是受賤視的，资本主义社会所謂男女平等也是虛伪的，因为基本上都是輕視女子，对女子的能力是怀疑的。帝俄时代的中学都是男女分校。女子中学所授的功課，除外国語外，都比男校低，教会办的女校甚至不設代数和自然。女子入校，更是困难。貴族女子学院仅限于貴族和資本家女兒，大学和其他高等学校，照例不收女生。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解放了苏联的劳动人民，苏联妇女也获得解放了。四十年来，苏联男女平等享受教育权的实行，使受过教育的苏联妇女对社会主义建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就是生一块石头也不生女孩子”，这是十月革命前流行在阿塞尔拜疆的一句俗話。这种說法已經一去不复返了。目前在工业中許多妇女当了工長、車間主任和厂長；在农村，許多妇女成为生产队長、集体农庄主席和拖拉机手。由于苏联妇女普遍

受社会主义教育，所以在社会主义政治活动方面，苏联妇女是活跃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有三百四十八人是妇女；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代表妇女占三分之一；地方苏维埃代表有40%是妇女。而美国国会議員只有十六个妇女，参議員只有一个妇女。在文化教育方面，具有高等教育程度的所有專家中間，妇女占53%；在医师中間妇女占76%；在教师中間占70%；在科学学校和文化教育机关的工作人员中間占67%以上。

在苏联中小学校里，对男生和女生的教学計划，要求完全一致。四十年的經驗不可反駁的証明，学校的知識，对于男女学生，同样可以完全接受，同样是必要的。在中等專科學校女生占54.8%，高等学校女生占52.3%，其中有些学校，如食品工业学校女生占75%，輕工业和紡織学校占74%，医学院占71%，师院占67%。

应该提一下苏联在1943年男女分校問題。当时大城市中属于男女分校的学生仅占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中学生13.8%。当时主要是考虑到男女生体格的特点，但是經過十年的經驗，証明沒有分校的必要，已于1954年明令取消了。

(四) 苏联是世界上教育經費最多的国家

十月革命后，全国各級各类学校一律都归国家办理。在国家領導的原則下，苏联政府对全国学校負起全部責任，給予經費的保障，学校成为国家的一項重要事业。

革命前的1913年，帝俄的教育經費按人口計，平均每人合八十戈比，而花在官吏的薪俸，警察的經費和軍事費用等等方面，要耗費数亿盧布。现在1957年，苏联的教育經費是七百九十亿盧布，平均每人為四百盧布。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所沒有的（在1944年苏联教育經費仅二百一十亿盧布时，美国教育家已惊叹为历史所未见）。

斯大林同志說：“我国的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一点，就是我国的国家不吝惜金錢为兒童謀幸福給青年以良好的教育”。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之前，苏联的初等学校和七年制学校是免費的，但八至十年級学生和大学生还要繳納學費。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决定，將全国各級各类学校的學費都取消了，这是资本主义国家做不到的（英国貴族学校——伊頓，每个学生每年收學費三百英鎊；美国哈

佛大学法律学院每个学生每学期收學費四百美元）。

苏联教育工作的一些經驗

(一) “条条道路通生产”的問題

在社会主义国家，絕不埋沒任何天才，不会剥夺任何公民深造的机会；同时，也不容許一个人脫离工农业生产。远在1897年列宁說过：“不把年青一代的教学同生产劳动結合起来，未来社会的理想，是无法想象的”。六十年后，列宁的社会理想在苏联实现了。共产主义教育的任务，是要消灭腦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間的本質差別的。因此，必須保証在学校里不仅教学生以基础科学知識，而且使其認識现代生产过程的基本原理，保証教学工作与社会劳动密切联系。这是苏联学校目前重要任务之一。最近几年苏联中学教学計划的改变說明这一点。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以前的教学計划，仅仅规定教学应結合工农业生产，学生应有計划地到工厂农庄去参观。大会決議苏联中等学校在第五个五年計划（1951—1955年）开始实施綜合技术教育，以便将来全面推行。因此，1954年、1955年和1956年的教学計划，都规定課內課外要結合綜合技术教育。例如1956—1957年的教学計划明确要求通过物理、化学、生物等科目的教学，和生产参观，以介紹最主要的生产部門；通过各年級的劳动課、实习課以及高年級的机械学、电工学、农业生产基础課的学习，使学生掌握一定的生产技能；增設有关生产的选修課；和組織各种符合学生兴趣的課外技术小組、农业小組等。1957—1958年的教学計划更进一步规定將假期学生参加工厂或农庄的劳动，正式列入計划。特別把十年級的劳动時間比旧計划增加一倍半。这个新計划正在苏联三分之一的学校进行試驗。中学生經過这样多方面的鍛煉，对于生产技术知識，劳动的态度和习惯，就可逐漸形成和巩固。最近到上海主持苏联展览会的專家罗斯托夫采娃說，她亲自看见一个中学的毕业生，合力建造一座噴水池送給母校作为紀念礼物，另一毕业班送一层楼給学校（在母校三层大楼上多加一层）。这样的生产劳动，意义是重大的。苏联普及十年制教育后，毕业生越来越多，大多数的毕业生，都要参加实际工作。例如1957年苏联中学毕业生有一百三十万名，而全国高等学校招收四十二万名新生。那么，大多数中学生是要走上生产崗位

的，必須使他們能在學校里獲得生產勞動的鍛煉，準備到勞動生產崗位後，經過幾個月，就可成為熟練工人。

蘇聯最近採取一種新的措施，就是高等學校今後要招收參加過工農業生產兩三年的工農知識青年和復員軍人。例如1957年大學新生中就有60%是這樣的青年。大學畢業生也要在大學畢業後先參加實際工作兩三年後再根據成績發給畢業證書。至於那些沒有考上大學的青年，也能夠得到深造的機會。蘇聯採取很多辦法鼓勵他們求學，例如擴充大學函授部。估計函授學生最近將來可達到一百萬人。還有一些高等學校就在工廠附近設立分校。目前已有一百三十所高等學校附設分校在工廠里，使工人不脫離生產而受到高等教育，例如在烏拉爾的工人中間，參加學習，已經成為很普通的事了。1956年蘇聯高教部所屬的夜校及函授學校，培養出七萬名專家，占該年全蘇培養出的全部專家三分之一，象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科學院冶金研究所所長沙馬林同志，就是工人出身的科學家。

當然，蘇聯還正在向共產主義社會邁進，而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完全統一，是要到共產主義社會才有可能實現的。所以，凱洛夫指出：“在蘇聯，體力勞動日益具有更多的智力勞動的性質。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之間的本質差別，正在日趨消失，也就是說共產主義社會要求一個體力勞動者要有更高的文化修養”。

（二）蘇聯教師的培養問題

蘇聯教師把自己在學校中的工作當做為社會主義建設而服務的。蘇聯教師感到非常驕傲，因為他們得到黨和政府的信任，把培養青年一代的責任交給他們。蘇聯選擇師範生比較慎重，投考師範的人也多，問題已經不是青年願不願考師範，而是國家選師範生時看他夠不夠資格為國家培養共產主義社會建設者。為了了解投考生的情況，蘇聯的師範學校招生時，通常師範學校校長要與考生進行個別談話，了解他們的学习成績，專業修養。校長也向投考者說明師範的性質，工作的前途。通過這種談話來選擇未來的師資。師範生既是學生，又是未來的教師，所以對考入了師範學校的學生，要求也比較嚴格，不僅在業務上，還要在政治上道德品質上表現得好，可為青少年的模範，並且熱愛專業，熱愛兒童青少年。這都要在學習期內，加以培養鍛煉。

蘇聯過去設有中等師範學校，收七年制畢業生，修業四年，培養一至四年級的教師（小學教師）。又有師範專科學校收十年制的畢業生，修業二年，培養五至七年級的教師（初中教師）。師範學院收十年制畢業學生，修業四年，培養八至十年級的教師（高中教師）。最近由於中等教育逐漸普及，師範學校逐漸改為招收中等學校畢業生（十年制），修業二年，培養一至四年級教師。師院修業五年，培養五至十年級教師，原有二年制師範專科學校已停辦了。

（三）蘇聯教師的提高問題

在蘇聯，教師享有很高榮譽，受人尊敬。很多教師由於長期卓越地工作，有的當選為各級蘇維埃代表，有的先進教師榮獲功勳教師的光榮稱號。例如獲得蘇聯勳章獎章的已有二十七萬人；獲得蘇聯最高獎賞列寧勳章的有三萬人。

師範生在師院畢業，僅算是獲得教師的稱號，並不等於一個成熟或優良的教師。蘇聯教師普遍地堅持不懈地致力於提高自己政治的、業務的和教育的水平，以求改進教學方法和提高教育質量。蘇聯政府更是關心教師，創造一切條件以提高教師的水平。做教師沒有一勞永逸的秘訣，只有不斷地學習。

在幫助教師進步，提高教學質量方面，蘇聯政府做過許多工作，取得很大的成績，這裡只略述三個方面的工作。

蘇聯的教師進修學院——蘇聯的教師進修學院，不是一個全屬學校性質的組織，它是全省（市）領導和研究普通學校教學和教育問題的一個中心機構。進修學院的任務，是研究和改進所屬各中小學校的教學法工作，包括對各校和各科教師的工作，提出改進意見和具體指導；收集各校和各教師的優良經驗；組織經驗報告會；印發經驗交流的資料等。進修學院的工作對象是各種不同情況不同程度不同教齡的全體教師，所以工作方法是多種多樣的。如：（1）開辦講習會或訓練班：時間或長或短，或分散或集中，內容研究一個專科或一個專題均可，求其能幫助教師，解決具體問題。（2）舉辦分科教師會議或教育工作會議。（3）在適當時間地點舉行示範教學。（4）針對教師問題，組織專題報告或系統講演。（5）舉辦優良教師教學成績展覽會。（6）解答各校教師提出的教學問題。

(7) 印行教学指导書籍。(1950—1957年苏联曾印发教学法参考書达三亿册,可见影响之大。)

苏联的教育視导制度——苏联的学校視导制度是对普通学校工作进行監督的一个最重要环节。在俄罗斯苏維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就有学校視导員約七千人,其中多数是分布各地方工作的。他們都是富有經驗的教育工作者,他們熟練地执行檢查和提高質量的崇高任务,可以說 是“教师的教师”。

苏联的学校視导員根据国家教育的方針政策,和依照省(市)教育領導机关对学校的規定和要 求,进行工作。历年以来,苏联教育推行很多新的 措施,例如苏联由七年制普及教育过渡到十年制普 及教育的准备工作,苏联开始推广綜合技术教育时 的檢查工作,学校視导員都积极参加,起了很大的 推动作用。他們的工作是全面的,也是深入細致 的。他們不是偶然地到学校視察一次或者零星地听 几节課,就算檢查,而是亲自对学生的知識質量, 对个别学科的教学情况,对教师的一般工作,都作 系統的視察。更加重視亲自指导学校的政治思想教 育和青年团少先队組織的工作。視导員的工作方法 不能是一般化的,而是对不同的学校或不同的教 师,采取个别或集体的方法进行帮助。視导員重要 任务之一是研究和推广教师优良經驗,所以要經常 深入了解,亲自参加教学經驗交流会。

苏联教师的总结經驗工作——苏联教师 一年一度的教学总结报告,是受到学校十分重視 的。这种总结不仅說明个人工作的成功和失败的地 方,更重要的是分析取得成績和犯了錯誤的原因。 通过总结,教师养成严肃地对待自己的工作,和正 确地批判自己工作的态度。

苏联教师并不把写个人經驗总结,視为个人的 事情,而是从集体的观点,为社会主义社会利益出 发的。因为只有集合全体教师的經驗,推广优良的 經驗,才能提高全国的教学水平。收集教学經驗应 該是广泛性的,苏联教育科学院經常根据教育科学 各方面的問題,公布許多題目,要求教师选择,介 紹自己的經驗。不仅三四十年的教龄的教师,有經驗 可以总结,在年青教师中,也可以收集。凡是有創造 性的教师,都在教学或教育过程中解决了一定的問 題,也就有寶貴的經驗。有的教师不善于总结自己的 經驗,这就有賴于校長和視导員的帮助和鼓励。所 謂优良經驗不一定是发现什么新的教育原則,只要

对一些原則原理的运用,收到一定的效果,就应总结 这些經驗。莫斯科第十五中学教师伊万諾娃,在一次 教学經驗交流会上的报告題目是“我怎样上課”,她 說每上一堂課,她总是向自己提出一些問題:学生 在这一堂課中究竟得到一些什么?获得什么技能? 是不是所有材料都巩固下来?教案定得是不是正确? 如何改善?等等。这些內容好象极其平凡,但是 一个教师积累了一学期一学年,几百堂課,就有很多 材料可以总结。

在苏联,教师一般是在本校本省作經驗报告, 优良的选送教育科学院,再由科学院或教育研究室 約請教师做报告,成績好的可以获得獎金獎狀。1953 年苏联政府从各省选出优良报告有二千四百篇, 可见教师总结經驗的普遍性了。教育科学院在經驗 交流会中,可以选出有科学价值的报告,給予副博 士学位,这說明苏联教师經驗总结質量是很高的。

* * *

在反右派斗争中,我們同右派分子爭辯的,不 外几个中心問題,即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問題, 共产党的領導問題,学习苏联問題等等。其实,这 些問題都是互相联系着的。上面簡單介绍了苏联 的教育制度和成就,目的就是要說明社会主义制度 的优越性,以提高我們对社会主义建設的信心,从而 引起我們对苏联教育的重視,更积极地学习苏联。

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了。美国朝野大为惊恐, 紛紛追求苏联科学技术先进和美国落后的原因,美 国統治者是不会找到正确答案的。最近苏联“党的 生活”杂志发表了著名科学家波克罗夫斯 一 篇文章,他指出苏联科学成功的道路“是十月社会主义 革命开辟的,是社会主义工业和科学技术发展的結 果,而解决科学技术問題另一个最大的优越性,在 于社会主义制度解决了国民教育問題。苏联有一个 使所有青年和兒童都受教育的制度”。这是完全正 确的。

毛主席屢次教导我們,“要学习苏联……要認 眞学习苏联的先进經驗,……誠心誠意地向苏联学 习”。在教育事業方面,我們要学习苏联的地方很 多。讓我們踏着苏联教师胜利的道路前进,为贯彻 社会主义的教育方針,为培养我們的下一代成为社 会主义接班人而努力。

孙中山在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斗争中的历史地位

H.Γ.謝宁

編者按：本文是作者所著的“孙中山的社会政治与哲学观点”一書的第五章。原書在“前言”中說明本書的特点是：系統地研究了孙中山的世界观；論証孙中山对階級斗争的立场和观点；以具体的材料，揭露国民党右派及反动的西方資產階級学者歪曲孙中山革命学說

的企图。原作者謝宁同志是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孙中山思想的專家，1955年冬，曾到广州訪問，并到过孙中山故乡——中山县翠亨村参观。这一章的内容，基本上綜合了以上的特点，是全書的結論性的一章。譯文的个别地方有过删节。

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資本主义各国对中国的侵略，一开始就引起了中国人民自发的反抗。可是，中国不能抵抗西方列强的武裝侵略，显示了中国的經濟和文化的落后，这使中国先进的人們产生了一个思想：如不迅速地消灭这种落后状况，中国將有亡国的危險。

“要救国，只有維新，要維新，只有学外国。”^①

洪秀全、严复、康有为和孙中山是先进的中国人中的优秀代表，他們是十九世紀下半期和二十世紀最初二十五年中的中国民族文化的体现者^②。他們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各自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了痕迹。

洪秀全是十九世紀下半叶初期震惊中国的伟大农民革命运动的特出的宗教思想家，这一次革命虽給封建制度和滿清的統治帶來了严重的打击，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遭到了失敗。

康有为于十九世紀末在中国領導了所謂“維新运动”，其目的是要用和平的办法，通过改良的途径来“复兴”国内的封建帝制，从而使它免受革命的冲击。历史也注定了改良主义要遭到失敗。

二十世紀初，孙文主义作为亞洲最完整的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思想而形成了。他反映了中国人民

坚决彻底消灭封建主义及帝国主义的压迫，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的进步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运动。孙中山所创立的三民主义就是这个运动的口号。

孙文学說随中国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而发展着，在中国革命的不同阶段，它有着不同的方向。在孙文主义的旗帜下，1911年在中国进行了第一次資產階級革命。当时，三民主义的矛头是指向反动的滿清君主政体。在孙文主义的旗帜下，又进行了1924—1927年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这一次革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取得胜利和資本主义发生总危机的条件下进行的。三民主义的矛头在这样的条件下是对着帝国主义的。

孙中山長期以来寄以厚望的中国資產階級的叛变，使1924—1927年的革命遭到了暫时的失敗。只有共产党領導的中国无产阶级才能够把中国人民伟大的解放斗争进行到最后胜利。

孙中山对中国人民的功績在那里呢？他的伟大

① 毛澤东：論人民民主專政，1949年莫斯科版，第5頁（新华書店1949年10月版，第4頁——譯者）。

② 參看上書，俄文版，第4頁（中文版，第3頁——譯者）。

在那里呢？与自己的前輩們比較，他給了中国人民一些什麼新的東西呢？

孫中山對中国人民的功績是巨大的，他是中國第一個資產階級革命家，是“中國革命的先行者”（毛澤東）。他第一個用自覺的民主運動來代替老的革命鬥爭形式——自發的暴動，他以自己的親身經驗試驗了這種鬥爭形式，從各地方的密謀開始，直到全國規模的革命運動。

孫中山是中國最偉大的啟蒙者。他與黑暗勢力和野蠻狀態進行過不斷的鬥爭。

孫中山相信人類精神力量的偉大及其無限的能力，他要求喚醒中国人民，動員他們的一切精神力量去戰勝那種極度的落后，消滅國內的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壓迫，向前飛躍，站到世界先進國家的行列中。

孫中山是那些首批向中国人民提出民族主義，民族團結和民族聯合問題的人中的一個。他是中國第一個提出共和國，憲法和民權的口號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最後，孫中山也是首批指出必須改善勞動者的境況，真正關心人民需要的那些人們中的一個。

列寧總是異常親切地談到孫中山，珍視他對中國勞動群眾深刻的、真誠的同情和他對壓迫者和剝削者的無比的痛恨。

孫中山的偉大還不僅在於他同情被剝削者和痛恨壓迫者，甚至也不僅在於他是第一個提出了解放中国人民的具體綱領，而主要地在於他真誠地，自我犧牲地，以不屈不撓的精力和革命的熱忱為這個綱領的徹底實現戰鬥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天。他不害怕困難，不在困難面前屈服。他遭到了多次的失敗，但每次失敗之後他變得更堅定、更堅決和倔強。毛澤東同志稱孫中山為偉大的革命者的榜樣。中国人民，首先是中國無產階級，以孫中山作榜樣，學習了他的頑強的革命精力，在革命鬥爭中的不屈不撓的和自我犧牲的精神。

人類進步的卑鄙的敵人——國民黨的騙子們——企圖斷言說孫中山的學說並沒有發展，它只是僵硬的、冷冰冰的教條，從它產生的那一天起直到孫中山的晚年止，一直是沒有任何變化。帝國主義陣營的欺騙者們並不反對說孫中山的學說是發展了，但由於他們對進步力量的不可遏止的仇恨，他們按照自己的方式來解釋這種發展，即是說這是一種倒退的運動。他們斷言說，孫中山到自己的晚年似乎背棄了自己終身為之奮鬥的革命觀點，他似乎放棄了和蘇聯友好的政策，而開始宣傳中国人民與自己

的帝國主義壓迫者“妥協”和“友好”。再也找不出比這種對孫中山的污蔑更遠離實情的了。孫中山的一生光輝地証明了，他從不停止不動，而是永遠向前邁進，不斷發展。同時，正是那種革命的民主主義的內核在他的思想中日益地加強着。列寧就曾經着重指出這個革命的民主主義的內核對中國的巨大意義。

中国人民的領袖毛澤東同志指出了孫中山的偉大，在紀念孫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大會的演說中說道：“孫中山先生為自己的思想，為自己的學說的發展戰鬥了一生。他從未背棄過這些思想，一直是在充實和發展自己的三民主義的學說，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是三民主義進一步的發展。他曾不斷地發展統一戰綫的政策，孫中山先生從與各個不同的革命社團聯合反抗清朝，進而到與中國共產黨，與工人階級和農民，與蘇聯合作來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反動勢力。”①

孫中山是中國共產黨的直接的革命的先驅者。當年青的中國共產黨剛登上革命鬥爭的舞臺的時候，他死去了。中國共產黨擔負起了實現孫中山的偉大事業的任務，戰勝了巨大的困難，光榮地把他的事業勝利完成了。

孫中山在自己的革命活動中，不可避免地有着一些錯誤，這是受當時的歷史條件所限制的。孫文學說是有矛盾的，在他的學說中，除革命的基礎之外，還包含着這樣的一些方面，在從孫中山的綱領中割掉其革命精髓之後，國民黨的反動思想就會拿它們來作武器。可是，儘管他的觀點有着局限性和某些在政治上不正確的見解，孫中山曾經是、並且仍然是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最初二十五年中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最傑出的人物。

中国人民和中國共產黨是孫中山的思想遺產中一切最優秀的部分的真正的繼承者，孫中山的遺訓成為了中國共產黨最低綱領的基礎。中國共產黨批判了孫中山的觀點中的小資產階級烏托邦主義和反動的方面，細心地分辨出、保存並發展着他的政治和經濟綱領中的革命的、民主的內核。

* * *

孫中山的政治綱領和中國共產黨的綱領之間的

① 參看任林（譯音）著：反抗日本侵略鬥爭中的中国人民，第35頁（引語系根據俄文譯出——譯者）。

相互关系是怎么样呢？

孙中山是半殖民地国家的一个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这个国家的当前任务不仅是要解脱封建的束缚，而首先是要把自己从殖民主义的压迫和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役下解放出来。殖民主义压迫依靠着国内的封建残余势力，并且也支持着它们。这种压迫不仅落在农民和工人阶级身上，而且也落在切身关怀着中国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的民族资产阶级头上。因此，殖民主义的压迫不但使工农劳动群众，同时也使民族资产阶级革命化了。人民中这些阶层对外国压迫者及其在中国的走狗——大买办资产阶级和大封建头子——都深怀着仇恨。孙中山在自己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纲领中，也反映了这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压迫的仇恨情绪。

孙中山并不仅是中国才有的特殊人物，他与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运动的代表们有很多共同之点。列宁在评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和启蒙者们的遗产时，指出了这些遗产的三个基本特点。

1. 对于农奴制度及其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一切产物满怀着强烈的仇恨。

2. 热烈拥护教育、自治、自由；要求整个社会制度民主化。

3. 坚持人民群众的利益，主要是坚持农民的利益，“他们衷心相信农奴制度及其残余一经废除就会有普遍的幸福，而且衷心愿望着促进这一事业实现。”^①

这个评述也完全适用于中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和启蒙家孙中山先生，自然，必须要估计到中国与俄国的不同点。孙中山生活的时期是在半殖民地的国家，这就使民族解放的任务占着首要的地位。

中国历史的前进发展，在自己的各个基本阶段与全人类的发展是共同的。这个发展进程中所产生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与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遗产的特点完全相同的。为中国的自由和民族独立的斗争，要求整个社会制度的民主化；为人民群众的利益斗争，用消灭农村中的封建关系，在城市中建立国家对私人资本的监督的办法来为全民的福利斗争——这一切总的来说即是俄国民主义革命者们的，以及欧洲各国革命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提出的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

西方各国，俄国和亚洲的先进的启蒙者们的政治纲领和观点的共同性，是由这些国家发展的相应阶段在它们面前提出的那些历史任务的共同性所决定的。因为他们是作为来接替腐朽了的封建制度的

新社会制度——具体地说，即资本主义制度——的宣告者出现，他们的愿望是真诚的，而他们的政治纲领尽管带有乌托邦的因素，也是进步的。“新的社会经济关系及其矛盾，当时还只是在萌芽状态中。因此，资产阶级思想代表者在当时并没有表现出任何自私性；相反地，不论在西欧和俄国，他们完全真诚地相信世界乐园，真诚地愿意有世界乐园，真诚地没有看出（部分地还不能看出）从农奴制度所产生出来的制度中的各种矛盾。”^②

这也适用于孙中山，他的纲领是进步的、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改造社会的纲领，虽然孙中山主观地把自己的纲领用来反对资本主义，甚至把它叫做社会主义的纲领。

孙中山没有能够实现自己的纲领，孙中山所领导的1911—1913年的中国第一次民主革命，毛泽东同志指出，“因为那时还没有无产阶级的自觉的参加，因为那时还没有共产党，所以流产了。”^③

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联合进行的1924—1927年中国第二次民主革命，虽然曾使千百万被剥削和被压迫者参加了运动，使无产阶级参加这次革命有了自觉的性质，巩固了共产党在下层人民中的威信及其他等等；但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也遭到了失败，因而革命并未完成。因此在中国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由于历史条件，便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肩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抛弃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相反，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声明自己同意孙中山的新的纲领。因为中国当时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必须消灭国家复兴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毛泽东同志指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适合于中国革命的历史要求”^④。因此，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领导人民革命的中国共产党，立即声明自己愿为逐步实

① 列宁全集，第二卷，第472页（中文：人民出版社1952年北京版：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第18页——译者）。

② 列宁全集，第二卷，第473页（中文：人民出版社1952年北京版，上册，第19—20页——译者）。

③ 毛泽东选集（俄文版），第三卷，第170页（中文版，第二卷，第616页——译者）。

④ 毛泽东选集（俄文版），第一卷，第466页（中文版，第一卷，第256页——译者）。

现孙中山的革命綱領而奋斗。毛澤东同志指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与民主幸福，正是共产党在民族民主革命阶段所要求实现的总目标，也是全国人民要求实现的总目标，并非某一党派单独要求的東西。”^①

中国共产党在承認三民主义作为各民主党派和全中国人民在民主革命阶段共同的政治綱領的同时，公开地指出了这个綱領的缺点和局限性。

中国共产党的綱領与孙中山的綱領的根本区别之一是在策略方針上，尤其是在革命领导权这样一个首要問題的看法上的。大家知道，孙中山認為革命的領導权应屬於小资产階級和民族资产階級。中国共产党从“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国家的任何别的階級，都不能領導任何真正的革命达到胜利”^②这一原理出发，因此主张革命只能够，而且应当由无产阶级通过自己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来領導。

此外，与孙中山的綱領不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綱領載明了革命的两个阶段：资产階級民主革命阶段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即是除了最低綱領之外还有着最高綱領——建設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綱領。三民主义仅限于最低綱領，沒有最高綱領，从而也沒有在中国建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綱領。至于談到孙中山的經濟綱領，就缺少了一些如此重要的民主革命的任务，如：要求建立八小时劳动日制，无償地沒收地主的土地等。

孙中山的經濟和政治綱領，他的三民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綱領不同的是缺乏彻底性。这种缺乏彻底性从他的理論和实践的不一致中可以看得到，譬如：孙中山宣布以三民主义作为在中国建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綱領，这只能是在理論上而已。而在实践中，这一个綱領只回答了资产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务。因为孙中山的經濟措施（无论是在农业方面或是工业方面）并没有破坏生产資料和生产工具私有制的原則，而且是作为发展国家資本主义的前提的。

因此，毛澤东同志說，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政治綱領与孙中山的政治綱領只是在基本上不相冲突的，而不是完全一致的。

如果两个政治綱領——孙中山的政党的綱領和中国共产党的綱領——的共同点是由中国社会在各个民主階級前面提出的历史任务的共同点所产生的，那么，它們的不同点則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的政党各所依据的理論基础之不同所决定的。

中国共产党的綱領的理論基础是馬克思列宁主义，即中国社会最先进的階級——无产階級的思想。

这个階級是为中国社会从階級和殖民主义的压迫下彻底解放而斗争的最坚决，最始終如一的战士；而孙中山的政治綱領的理論基础是他的三民主义，即中国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它所关心的只是把资产階級革命进行到一定的限度，而不是到彻底完成。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綱領和孙中山的政党的政治綱領之間的基本差别就在于此。

“忽視这种差别，只看见統一方面，不看见矛盾方面，无疑是非常錯誤的。”^③毛澤东同志对那些不懂得革命的孙文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相互关系的人们这样說。

国民党反动派力图把革命的孙文学說与共产主义对立起来，把它們看作是兩個互相敌对，互相排斥的学說，企图曲解共产党承認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放弃共产主义的世界观，甚至以此要求解散共产党。毛澤东同志回击了这种挑拨性的毀謗，于1938年指出：“这些虛妄的捏造与事实毫不相符，我們共产党人声明愿和国民党员一道为孙中山先生未完成的事业共同奋斗，即是為争取中国的国际、政治、經濟地位的平等而奋斗。可是，我們同时并未放弃自己長久以来对共产主义的不可动摇的信仰，我們多年以来在为这个信仰进行斗争和作过牺牲。”^④

伟大的中国革命家孙中山，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是完全相容的，它們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这一观点出发，遺言囑咐国民党忠誠的党员們，一切忠实于民族利益的革命者們不能抛弃共产主义，要最細心地去研究它。

孙中山的革命遺产成为了中国人民和他們的領袖——中国共产党的财产。毛澤东同志說：“被国民党反动分子所抛弃的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由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分子繼承

① 毛澤东：論新阶段（中文），东北書店1947年版，第77頁。

② 毛澤东：論人民民主專政，第15頁（中文：新华書店1949年10月版，第17頁——譯者）。

③ 毛澤东：新民主主义論，毛澤东选集（俄文版），第三卷，第241頁（中文版，第二卷，第660頁——譯者）。

④ “毛澤东傳”，莫斯科国家政治出版局1939年版，第85頁（引文系据俄文譯出——譯者）。

下来了。”①

国民党的頑固派在保存孙文学說的一切反动之点的基础上，認為它是固定不移的經典；与他們相反，共产党人却創造性地对待孙文学說，把它变成反对中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中的行动力量。毛澤东同志指出，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应执行孙中山先生的遺訓——研究共产主义，而共产党人也同样應該“好好研究三民主义，用馬克思主义的眼光，研究三民主义的理論，研究如何使三民主义具体地见之实施，研究如何用正确的三民主义思想教育人民大众，使之由了解而变为积极行动，为打退日本帝国主义，建設三民主义新中国而斗争。”②

毛澤东同志指出，中国的资产阶級民主革命整个阶段就是实现三民主义。他說，三民主义不仅是在抗日战争中全国一切社会力量的广泛合作的基础，而且是战后民主合作建国的基础。毛澤东同志写道：“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將引导这个合作到争取全民解放，其民权主义將引导这个合作到彻底的建立民主国家，其民生主义則更可能引导这个合作到很長的时期，三民主义的政治綱領与政治思想保証着統一战綫的長期性。”③

这样，中国共产党象孙中山本人所做的那样，創造性地发展着革命的孙文学說，致一切力量于找到国内一切社会力量共同合作的广泛基础，以便胜利地完成民族和民主革命。从中国共产党一登上政治舞台起，直到它取得了政权，建立了孙中山終身夢寐以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止，在它的实践行动中，这一点是特別明显的。

* * *

蔣介石法西斯匪帮硬說自己忠实于孙中山的遺产，不断地用孙中山的名字来掩盖自己的反动政策，分散中国社会輿論对他們背叛孙中山的学說和遺訓的注意，而中国共产党却是尽一切的努力来实现孙中山的革命綱領和他的遺訓。这是由于国民党上层統治集团的綱領，“四大家族”王朝的綱領，并不是孙中山的綱領，絲毫也不符合于国家民族的利益；而中国共产党的綱領，在资产阶級民主革命阶段，基本上是与孙中山的綱領相符合的，并且反映了中国人民群众的期望。

1938年末，毛澤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議上的报告中指出，在那一阶段——抗日民族解放战争阶段中，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是“抗日民族統一战綫与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④因

此，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为建立全民統一战綫的斗争，是实现三民主义和中国的民族独立，自由，民主的斗争的主要的，决定性的一环。

早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1922年）和第三次（1923年）全国代表大会上，就准备好了与国民党合作的基础。在1924年孙中山依据共产党的建議而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这种合作达成了。建立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联合。这个联合的組織形式是新的，改組了的国民党，并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作行动的共同綱領。第一次国共合作准备了1924—1927年的中国革命。1924—1927年革命时期，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以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学說为行动的指針，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广东省变成了革命根据地，从广东出发，中国革命力量向北方軍閥进行了胜利的討伐。北伐的結果解放了長江以南广大的中国領土，并使它們在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了，这使孙中山終身不忘的理想得以实现。

千百万农民加入了革命，他們起来为土地和千百年来被大封建主、軍閥和官僚所蹂躪的人权进行斗争。这个强大的人民运动本可彻底消灭封建压迫和国家的殖民地附屬地位，可是，民族资产阶級在决定性的时刻叛变了革命，叛变了民族統一战綫的政策，叛变了孙中山的事业，出卖了祖国的民族利益，与外国帝国主义勾結来反对革命，把国家推入長期的內战的旋渦，为以后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創造了有利条件。

当时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部分领导人的右傾机会主义立场也促使革命的失败，陈独秀实行的是“压制群众运动，停止土地革命和放弃争取领导权的斗争”⑤的政策。

1927年8月，共产党召集了紧急會議，結束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并將他撤出了共产党的领导。当时党拒絕了和国民党合作，因为后者已成为了帝国主义的工具有。甚至在国民党反动的魔爪撕毀了統一战綫之后，中国共产党的一言一行也从未背弃过

① 毛澤东选集（俄文版），第四卷，第496頁（中文版，第三卷，第1,058頁——譯者）。

② 毛澤东：論新阶段（中文），第78頁。

③ 上書，第50頁。

④ 上書，第75頁。

⑤ “毛澤东傳”（俄文），第39頁。

孙中山的遺訓。

毛澤东同志指出：“那时，我們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这是符合于民族主义的；我們实行了人民代表會議的政治制度，这是符合于民权主义的；我們又实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这是符合于民生主义的。”①

正如毛澤东同志所指出，中国共产党这一切措施并没有超出资产階級民主革命的范围，也没有取消私有制的原則。应当指出，中国共产党并不是在和平的环境中进行这些民主的措施，而是在残酷的内战熾烈的时候，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不惜以任何代价要把分布于国内中部的革命基地完全摧毁。然而，当1931年日本利用对它有利的局势，开始向中国东北和华北侵略时，中国共产党又起来倡議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团結中国人民一切分散的力量来挽救中国免受帝国主义的瓜分和奴役。

1932年，中华苏維埃政府发表了正式对日宣战的宣言，声明它“领导工农紅軍和中国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驅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实行瓜分中国，以求得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②

1933年1月，中华苏維埃政府在对中国人民的宣言中表示自己准备与国内一切武装力量合作进行抗日。共产党提出合作的条件是：（1）停止反人民的内战，（2）保証人民群众的言論自由和民主权利，（3）武装人民，反抗日本侵略。

中国共产党不止一次地声明自己愿与南京政府的軍队真誠合作抗日，而蔣介石却以武装围剿苏区来回答这些呼吁。可是，这些围剿遭到了武装的中国人民坚强的还击，一次次都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国民党政府的政策使国家陷入了深重的民族危机。1934年初，中国面临着亡国的危险，“中国的生死存亡这一問題已直接提出来了。”③

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决定要建立最伟大的历史功績，为了领导救国的民族战争，站在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的前列，中国紅軍在1934—1935年从中国南部向北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的区域——进行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長征（約一万三千公里）。中国共产党以此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粉碎了蔣介石雇佣軍包围和消灭紅軍基本力量的計劃，把自己的軍队引到抗击主要敌人的障地，和日本侵略者面对面作战。毛澤东同志指出，中国紅軍英雄的長征是“反对国内敌人的矛头的轉移”④。从那时起，中国紅軍便成为了为祖国独立和領土完整而斗争的民族力量的先鋒队。

中国共产党依靠着中国人民各个阶层的广泛支持，繼續坚定地争取联合国内一切力量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綫。

1935年8月，中华苏維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人民，一切党派，政治团体及爱国人士发出宣言，呼吁建立全国人民的国防政府，組織統一的抗日軍队来共同对日本帝国主义作战。这个宣言号召：“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⑤。

宣言中說，中华苏維埃政府愿意作成立这种国防政府的发起人，愿意就这一問題立刻与中国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团体、群众組織和各名流学者、政治家，进行談判。

尽管国民党的领导者們对共产党的号召充耳不聞，但它却在中国人民群众中得到了最广泛的反应。抗日示威游行、罢工和其他形式的人民群众运动的浪潮漫卷了全国，中国各个阶层的千百万爱国者都参加了这些运动。

1936年8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致国民党领导人的公开信中，直接提出了迫切需要迅速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大政党合作的基础上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綫。信中說：“中国共产党随时准备着同这些国民党人携手，組織坚固的民族統一陣綫，去反对全民族最大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⑥

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提出了警告，他們最后选择一条道路的时刻来到了：“还是同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們一道建立‘防共’統一戰綫即亡国統一戰綫呢？还是同中国共产党及全国人民一道建立抗日統一戰綫即救国統一戰綫呢？”⑦

这封信号召一切国民党人“恢复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精神”，抛弃有害的失败主义的情緒，遵循着孙中山的遺訓，与共产党及其他政治党派一

① 毛澤东：論新阶段，第77頁。

② “毛澤东傳”，第58頁（引文經核對中文原文——譯者）。

③ 上書，第57頁。

④ 上書，第61頁。

⑤ “中国的統一戰綫的斗争”，莫斯科1937年版，第108頁（中文見胡华主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資料，第266頁——譯者）。

⑥ 上書，第119頁（引文經核對——譯者）。

⑦ 上書，第121頁（引文經核對——譯者）。

起为战胜共同的敌人而斗争。但国民党中的投降派，这一次对共产党的呼吁也毫无反应，尽管日本侵略者大规模侵入中国领土的危险已日益接近了。

1937年2月，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議開幕前夕，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議发出呼吁，提出五項条件：停止內战，給人民以民主权利，召开国民會議，組織武裝反击日本侵略，改善人民群众物質生活。

这是統一全国进行反抗日本侵略斗争的唯一的正确的綱領。为了使蒋介石集团易于接受这个綱領，中国共产党从自己方面作了一系列原則上的讓步；如：同意停止武裝起义反对南京政府的方針；同意把人民政权所在地的解放区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別区政府；將紅軍改名为国民革命軍，受南京政府指揮；中国共产党同意承認南京政府为中国的中央政府等①。

虽然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議拒絕了共产党的建議，可是它的坚决的号召深入到了中国人民群众之中，成为了中国社会各阶层人民的财产。甚至在这个會議上，在以共产党提出的条件为基础，建立国内一切民族力量的合作这方面也有了些进展。例如，中央全体大会期間，国民党左翼十六个著名人士，其中有宋庆龄、何香凝、馮玉祥將軍等向大会号召恢复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支持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战綫的建議。国民党統治集团对这一切号召和呼吁仍然置之不理，仅仅在1937年末，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引起了全国民族力量空前未有的爱国主义的热潮，中国共产党已非常明显地成为了这些力量的領導，这时国民党統治集团才害怕自己陷入孤立，匆匆忙忙地声明他們將“抗日到底”。

最后终于正式宣布建立两党的統一战綫，作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战綫的基础。可是，果然不出所料，后来事实証明了，这是国民党反动集团为大势所迫不得不采取的策略上的手腕。在国内全民族革命情緒高涨的时期，国民党的头子們决定改变一下自己的对內政策。“从战争和屠杀的政策改变到改良和欺騙的政策，从硬的政策改变到軟的政策，从軍事政策改变到政治政策。”②

中国共产党真誠地执行了自己向国民党，向中国人民发出的諾言，它更改了紅軍和解放区的名称，服从中央政府領導。

至于国民党反动集团，他們根本就沒有想到执行自己的諾言。他們之中的一部分人——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的公开投降集团——从日本侵入中国

起，就在幕后与日本統治集团勾結出卖中国的主权；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另一部分人——英美派——虽然与日本人合謀要消灭中国共产党和压制国内的民主力量，但却不愿把中国交給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集团企图自己控制共产党的武裝力量，把它置于日本侵略軍的打击之下，因此他們佯裝着支持抗日民族統一战綫的綱領。

1938年3月，蒋介石怀着这样的目的召开了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大会宣布了武裝抗日和建国的綱領，孙中山的遺訓被承認作为实现上述綱領的“最高原則”。

与蒋介石及其集团的阴謀相反，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客观地对中国的民主有利，而不是对它的敌人有利。中国共产党称赞大会的决定，因为这些决定并不与共产党自己的綱領相违背。中国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在1938年4月14日的社論中有关这个问题写道：“一切忠实于民族解放事业，忠实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人們，应支持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抗敌建国綱領中所闡述的政策。”③

同年，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上成立的一个属于中央政府的諮詢机构——国民参政会，举行了两次會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澤东、林祖涵、董必武等参加了會議。虽然这个會議的實質是对民主的諷刺，而且国民党政府也不执行會議的决定；然而，这些决定对于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动员民族力量来进行抗日解放战争仍起了巨大的正面的作用。

共产党在困难的斗争中保卫着全民統一战綫的政策，又在統一战綫中保持党的独立自主的原則，使得党的威信日益增長，敌后解放区愈来愈扩大和巩固。这时苏联給了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斗争以不可估計的帮助，苏联在哈桑湖和哈尔滨河一帶給了企图侵占苏联沿海地区的厚顏无耻的日本武士一次很好的教訓。

苏联的远东軍队粉碎日本挑蚌者的胜利，鼓舞了为驅逐日本强盗出自己的国家而斗争着的中国人民。这个事实使蒋介石反动集团和中国人民的一切敌人垂头丧气，他們意識到借助日本干涉者的力量

① 参看毛澤东选集（俄文版），第一卷，第481頁（中文版，第一卷，第236頁——譯者）。

② 毛澤东选集（俄文版），第一卷，第491頁（中文版，第一卷，第272頁——譯者）。

③ 参看任林（譯音）著：反抗日本侵略斗争中的中国人民，第50頁（引文据俄文譯出——譯者）。

来輕易而迅速地摧毁中国的民主力量的希望破灭了，要寻找別的新办法才行。

由于蒋介石統治集团的犯罪政策，使国家遭受了巨大的失败——于1938年底失去中国的全部沿海地区，大陆的南部和中部相当大一部分土地。蒋介石居然放弃了有名无实的对日本侵略的抵抗，准备进行投降，其目的是准备公开地与日本共同进行反共。

关于这个时期，陈伯达教授写道：“蒋介石由消极应战的政策轉移到观战与求和的政策，因此，重点也就由对外轉移到对内，由联共的政策轉移到‘防共’、反共的政策。”^①

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間的关系，中国人民整个民族的解放斗争，产生了急剧的轉变。

1938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員全体扩大會議总结了抗日战争的經驗，确认了中国共产党忠实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全体大会提出党的任务是：揭露国民党的卖国路綫并孤立它，把一切真正愿意争取自由和中华民族独立的力量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

1939—1945年这一段期間，中国共产党在两个战綫上进行了斗争：反对日本占領者和反对国民党的无数次的挑衅。

国民党人繼續不断地污蔑共产党，指責共产党似乎沒有实行自己的諾言，反对作为两党合作的基础的三民主义。共产党坚决地、彻底地揭露了国民党挑衅者們这些可耻的指責。

“一切責备共产党违背諾言，完全是惡意的污蔑。”^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三周年紀念于1940年7月7日对中国全体爱国者发出的宣言中这样指出。

中共中央指出，共产党从来沒有违背过自己的諾言，而是不断地在执行这些諾言；过去在前綫和后方的一切措施，“完全是符合于三民主义的政策，沒有任何一項超出了三民主义的范围。”^③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中国人民保証，在抗日战争和建設民主共和国的整个时期，共产党將不变地执行三民主义的政策；同时要求国民党停止在战綫上的敌視宣传和挑衅，履行自己的諾言，不得妨碍民族团结，以便把外国侵略者驅逐出中国。

从1939年末，国民党反动派公开轉到向民主力量进攻時間起，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止，蒋介石一直在实行“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分裂和倒退”^④的政策。毛澤东同志在1945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这个政策，他說：“他們惧怕人民起来，惧

怕民主运动，惧怕認真地动员全民的抗日战争。这就是他們对日消极作战的政策，对内的反人民、反民主、反共的反动政策的总根源。”^⑤

不能不指出，不仅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間进行着统一战线斗争，保卫三民主义及保卫孙中山先生的全部革命遗产的斗争；这样的斗争同时也在共产党内部，在以毛澤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与各种各样的机会主义者之間进行着。

拟定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正确的战略和战术路綫，并正确地实行这条路綫的功績应归于中国共产党的領袖，杰出的馬克思主义理論家毛澤东同志。毛澤东同志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无情地揭露了党内的“左傾”和右傾机会主义。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4—1927年)，这些人物的代表者是陈独秀和张国燾，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1927—1937年)和抗日战争(1937—1945年)时期是李立三、王明、博古及其他等人。毛澤东同志关于殖民地国家革命問題的光輝的理論著作，是創造性地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結合，它培养了一大批卓越的中国共产党员。他們有充分准备地去迎击以国民党反动派及其美国主子为首的敌人，这些敌人图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之后，共同將絞繩重新套在中国人民的脖子上。

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扩大和巩固了人民革命的力量，建立了有一亿人口的解放区，一百万的人民解放軍和二百多万的民兵；在中国广大人民阶层面前揭露了作为英美帝国主义的走狗的蒋介石集团的卖国行为，把抗日民族战綫变成了人民民主民族统一战线，以对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从而为粉碎保卫“四大家族”买办垄断專政的国民党数百万武装力量准备好了条件。

由于中国人民革命对封建反动势力和外国帝国主义的联合力量取得了历史意义的胜利，深受苦难

① 陈伯达：人民公敌蒋介石（俄文版），第134頁（中文版，第106—107頁——譯者）。

② 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資料（中文），北京1951年版，第363頁。

③ 上書，第363頁。

④ 毛澤东选集（俄文版），第三卷，第123頁（中文版，第二卷，第584頁——譯者）。

⑤ 上書，第四卷，第486頁（中文版，第三卷，第1,066頁——譯者）。

的中国人民，在自己光荣的兒子——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鼓舞下，于1949年10月庄严宣告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思想的胜利，証明了这个不朽的学說的所向无敌的力量。只有在无产阶级及其共产党的领导下，才有可能将人民革命进行到最后胜利，才能实现中国人民优秀的兒子們终身追求的理想，在这些人們之中，孙中山先生占有着最荣誉的地位。

“一百多年以来，我們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們的先人指示我們，叫我們完成他們的遺志。我們现在是这样做了。”① 毛澤东主席在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會議上的开幕詞中說。

孙中山先生曾为之献出了自己高貴的一生的理想实现了，中国人民成为了自己的自由、独立的国家的主人，人民民主專政——这是孙中山当时仅能幻想的真正的民权主义。在中国人民面前，打开了根本改善自己的生活福利的广闊的现实可能，这种

可能现在正順利地在生活中实现。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中国产生了越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建設社会主义的可能。孙中山先生要防止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民粹主义的幻想，在經濟形态上是一个不真实的想法，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变成了事实。

伟大的中国人民加入了世界热爱和平与自由的人民的大家庭。孙中山先生临终前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遺書中所表达出来的終身理想实现了——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争取民主、和平与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正携手并进。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文件資料汇编，莫斯科国家政治出版局1950年版，第10頁（譯文經核对中文原文——譯者）。

（注释中括号內附有“譯者”二字者为譯者注，其余均为原作者注。）

（徐 聞譯）

去年广州发现古墓百余座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在去年配合广州市郊的基本建設工程发掘了由西汉至明代的古墓葬一百零三座，获得出土文物二千零一十六件。这些墓葬的建筑有全用大木構成的木槨、用砖結砌的砖槨、用大石板盖面再用灰沙搗筑成的外槨，最簡單的是土坑墓，仅是一个長方形的土坑，沒有槨室建筑。在发掘的西汉墓中，以华侨新村发现的几座较为重要，墓的規模較大，全部都用黄色細沙作填土，这是广州西汉墓建筑上的一个最大特色。出土的陶器大多数都刻划了細致而工整的几何图案花紋；有的还有髹漆；有的使用朱、黃、墨、粉四色彩繪图案花紋；也有的还压印上制陶工匠的印章和数碼記号。銅鏡都是早期的战国式鏡，而且还有眉笔、刷子柄等，同是古代的化妝用具。此外，还有玉印一方，刻阴文“李嘉”二字，玉珮飾一件，作蝉形，造型和刻工都极为精美；又在一座墓的填土中发现鉄鏃一件和新石器时代

的完整石斧一件，这是广州发现最早的古代生产工具。东汉墓葬有砖槨和木槨之分，在西村皇帝岡发现的一座木槨墓，槨室結構还很完整，槨內分成前后两級，后級又分上下两层，上层平放两棺，棺內尸体虽已全朽，但还有殘碎的絲絹和垫尸的草席印痕可见。出土的随葬物計有：屋、倉、壺、罐等陶器，在一座陶倉內还有谷子殘壳保存。这墓还出土木器很多，有猪、狗、鷄和跪坐的俑等，都雕刻得神气活现，还有殘竹筐一个和許多橄欖、梅等果核，一些橄欖叶子出土时尚成片保存，仅色澤变成黃黑顏色。在动物园发现的两座砖槨墓，出土陶城府两座，城府的前后各有望楼，四隅之上有角楼，前后大門还有执兵武士拱卫，儼如一座古代的城堡建筑。又在东山工地出土的一座楼閣式陶屋，重檐迭閣，結構异常复杂，其外形頗象今日越秀山前的中山紀念堂。

（下轉第41頁）

关于陈白沙的哲学思想问题

章沛

编者按：明代广东学者陈白沙的哲学思想，几百年来一直都被认为是唯心主义的。虽然关于白沙的哲学，还没有过完整的、系统的论述，但几乎在所有的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著作中，都提及白沙的哲学思想问题。章沛同志的

“关于陈白沙的哲学思想问题”，对这个“定案”，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我们根据“百家争鸣”的精神，发表这篇文章，意在引起哲学研究工作者对于白沙哲学思想的进一步探讨。欢迎来稿，对这一问题展开自由讨论。

陈献章，世称白沙先生，广东新会人，生于明宣德三年（1428），死于明弘治十三年（1500）。

他是中国十五世纪即明代中叶的杰出的哲学家，有明代第一个提出了自己的哲学主张的重要人物。他上承宋儒道学的影响，下开明儒心学的先河，在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上，具有承先启后的地位和作用。

白沙哲学的表达形式是零碎、晦涩的，因此，对他的哲学思想的实质的看法，四百多年来，一直聚讼纷纭。截至清代止，存在着白沙哲学是禅学、是心学、是儒学正宗三派看法。近人研究哲学史的，也没有脱离这个传统。日本人渡边秀芳说他“高调绝对唯心论的妙谛”（中国哲学史概论）；谢无量说他“犹近乎禅”（中国哲学史）；钟泰说他“已与象山为近”（中国哲学史）；冯友兰说他“初学者为朱学，其后所自得则陆学也”（中国哲学史）；渡边、钟、冯和范寿康（中国哲学史通论）都说他主张“理”即“心”；吕振羽说他是“主观唯心主义”“唯我论”。——不管怎样，有一点是共通的，白沙是唯心主义者。

然而，从他的全集里，从他的内容丰富的带有哲理的诗作里，从他的重要的哲学论文“论前辈言铢视轩冕尘视金玉”里，据我个人不成熟的体会，白沙的思想，基本上应该是唯物主义的。很明显，具有客观实体意义的“道”（“理”）；具有实体的自己运动及自己规律意义的“自然”；具有主观实践意义的“不离日用”等等涵养原则，都是构成他的唯物主义哲学的带有根本意义的范畴或命题。

——为此，我谨就个人的初步体会，提出一些看法，以供哲学史的研究者参考。

陈白沙的哲学唯物主义，主要在于他的具有客观实体意义的“道”这一范畴。

白沙的“道”，在他的哲学体系中，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他在道和物的关系问题上，是主张道是宇宙万物的本体、实体的。

他在“论前辈言铢视轩冕尘视金玉”上篇中明确地指出：“道为天地之本。”

“道为天地之本”的观点，根源于他的下列的看法，他认为，道是天地人的存在的根据，没有了道，天地人是不能存在的。在“论前辈言铢视轩冕尘视金玉”下篇中，他这样地表达了他的思想，说：“天得之为天，地得之为地，人得之为人。”

这里值得注意的思想是，他不单肯定了“道”是天地人的存在根据，而且，把人与天地认为是同一性质的，归纳到“道”底范畴里。所以他又说：道是“状之以天则遗地，状之以地则遗人。”（同上引）

由于“道”是无所不包的，于是，他指出：“道至大。”他认为如果拿天地和道相比，那只是“太仓一粟，沧海一勺”（论前辈言铢视轩冕尘视金玉上篇）。这样，“道”在白沙眼里，就同时又具有总体的意义，是宇宙万物的总称。

作为总体，“道”是无限的，在空间上是无限的。所以他在“与林郡博书”第六中指出“此理”（白沙称道的同义语之一）“无内外”。所谓“无内外”，按白沙的解释，是“无一处不到”，“无不是这个充塞”（同上引）的意思。“道”在时间上也是无限的，他认为“此理”“无终始”而且“无一息不运”（同上引）。

正如現在我們所理解的一樣，運動的東西，正是無限進展的東西。所以“此理”的“充塞”，不但“隨處”，而且又是“隨時”。（上述引號中引句，均見“與林郡博書”第六）

然而，道雖然“無一息不運”，雖然無限進展，但却是“不隨萬象雕”的。他在“偶得寄東所第一”的詩里說：“有物萬象間，不隨萬象雕，舉目如見之，何必窮扶搖。”這幾句話，在白沙的“道”論中很重要。他的弟子湛甘泉對這幾句詩有着極其精確的解釋。甘泉說：“有物謂道也。……萬象間，謂不離于形器而不滯于形器。不離于形器，故即物而在；不滯于形器，故不隨萬象雕。物有盡而道無盡。”（白沙古詩教解）

這裡，白沙不但論述了“道無盡”的時間無限，而且進一步明確了“道”和“萬象”之間的辯證關係。他這裡明確了道的“即物而在”，而又是萬物的實體、總體的性質。他明確了道的“一般者”的性質，明確了“道”這一實體與現象之間的辯證法。

由於這，他在另一處地方，又更明顯地指出了：“道”“物”之間的區別：在於“物囿于形，道通于物”（論前輩言錄視軒冕坐視金玉下篇）。“物囿于形”，是說物受到形式的界限，因而彼此分離，彼此區別，而執着於個體。“道通于物”，是說道是“貫通”萬物，和萬物相通、共通的。也就是說：道是“一般者”。

正因為“道”的“一般者”的性質，實體性質，和總體性質，又因為它對形式來說，具有質料意義；對現象來說，具有本質的意義，所以，“道”和天、地、人等等“特殊者”就不能是等同的。在這裡，白沙說，對於道而言，是“狀之以天則遺地，狀之以地則遺人”（論前輩言錄視軒冕坐視金玉下篇）。

由此可見，白沙說“道”不可見，不可說，不可狀，不可物，卻又說“心得而存之”（論前輩言錄視軒冕坐視金玉下篇），其真意只在於，說明一般與特殊的矛盾與統一的辯證關係。他正確地理解一般表現於特殊，但由特殊認識一般卻需要由感性認識提高到理性認識。所以他說：“道終不可狀歟，曰，有其方則可。舉一隅而括其三隅，狀道之方也。據一隅而反其三隅，按狀之術也。然狀道之方非難，按狀之術實難。人有不彈，告之曰彈之形如弓，而以竹為弦。使其知弓則可按也。”（論前輩言錄視軒冕坐視金玉下篇）——但如果他根本不知弓是怎樣的，那末，即使你這樣地告訴他，他也会一樣莫名其妙的。

這裡，白沙不但說出了他的由特殊上升到一般

的認識方法，而且還指出，這樣的一種認識方法，還必須依靠“經驗”。

對道的規律性問題，白沙強調的是“自然”。這也就是他的所謂“無一息不運”“色色信他本來”（與林郡博書第六）的意思。

道的運動，是化生萬物的。所以他說：“天道至无心，比其著于兩間者，千怪萬狀，不復有可及，至巧矣；然皆一元之所為。”（仁術論。按“一元”是白沙稱道的同義語之一）然而，這一“所為”，由於“天道”是“无心”的，因此，也不會是什麼“意志的作用”，而是自然而然，“信他本來”而已。

在“與林時矩”書中，他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話，總結了他對整個道、世界及其規律的看法。他說：“宇宙內更有何事，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自信吾。自動自靜，自闔自辟，自舒自卷。甲不問乙供，乙不待甲賜。牛自為牛，馬自為馬。……烏乎大哉。”

這裡意思是明顯的。他在“宇宙內更有何事”的總命題下，提出了兩大類的範疇。第一是天、地、人、牛、馬、甲、乙等等實體範疇（所謂：“充塞”）；另一類是自信（順、仲），自動，自靜，自闔，自辟，自舒，自卷，供，賜等等有關自己運動、遵循自己的規律，以及互相關系（供、賜）等等的運動及關係範疇。這裡清晰地畫出了白沙的宇宙輪廓，也即是“道”的輪廓。

白沙對於“自然”，對於“變的辯證法”（參看云潭記）的估價是很高的。他把“自然”這一範疇廣泛地運用於：自然界，生物界，生死，榮枯，治國（社會）等等各方面。這只要看看他的如下作品：“枕上謾筆”、“觀物”、“四月”、“祭黃君朴文”、“素馨說”、“八月廿四日廳作多溺死者”等的有關片段，就可以明白。

以上是白沙的道及自然的簡單的輪廓。

然而，把“道”肯定為宇宙萬物的實體還是不夠的。為了考察白沙的哲學思想，還必須進一步考察他對道與心的關係的見解。

白沙在本體論的範圍內，雖然把人歸納到“道”的總體中。但在認識論的範圍內，却是把道與人作為相對的兩極來看待的。

他在“論前輩言錄視軒冕坐視金玉”上篇說到人與道的關係時，他首先說：“至大者道而已，而君子得之。”在下篇中，他說到“道”能夠“心得而存之”，又說到“狀道之方”和“按狀之術”，可見他在認識論中談人與道的關係時，與在本體論中談人

与道的关系时是采取不同的态度的。

他怎样规定道、心，或物、心关系呢？

首先，他认为，道无心。道与心不是一回事，也不是先天地合一的。所以他说：“天道至无心。”（仁术论）又说，“大块无心”（祭黄君朴文）。又说：“大块本无心。”（八月廿四日颺作多溺死者）那末，这些无心的道、天、地又是什么呢？他指出，这就是“气”，“天地间一气而已。”（云潭记）气，在这里，如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一般意义一样，是作“物质”来解释的。

天地如果是物质，那末，有“心”的人又如何呢？他认为也不过是物质而已。在“与湛民泽”书中，他用“人与天地同体”这一句话表达了这个唯物思想。

如果人是物质，那末，心又如何呢？他说：“人具七尺之躯，除了此心此理，便无可贵，浑是一包脓血，裹一大块骨头。”（禽兽说）即使他在这里表现了轻视肉体的倾向，但他仍然承认了“人具七尺之躯”，承认了身心的客观关系。

由此可见，他的见解是：心在人中，人在道中。这一个关系的规定，是符合于朴素的唯物论的。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来，白沙就把心与道看成是不同的东西了。在他的心目中，“此心”和“此理”不是一回事，也不是先天地合一的。在“禽兽说”中，他把“此心”“此理”同时并提，他在“与赵提学僉宪”书中，谈到“得道”问题时写道：“所谓未得，谓吾此心与此理，未有凑泊吻合处也。”这里的意思是明显的。“得道”问题，就是“此心”与“此理”这两件东西的“凑泊”“吻合”问题。可见，第一“此心”与“此理”原来是两件东西；第二，经过“得道”（所谓涵养）的过程，这两件东西才“合一”起来。

如果我们遍读白沙论到涵养得道的问题的文章，就会发现，当他提到“道”和“我”或“心”的关系时，总不忘用上“会此”“得之”“收拾”等等字眼。如“与林郡博书”第六，他先谈“此理干涉至大”，然后说：“会此”则如何如何。“与林时矩”，他先谈了“天自信天”等等，然后才说“得之者”如何如何。在“论前辈言铢视轩冕坐视金玉”上篇中，在“君子得之”之后，才说“天地之始，吾之始也”的话。

明确地提出物心关系的，是他的“认真子诗集序”：“形交乎物，动乎中，喜怒生焉。”这是清楚地说出从形、物相接触的关系，引起“心”（中）的活动，才引导出情感来。“形交乎物，动乎中”，是很好的反映论的说明。

在道、心关系上，明确的反映论的主张是这样

说的。“惟至虚受道”。（转引自湛甘泉白沙先生改葬墓铭）又说：“至虚玄受道。”（白沙题甘泉小圆图屋诗）“至虚”是“心”的同义语。“受道”说明了在“道”的面前，“心”是接受者，被动者。因此，也就很明确的提出了“道”第一性，“心”第二性的命题。

二

从以上的简单论证中，我们看到白沙唯物主义本体论的轮廓。现在，应该回答这个问题：白沙哲学体系中有没有唯心因素呢？如果有，应该摆在什么位置呢？答案是，白沙哲学体系中，存在着唯心因素，它的表现是在白沙论到涵养后的“我”和“道”“合一”问题方面。唯心因素的具体表现是：我与道合一，就能够“天地我立，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与林郡博书第六）。

这样的见解，不出现于本体论中，而出现于涵养过程的终结，在这个“终结”出现以前，白沙对天人关系的理解，是唯物的。即使出现以后，他也没有因此而否定了道对心的独立关系。

为什么“我道合一”的说法，没有否定了白沙的“道”“心”分立（即道不依赖意识，“道无心”）呢？为什么不能从这里得出结论说，白沙根本上就是主观唯心主义呢？正确的答案是：白沙的“涵养得道后我与道合一”的命题，就道心关系这一方面来说，并不含有“道即心”的意义，相反，他刚刚是从“道”“心”分立，“道无心”出发，才得到这个结论的。

理由很简单，所谓“经涵养得道后，我与道合一”的命题，就道心关系上来说，可以列为下列公式：“道心分立——涵养得道——道心合一”。这样一个答案，是绝对不能把他的第三命题理解为“道即心”的，因为如果这样，他的公式里的第一命题和第三命题的外延就相同，白沙就陷入逻辑上绝不容许的自我矛盾中。而且，“道即心”的命题也就完全否定了他的“心在人中，人在道中”的本体论见解，这在一个哲学体系里，是不可能的。

其实，这里存在着的是两个不同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道和心是不是合一的？这是哲学的根本问题。第二个问题是：道和心能不能合一？这是涵养和涵养的结果如何的问题。如果答案（一）是：“道即心”，那末，是肯定的回答了第一问题，第二问题也就不存在了。如果答案（二）（即白沙的答案）：道我（心）是分立的，只是经过涵养，我得道了，我“道化”了，我和道就合一了。这个答案，是否定地回答第一问题，并肯定地回答第二问题。所以从这里明显地看到，白沙的经过涵养，我和道合一的主

张，如就道心关系来说，只是回答了在“道心分立”的前提下所提出来的“心能否和道合一”这一具体问题，而在回答道和心是否合一的这一哲学的根本问题时，和“道即心”的答案倒刚刚是相反的。因为如果承认了“道即心”，那末根本就不存在“人(心)能否与道合一”的问题，也绝对不可能产生“经过涵养，人(心)和道才能合一”的命题。

为什么我说白沙的人(心)和道的合一是人(心)的“道化”而不是道的“人(心)化”呢？理由是，白沙的道就是实体和自然；如上文所引“与林时矩”书所说：是“天自信天”等等，是“自动自静”等等，是“甲不问乙供，乙不待甲赐”等等。在这一段之后，他就说“得之者”则如何如何地能与道合一，也就是说：得了这些，就是“得道”。但得道之后，人就能支配道呢？抑或只是“顺道自然”呢？根据白沙的意见，则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在“与林郡博书”第六他说了“得此把柄”(道)则“往古来今，四方上下，一齐穿纽，一齐收拾”这些似乎是人支配道的話之后，跟着明白地说：“色色信他本来，何用尔脚劳手攘。”原来“穿纽”，“收拾”，只是“色色信他本来”而已。其实，不是这样也是不成的，不然，白沙刚提出了道是自然的，一说了“得之”之后，又马上认为“道是受支配于人的意志”的，那就不可解的了。所以，白沙的“得道”，只是“顺道自然”，只是人的“道化”，不是也不可能是道的“心化”。

有些人认为白沙的涵养过程，是简单的，只通过静坐方法就可达到。这个见解不符合事实。

先从白沙本人的经历及主张的方法谈起：

1.“仆才不逮人，年二十七始发愤从吴聘君学，其千古圣贤垂训之書，盖无所不講，然未知入处。比归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无师友指引，惟日靠書冊寻之，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所謂未得，謂吾此心与此理，未有湊泊吻合处也。于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静坐。久之，然后见吾心之体，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种种应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体認物理，稽諸圣訓，各有头緒来历，如水之有源委也。”(复赵提学僉宪)

2.“始惧学者障于言語事为之末也，故恒訓之曰：去耳目支离之用，存虛圓不測之神。其后惧学者淪于虛无寂灭之偏也，故又恒訓之曰：不离乎日用，而见鳶飞魚跃之妙。”(张翊：白沙行狀)

3.“壯从江右吳聘君康齋游，激励奋起之功多矣，未之有得也。暨归，杜門独扫一室，日静坐其中，虽家人罕见其面。如是者数年，未之有得也。

于是迅扫夙习，或浩歌長林，或孤嘯絕島，或弄艇投竿于溪涯海曲，忘形骸，捐耳目，去心志，久之然后有得焉。”(张翊：白沙先生墓表)

4.“夫道无动静也，得之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苟欲静，即非静矣。故当随动静以施其功也。”(白沙语录)

这是涵养的大原则问题。在涵养的具体功夫上，白沙更是有整套方法的，并不如一般人所想象，只有“静坐”一项。

他主张，涵养必须先有目的，也就是所谓“立大”“識真”。在“贈世卿”诗中，他说：“圣人与人同，圣人与人异，堯舜于舞雩，气象一而已。大者苟不存，翩翩竟奚取。”在“贈陈秉常”中说：“人生貴識真，勿作孟浪死。”所谓“大”，“真”，其实就是“道”。所以他又说：“所忧非忧道，所忧其可留，……古来向道人，能辨忧所由。……敬此谓之修，怠此谓之流。”(贈世卿)

在涵养上，他主张要有坚持刻苦的精神。“重修梧州学記”说：“今日修之，明日修之，修之于身，修之于家，修之于天下，不可一日而不修者也。”并且还要明确，学习、涵养，是为了“实践”。他说：“为学莫先于为己为人之辨，此是举足第一步。”(语录)当然，白沙的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是不同的，他的只是直观的实践、个人的实践，而不是社会的实践。

进一步他就论到在学习、问、思、辨、行中的心理锻炼方法，他称为“心学法門”。一般人所说的他的唯心主义思想，有些就是把他在这一个问题上的见解当作本体论的见解，然而，从下列的分析中，将可以看出白沙这一部分思想的真相。

他认为人心的规律也是“自然”，所以他说：“学患不用心，用心滋牽纏，本虛形乃实，立本貴自然。”(答张内翰廷祥書括而成詩呈胡希仁提学)从心的静态方面观察，就是“静虚”；从动态方面说就是“鳶飞魚跃”。所以他一則说：“善学者主于静，以观动之所本。”(语录)再則说：“有学无学，有觉无觉。千金一瓢，万金一諾。于維圣訓，先难后获。天命流行，真机活泼。水到渠成，鳶飞魚跃。得山莫杖，临济莫喝。万化自然，太虚何說。綉罗一方，金針誰撥。”(示湛雨)

“虚”就是心中无物，不受私见、物欲的牽累，亦即心理的“空白”状态。所谓“静”，就是不静心，亦即“定”，是坚定不移的意思，不是静止。静才能專一，虚才能明，这样就不致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而虚心，專一，正是学习、認識、实践时应有的

的态度及心理状态。

所謂“鳶飞魚跃”，就是心的运动，要象鳶飞魚跃一样地自然，意指意識及思想活动，不应受任何的个人得失、利害、成见的牵制。这是一种形象化的比喻，說明人們思維时，應該順其自然，保持客觀的清醒的态度。

他对于这些，曾概括地說：“为学当求諸心，必得所謂虛明靜一者为之主，徐取古人緊要文字讀之，庶能有所契合，不为影响依附，以陷于徇外自欺之弊，此心学法門也。……此理洞如，然非涵養至極，胸次澄澈，則必不能有用于一动一靜之間。”（書自題大塘書屋詩后）又說：“虛无里面昭昭应，影响前头步步迷；說到鳶飞魚跃处，絕无人力见天机。”（贈周成）

这种心的自然状态的涵養，他称为“治心”“洗心”，包含有“調性”“撥悶”“忍”“慎独”“忘己”等等項目。其入門方法便是“靜坐”。他的靜坐的具体方法是“調息”（复赵提学僉宪），即要有一种調勻的特殊的呼吸方法；是“中”或称“一”（“中”是喜怒哀乐之未发，“一”是无欲，大致相类）（書蓮塘書屋册后），即把腦子宁靜下来，喜怒哀乐的情緒及欲望的屏除；是“惺惺”（复赵提学僉宪），即保持神識的暗示状态，不入于昏睡。

由此可见，白沙的涵養过程是一个相当复杂困难的过程，只有在这个过程的成功終点，才出現白沙的“天人合一”，这就是他所常說的“会此”“得之”“收拾”“湊泊”“吻合”的全部意义。

这样的唯心主义因素，如果用现代的術語來說，是屬於眞理論范围内的“客觀眞理”与“客觀存在”的混同。因此，当我们評价白沙哲学时，就不能用这一局部去代替它的全体。

三

以上是白沙唯物主义哲学及其唯心因素的位置的簡單描画。这样的輪廓，和过去的哲学史研究者的看法是不同的。为了弄清楚“白沙是唯心主义者”这一传统看法的合理因素及錯誤因素，这里，首先必須接触到白沙的“理”是否就是“心”这一个問題。

就比較有代表性的研究者來說，渡边秀芳、鍾泰、馮友蘭、范寿康等，都是主張白沙的理即心的。說白沙理即心的論証，主要是“与林郡博書”第六中，白沙說到“理”的有名的一段話：

“終日乾乾，只是收拾此而已。此理干涉至大，无內外，无終始，无一处不到，无一息不运。会此則天地我立，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得此把柄

入手，更有何事。往古来今，四方上下，都一齐穿紐，一齐收拾，隨時隨處，无不是这个充塞。色色信他本来，何用尔脚劳手攘。”

根据这一段，渡边秀芳認為这是“离了心的涵養問題，而唯高調絕對唯心論的妙諦的。”（中国哲学史概論）鍾泰認為“即象山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之見也。”（中国哲学史）

馮友蘭写道：“此所謂理，实即是白沙所见隱然呈露之吾心之体，如上所引者（指白沙“复赵提学僉宪”書中自叙为学一段，见上节白沙涵養原則第一則）。观于白沙弟子湛甘泉所說更可见（下引湛的“心性图說”，略）。”

范寿康的說法和馮相同。

第一，关于白沙的理即“隱然呈露”的心体問題。这样的判断是沒有根据的。白沙在全集中，从来沒有說过类似的、或帶有这样暗示的說話。白沙的理，也就是道，是独立于心之外的东西，就“复赵提学僉宪”書中，已明确提出“吾此心”与“此理”的“湊泊吻合”問題。而在他說“吾心之体，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时，是說的已經“得之”的情况。白沙的“心体”就是“虛”，可以“隱然呈露”，但却不能“有物”。那末，这个“有物”指什么呢？應該說指的就是“理”，即“道”，是“有物万象間”的“有物”。因为，很显然，“得之”以后的情况，是“吾此心”已經与“此理”合一的情况，那末，心体呈露，多了一件“有物”——“理”，那是理所当然的事。

第二，引用湛甘泉的“心性图說”来証明白沙的理即心，是缺乏說服力的。因为湛甘泉是客觀唯心主义者，他主張“心包万物而貫乎其中”（心性图說），这里的“心”，則剛代替了白沙的道的地位。他在“粵秀山白沙書院記”中更明确的用“道即心”“自然即心”来解释他的老师的學說。可是，怎么能根据甘泉的著作来証明白沙的理即心呢？

呂振羽先生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对白沙有較詳細的分析，針對白沙哲学的思想實質問題，我这里側重討論关于白沙是“主觀唯心主义”及“唯心論”两点。

呂振羽認為白沙的“理”便是“一元”。他首先引用了白沙这一段話：“天道至无心，比其著于兩間者，千怪万狀，不复有可及，至巧矣；然皆一元之所为。”（仁術論）然后又引用了“与林郡博書”那段話，得出的結論是：

1. 白沙“一元”的內容是“理”。
2. “理”是“独自存在的‘万化’的本源。”
3. “得此把柄”（指理）便能“天地我立，万化

我出，宇宙在我”，所以是“唯我論”。

4.“理”的本體是“道”。白沙既說：“物囿于形，道通于物，有目者不得見也”，所以“道”是“存在于客觀世界以外而支配着客觀世界存在的東西（即所謂“通于物”）。或者說，“道，是客觀存在的主宰。”

這個結論提出了兩個問題。

第一，道和理的關係，是否如呂振羽所說，是“本體”與“現象”的關係呢？如果說，理是萬化的本源，又是獨自存在的，它不具有本體的意義嗎？為什麼又另有本體呢？

其實，白沙的道和理是同義語。有力的證明是，他所說的“此理”的屬性，和他稱為“道”的屬性是一樣的。上文已經論及。其次，在白沙的著作中，“道”和“理”是不同時作為兩件東西一起並提的。習慣總是，用了“道”字就不用“理”字，用了“理”字就不用“道”字。

第二，道“通于物”為什麼是說道“支配”萬物呢？問題在“通”字的解釋。根據白沙的哲學思想體系，“通”字有兩種含義，一是“貫通”，所謂“穿紐”。一是“相通”，所謂“即物而在”，“不離形器而不滯于形器。”易系辭：“往來不窮謂之通。”又：“推而行之之謂通。”推不是推動支配，而是往來不絕、迭相替代的意思。如易系辭：“日月相推而明生焉。”與“不滯”正好相合。而又都沒有“支配”的意義。字書也沒訓“通”為“支配”的。

其實，事實剛剛相反，“道”不是超越客觀存在的“主宰”，而是客觀存在的自身，即客觀實體。

關於白沙的“心”的問題，呂振羽引用了白沙的“聖道至無意，比其形于功業者，神妙莫測，不復有可加，亦至巧矣，然皆一心之所致。心乎，其此一元之所舍乎？”（仁術論）的話，認為白沙的“聖道”是從“心”所體現出來的，而“心”又是“一元”即理之所舍的。根據白沙“常令此心在無物處”（遺言湛民澤）的話，他肯定白沙的“心”也是理所支配的受“令”的東西，而且其自身也是能超離客觀世界而獨自存在着的。

現在先談白沙仁術論的思想。呂在這裏的引文，是緊接在上文所引“天道無心”那一段之後的。白沙在這裏，首先分開天人，然後說到“合一”，層次清楚，要仔細領會他的原意。他提出“天道無心”與“聖道無意”相對，他指出天道是“一元”“所為”；聖道才是“一心”“所致”。“一元”是“著于兩間”（天地），“一心”是“形于功業”。界綫是分明的。天人怎樣合一呢？那就是“心”是一元的“所舍”。在

這裏，“一元”和“所舍”仍然是兩件東西，正如人和屋子一樣。這不正是他的道和心的關係的觀點的反映嗎？

至於呂振羽解釋“常令此心在無物處”這句話是更值得商榷的。白沙這句話，是談涵養的，並不是談本體。它的上下文是這樣：“古之善學者，常令此心在無物處，便運用得轉耳。”（與湛民澤書第七）而且，即使就字義解釋：“常”不是“理”，只是“常常”，“經常”的意思。“令”不是“命令”，而是“使得”“支使”的意思。“無物處”更不是超離客觀世界而獨自存在，而是“無累”，不受成見、物欲的牽制的意思。這只要看白沙自己的說明就可明白：“人心中容留一物不得，才著一物，便有礙。且如功業要做，固是美事，若心心念念只在功業上，此心便不廣大，便是有累之心。是以聖賢之心，廓然若無，感而後應，不感則不應。又不特聖賢如此，人心本體皆一般，只要養之以靜，自然開大。”（與謝元吉）

呂振羽又認為：在認識論上，白沙完全否認客觀，只承認有主觀的“心”的作用，只承認能從靜坐中去求悟解，認為宇宙萬有及其變化，只須從靜坐中去體念此心，便都在其中了。從而，並認為客觀一切事物的動靜變化，並不是基於客觀事物的自体，而是基於此心的認識。所以“道”原是沒有什麼“動靜”的，而所謂“動”“靜”是源于此“心”的作用。

關於白沙的心與道的關係，即物心關係，上文已經論及。總的來說，白沙是承認心反映道的。他所說的“惟至虛受道”和“形交乎物，動乎中”就是最明確的證據。呂振羽從他“只主張靜坐”這一點來推論，說他主張“只須從靜坐中去體念此心，便都在其中了”，那當然只能得到錯誤的結論。正如本文所指出的一樣，白沙的涵養方法，並不只是“靜坐”。

至於呂振羽說白沙認為動靜是源于此“心”的作用，證據是下列的引文：“夫道無動靜也，得之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欲靜，即非靜矣。故當隨動靜以施其功也。”（白沙語錄）

這本來也是一段談涵養的話，呂振羽卻把它當成本體論的主張。白沙說道無動靜，意思是指道無心，道自然而言。因為明顯的，他這裏的“動靜”二字，是指的心的涵養上的“動靜”而言，所以後文才提到“苟欲靜，即非靜矣”的話。道既然是“自闔自辟”的，自然的，所謂“天道本無心”，就無所謂心的動靜問題。因此，他認為，“得之者”即得道的人，在行動或靜止時，在心的動或靜時，都是“定”的，即具有理智的定力的。因此，不是故意求靜，

而是隨動靜施功。

這段話剛巧反駁了呂振羽認為白沙只主張靜坐的說法，至於這段話里，有沒有說道無動靜，道的動靜只源於心的意思呢？一點也沒有。相反的，他是說道無所謂心與行為的動靜，只有“自然”。得道的人，心就是反映了道的自然而是自然的，具有“定力”，動亦可以“定”，靜亦可以“定”。

關於白沙的“唯我論”問題，呂振羽認為白沙主張：真正的作為“理”而“體現”的“我”，却是萬古如一的，不變、不生、不死的。這是主觀唯心主義，系統的唯我論。證據是白沙下邊三段話：“人爭一個覺，才覺便我大而物小，物有盡而我無盡。夫無盡者，微坐六合，瞬息千古，生不知愛，死不知惡，尚奚暇銖軒冕坐金玉耶？”（與何時矩書——按，據白沙子全集應作林時矩。——筆者）又：“……即心觀妙，以揆聖人之用。其觀於天地，日月晦明，山川流峙，四時所以運行，萬物所以化生，無非在我之極。”（送張進士廷實還京序）“……會此則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與林郡博書）

白沙是不是主觀唯心主義或唯我論，問題不在於白沙的一再強調“我”，強調“我”與道合一後的心理境界和形而上的意義，而在於白沙如何來回答哲學的根本問題。即物第一性抑或心第一性，和人是否能夠認識外界的問題。

本文已論及白沙的“我”與道合一的境界，是涵養過程的最高果實，而不是從一開始就如此的。白沙對“我”能否與“道”合一的問題的唯心夸大並不根本地影響到他對哲學根本問題的答案中的唯物主義性質。因為這一問題的提出，正是以白沙的唯物主義思想——道和我（心）分立（即“道”不依賴人的意識而存在）這一思想為必要的前提。否則，“我”（心）如果先天地與“道”是合一，或者“道即心”，那所謂“經過涵養才能合一”的說法就根本是多余的。

白沙承認道是宇宙的實體，承認道是客觀地不依賴於心而存在的。人可以認識道。這就是白沙在哲學的根本問題上所表現的唯物主義思想。

白沙的哲學如果與湛甘泉的客觀唯心主義及王陽明的主觀唯心主義比起來，其區別是明顯的。白沙說的是“至虛受道”，“形交乎物，動乎中”。但湛甘泉說：“心包萬物而貫乎其中”（心性圖說）。“道即心”（粵秀山白沙書院記）。王陽明說：“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理，心外無義，心外無善。”“夫物理不外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人者，天地萬物之心也。心者，天地萬物之主

也。”（均引自陽明語錄）我想，單從這些關鍵性的觀點上，就可以看出白沙與他們的根本區別來。

至於白沙的“自我”是什麼東西呢？那就是“匹夫”（天人之際：“誰謂匹夫微，而能動天地”）。這個“我”，有一個肉體（七尺之軀），有一個“心”，也有一個“理”（通過涵養得來）（禽獸說），他以“自然”為“真樂”，在人生上，他要保持“隨時”的主動，要求“溫飽”，要求“天地清”，要求“萬世無甲兵”。通過涵養，掌握道、理，掌握仁，他達到與天地萬物渾成一体，於是就與道同其不朽。

呂振羽把最後一點作為白沙“自我”的全部內容，把他稱為“唯我論”。其實，白沙的最後一點雖然有唯心的誇張，但卻不是唯我論。在哲學上，唯我論是主觀唯心主義推論到極端的結果，與什麼天人合一固然不同，與白沙的哲學更不相干。這只要看看下面的解釋就可以明白：“唯我論，一種主觀唯心主義理論，認為只有人及其意識才是存在的，除此以外整個世界，包括所有的人都在內，實際上並不存在，它們只是人的意識、想象創造出來的。”（簡明哲學辭典，第468頁）

至於引“送張進士廷實還京序”的那一段，上文有“廷實之學”字樣，是說的張廷實的思想，更不能“張冠陳戴”。

最後，還必須再說明一下“靜坐”的問題，這是一切白沙的批評者，及主張白沙是唯心主義者的主要根據之一。

白沙的“靜坐”在白沙的哲學體系中的位置是：作為涵養方法之一的心理鍛煉（心學法門）的入門方法，這從他的“與賀克恭”中的“為學須從靜坐中養出個端倪來，方有商量處”可以看出來。因為“靜坐”只是“養出端倪”的方法，只是有了這個頭緒（所謂端倪）為學才有商量。明明白白說的是入門方法。

通過“靜坐”，要解決的是恢復心的自然的問題，即鸞飛魚躍的涵養。

這樣的位置及這樣的目的，決定了“靜坐”的方法，並不牽涉到本體論問題，也不直接牽涉到哲學的根本問題。

白沙的“靜坐”不是作為認識世界的方法，而是一種心理鍛煉，感情控制的方法，而且又不是孤立的，他是主張“隨動靜以施功”的。因此，也不牽涉到認識論或物心關係問題。

白沙在“靜坐”中，追求的是“全虛圓不測之神”，是“理智的定力”，但同時他又強調“不離日用”。

由此可见，他并不主张离开实际。因此，也不牵涉到否定实践（直观的实践）的问题。

当然，白沙的“静坐”也正和他的哲学一样，并不是完全没有缺点的。他有一个时期特别强调“静坐”，那的确具有一种脱离现实的倾向（主要在从江西返新会后那一时期），而且追求理智的定力，而把“静坐”作为入门方法，也的确容易使人走入神秘的主观的歧途，尤其是在封建社会那样的环境下。不过白沙的涵养论，原是“实践”、“自得”、“治心”（静坐是方法）三位一体的。作为他的哲学见解来说，静坐并不能被看作他是唯心主义的证据。

* * *

总的结论是：白沙的哲学基本上是唯物主义哲学。

他发展了“道”的较彻底的唯物观点，给予“道”以与整个物质宇宙等同的意义，给予“道”以整个宇宙的实体的意义。他修正了传统理学的“道”的唯心观点。

（上接第33页）

六朝墓中以沙河发现的一座建兴四年（公元316年）西晋墓规模最大，该墓是夫妇合葬的，整个建筑分成左、右两个墓室，每墓室又各分为四部分，全墓的砖多数都有花纹和纪年文字，可惜这墓早被盗过，余下的遗物只有金、铁、陶、玻璃等质料的器物七十二件。唐墓多属晚唐年间的，随葬物都是一般的陶器。宋墓以河南简家岡发现的三座火葬墓最为特别，这些墓在地面之上用灰沙预制件迭砌成坟面，其结构形式和现今广州大北的回族坟相似，其中一座墓的碑文刻有“维皇宋咸淳二年岁次丙寅十二月”等字，同地发现的一座元墓是至正二十四年的砖槨墓，这是广州第一次发现有绝对年代

他突出地在自己的体系中强调了“匹夫”“自我”，并且从“道”的观点，推论到自我的“心理解放”。自我的提出，自我对现实社会的“超脱”正意味着在传统的封建伦理的束缚中，开始发现了“个人”。

他底涵养论强调了实践和心的能动，把个人的心提到了哲学理论的高度。这与他的“自我”的提出，是完全相符合的。

然而，他的哲学体系，却未能超越出儒家思想的范围。他底从天人合一的角度把客观的道和主观的道作了合一的唯心主义的混淆，正正说明了他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中的基本矛盾，说明他的唯物主义哲学的不彻底性的一面。

这原是当时历史条件限制的结果。在那个时候，对于他底主要从自然界获得的哲学唯物主义，及从他的“大儒”“大隐”的社会地位及生活条件反映出来的“自我”的强调，尚缺乏足够的社会基础。因此，未能得到较大的发展。相反的，却招致了众多的非议，以及在湛甘泉、王阳明的手中变成了唯心主义。

可考的宋元墓葬，为研究当日南方地区火葬俗习的重要资料。明代墓葬发掘最少，其中以位于东山的一座明正德八年（公元1513年）戴绶夫妇合葬墓的发现为重要，该墓木制的棺槨仍保存如新，尸体、殓装都保存较好，殓装资料有棉、麻、丝三类，丝麻织品多已碎裂，但棉织品的布、巾、被、衫、袍、裙、裤、袜、鞋等虽已埋藏地下有四百多年至今仍如新的一样。

上述出土的大批历史文物，在研究古代的葬习、古代的建筑、制陶工艺、美术装饰和明代纺织业等诸方面都是极为重要的实物史料。

（麦英豪）

关于譬諭

杜守素

在談話中，在文章里，人們往往使用譬如某某、比方某某的語句，拿比較熟悉或比較具体的事物去說明不容易懂的东西或道理。这就叫做譬諭。

(諭也写作喻。)例如：孔子說：“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論語·为政”篇，北辰就是北极星。)荀子說：“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亿)物也同，故比方之、疑(拟)似之、而通。”(“荀子·正名”篇，天官指感官說。)在文学上，采用形象語言的譬諭，更是常见的。

汉朝刘向曾經說过这样一个有关譬諭的故事：

“梁王謂惠子曰：‘愿先生言事則直言耳，无譬也。’惠子曰：‘今有人于此而不知彈者，(問)曰，彈之为狀何若？’应曰，‘彈之狀如彈。則喻乎？’王曰，‘未喻也。’惠子曰：‘于是更应曰，彈之狀如弓，而以竹为弦。則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說者，固以其所知諭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无譬，則不可矣。’”(“說苑”)

这个故事，写得生动明白，別饒风趣；使人感到在談話中譬諭真是少不得的。

最早給譬諭下定义的，要算墨家吧。“墨子·小取”篇說：“辟(譬)也者，举也(它)物而以明之也。”拿另一物來說明这个物，就叫做“譬”。(古时說“物”，包“事”在內。譬即譬諭。)他們还把它的意思扩大了，作为辯論推理的七种方法之一。后来，王符說得更明白。他說：“夫譬喻也者，生于直告之不明，故假物之然否以彰之。”(“潜夫論·释难篇”)在这里，仿佛抽象地把它概括了；同时，还說出了人們所以采用譬諭的原因。

荀子和墨家，对于“辯”和“談說”(談說也包含辯論，所以荀子說：“說不喻然后辯”。——“正名”篇)都有一套的理論。墨家重理智，而荀子兼“用文”(荀子說：“故期命辯說者，用之大文也”。

——“正名”篇)，文質不同，說也有异。现在鈔引荀子关于“談說之术”的一段話于下：(“墨子·小取”篇，开头說“辯”那一段，可資比較。)

“談說之术，——矜庄以莅之，端誠以处之，坚强以持之，分別以明之，譬称以喻之，欣躍芬雍以送之，宝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无不受；虽不說(悅)人，人莫不貴。”(“非相”篇。“芬雍”，和也。“分別以明之，譬称以喻之”二句，原作“分別以喻之，譬称以明之”喻与明字錯倒，今校易。)

由此可见荀子怎样庄严地对待“談說之术”，从态度到方法，都有所說明；尤其重視文辭，把譬諭与分析并列。这还是繼承着“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傳統。在当前学术界正在展开“百家爭鳴”的时候，是值得我們学习的。

譬諭在文学方面，也表现为“比”“兴”的形式。“詩經”六义，比兴居二。孔穎达的“詩大序疏”說：

“比者，比方于物；諸言‘如’者，皆比辞也。兴者，托事于物，則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已心。‘詩’文諸举草木鳥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

比，指“比方于物”，而兴也含“取譬引类”的意思。所以，刘彦和說：“比显而兴隐”，隐和显只有程度不同，似乎把它們看做同类了。記得童时背誦詩經，什么“比也”、“兴也”、“賦而兴又比也”，老鬧不清，吃了不少苦头，原因就是从来的說法不免有含糊的地方。现在看来，把比兴看做广义的譬諭，大概不会很錯吧。例如：“碩人”的“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領如蝤蛴，齿如瓠犀。螭首、蛾眉”等句，以柔荑、凝脂等形容女人的手及肤等的美，固然是比方，有譬諭的意义；而“关雎”的“关关雎鳩”，以雎鳩的和鳴，去兴起“淑女”堪为“君子”的“好逑”虽

屬興辭，但既是“取譬引類”，又何管沒有譬諭的意思。惟其含蓄，所以更耐人尋味！

“要用譬喻，約有两个重要点必須留神”——陈望道在“修辭学发凡”中說，“第一，譬喻与被譬喻的两个事物，必須有一点极端相似；第二，譬喻与被譬喻的两个事物，必須本質上很是不同。倘缺第一要点，譬喻当然不能成立；使缺第二要点，修辭学上也不能称它为譬喻。”那就是普通所謂举例。

这种說法，在談說辯論上也还适用，不过在这里，大都更着重于“以其所知諭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至少是要以具体的事物去說明抽象的道理。例如“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传云：

“侨（郑子产名）聞学而后入政，未聞以政学者也。……譬如田猎，射御貫則能获禽，若未登车射御，则厌（压）复是惧，何暇思获？”

这是拿打猎不是学习射御的时候，去說明从政不是学习政治学識的事体。如果冒昧从事，不但学不好，可能还要出乱子。

可是，运用譬諭的时候，第三还要留神譬諭与被譬諭两个事物，都必須有客观的存在（要是道理就必须能够成立）；而且还須分出主从（被譬諭的是主，譬諭是从）；然后譬諭才有用场，議論才不落空。因此，就不許利用譬諭去轉移論点，更不許專靠譬諭作为論据。有一于此，理論便不能成立。

前者如孟子与告子論性。他不积极說明“人无有不善”去破告子的“生之謂性”的論旨，却斤斤去指斥他“犹以杞柳为桮棬”、“犹湍水，决諸东方則东流，决諸西方則西流”的譬諭，縱使把它們駁倒，也不能解決問題。

后者如熊十力先生之論宇宙观。熊先生說：

“各人的宇宙，都是大全的整体的直接的显现。不可說大全是超脱于各人的宇宙之上而獨存的。譬如大海水（喻本体）显现为众瀾（喻众人或各种物），即每一瀾，都是大海水的全整的直接的显现。試就甲瀾來說吧。他（甲瀾）是以大海水为体，即

具有大海水的全量的。又就乙瀾來說吧。他（乙瀾）亦是以大海水为体，亦即具有大海水的全量的。丙瀾，丁瀾，乃至无量的瀾，均可类推。据此說来，我們若站在大海水的观点上。大海水，是全整的现为一个一个的瀾。不是超脱于无量的瀾之上而獨存的。又若站在瀾的观点上。即每一瀾，都是攬大海水为体。我們不要当他（每一瀾）是各个微細的瀾。实际上，每一瀾，都是大海水的全整的直接显现着。奇哉奇哉。由这个譬諭，可以悟到大全不碍显现为一切分，又各各都是大全的。这真是玄之又玄啊。”（“新唯識論”上卷一頁，因为这一段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所以不加删节。着重点是笔者加的，标点及注則仍原書。）

真是玄之又玄啊！除了借用熊先生自贊的這句話，我实在找不到其他的評語。

我們看，熊先生所要譬諭的“理論”，——即“現象世界中，每一事物，皆是真心（即本体）所现。”（熊先生語）也即他所謂“可以悟到”的“大全不碍显现为一切分，又各各都是大全的。”——根本不能成立。因为（一）所謂“每一事物，皆是真心（即本体）全体所现”，只是熊先生的幻想，唯心主义者的濫調，沒有实在性的。（二）根据他所謂“由这个譬諭，可以悟到大全……”云云，可见熊先生的“理論”，至多也只能說是“这个譬諭”所投射的影子（即抽象地概括了“这个譬諭”的东西），影子怎能成为理論？因而譬諭也不成为譬諭了。而（三）“这个譬諭”呢？他說：“实际上，每一瀾，都是大海水的全整的直接显现着”，然而实际上，就沒有这样的“大海水”，也沒有能够“攬大海水为体”的“瀾”，也即是說客观世界上的大海水与瀾根本就沒有这样的关系。因此，归根到底，“这个譬諭”，也是一种幻想，即不外是把大海水和众瀾硬鑲嵌在那所謂“大全不碍显现为一切分，又各各都是大全的”的框子里而幻想出来的，換句話說，就一度由投射而成的影子又反射回来了。影子的反射又怎能成为譬諭？到这里，譬諭与被譬諭都幻化了，熊先生的“理論”也就落了空。

释 龟 蛇

秦 牧

“风樯动，龟蛇静。”

“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龟蛇捧持长江桥。”

……………

由于长江上建了大桥，有关这件事情的吟咏很多都提到了龟山和蛇山。龟蛇对峙，龟蛇被人并提，这事情本身究竟有没有什么涵义呢？

有的！这事情牵连到我们民族的古老文化，蕴藏着我们先民的憧憬和幻想，细想起来，这真是意味深长的一回事。

隔着滚滚的江水，一蛇一龟，两山对峙。它们被人这样称呼的历史已经异常久远，甚至不易稽考了。人们这样给它们命名，决不是什么偶然的事。

因为在许许多多的其他的场合，龟蛇也总是联在一道的。在好些庙宇的前面，常常有龟蛇的石刻。一只雄壮的大石龟，背上驮着一条石蛇。南京的灵谷寺，佛山的祖庙，面前就都有这样的东西。特别是奉祀水神的北帝庙之类的庙宇，这样的石刻尤其平常。著名的佛山祖庙，正是水神的庙宇。

为什么龟和蛇总是被联在一道呢？难道仅仅是因为它们同属于爬行动物吗？古代的人们对于动物的分类学是不会象近代的人们这样有兴趣的，显然它的原因决不在这儿。

有一种世俗的穿凿附会之说，讲雄龟不能交尾，雌龟和蛇配合，事前在自己四周撒了一泡尿，雄龟怒气冲冲要来干涉的时候，被这一条尿的阵线阻住，完全无法可施。这和“腐草为萤”、“羊跪乳”、“螟蛉有子，蜾蠃负之”等具有同样性质，都是由于人们对生物现象的缺乏了解而产生的传说，几百年来的是有相当巨大的势力的。这就是“乌龟”一语所以被人认为是极端侮辱的骂人词语的原因。

然而龟蒙受这种不白之冤的历史决不会很久，

产生这传说的年代最早不会早于明代。在这之前，龟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有着十分崇高的地位。在古书里，它和龙、凤、麒麟一道被称为“四灵”。唯其是“灵”，它的甲板才成为殷商卜辞寄托的材料，殷商的历史也就大半写在它的甲板上。春秋时代，大将的将旗上有绣着乌龟的，汉代的王侯，印章上常常装饰着“龟纽”。龟的声势是这样的喧赫，古代的天文学家把天上的星宿分为二十八宿，这二十八宿分隶于青雀、黄龙、白虎、玄武（乌龟）四方，其中乌龟就代表了北方的一方。北帝庙也可以说是龟神庙，北帝庙的神旗是黑地上绣七颗星（当年三元里抗英战争时用的指挥旗就是从北帝庙里取来的这样一面旗），七颗星表示北斗七星，也就是“玄武”一方所领的星宿，黑色就是代表乌龟的颜色。来源甚古的五行观念，把木火金水土的五行，来配东南西北中的五方，配青赤白黑黄的五色。乌龟代表北方，代表水，代表黑色，从北帝庙神旗的那个模样儿，可以想见，乌龟正是被古代人们当做水神一样地尊崇着的。

为什么那个“雌龟偷蛇”的无稽之谈是到明代以后才流行起来的呢？因为一直到宋代，龟的崇高地位始终未曾动摇，宋代的人们流行用乌龟壳来做帽子（苏东坡、陆放翁都戴过这种帽子），就很可以说明这一点。如果乌龟被人当做是耻辱的象征，还有谁愿意戴着顶龟壳帽子在市街上到处跑呢！

那个无稽之谈在明代以后流行起来，相当地影响了龟的地位，龟的形象开始从许多器具服饰上消失了，人们极少用龟字来做名字了，也渐渐忘记北帝庙和“龟神”的关系了。但尽管如此，由于它在历史上势力的巨大，它的余威仍然不小。卜卦的人常用个龟壳来占卜，正是龟被视为灵异的历史势力的遗留。而且，中国虽然已经极少人用个龟字来做名字，在日本，在朝鲜，保持当年中国的古风以龟字命名的却至今仍大有人在。

这就说明，龟蛇并称，龟蛇成为形影不离的石刻，龟蛇成为隔江对峙的山峰，和那个“雌龟偷蛇”的无稽之谈完全无关。事实上在这个愚昧的传说流行起来以前，几千年间龟蛇的形象就已常被人放在一起。而且，如果水神庙前的龟蛇石刻，是和这个传说有关的话，岂不是大大“褒赏神明”了么？

龟蛇二物的如影随形，应该是另有理由存在。

这里得再来谈一谈蛇。龟在历史上地位这样崇隆，蛇又是怎样呢？

回答是：蛇的地位也一样高得很。在古代神话里，蛇就是龙，龙就是蛇，它们几乎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用龙蛇二字来表示事物品格的极端悬殊，那是后来的事。在古老的神话时代，它们原都是被目为神物的。

闻一多先生的“伏羲考”、“端午考”、“龙凤”等文章，十分精辟地说明龙凤在生物界并不存在，而在中国的神话、民俗上却占有巨大地位的历史社会根源。据他的说法，龙和凤代表着我们古代民族中最基本的两个单元——夏民族和殷民族。龙是原始夏人的图腾，凤是原始殷人的图腾。因此夏民族的许多祖先传说都和龙有关（如“鲧死……，化为黄龙，是用出禹”）。殷民族的许多祖先传说都和凤有关（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龙，这样一种披着鳞甲，生着脚爪，头角峥嵘，翻卷飞腾的形象，是只存在于图腾中的一种虚拟合成的生物。龙的基调还是蛇，后来有一个以这种大蛇为图腾的团族兼并吸收了许多的形形色色的团族，大蛇才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头鬣和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这就形成龙的模样儿了。以后龙的形象成为帝王以政治权力加以独占的祥瑞，于是这种在生物界中并不存在的东西渐渐变成家喻户晓了。

龙的基调既然是蛇，龙蛇关系的密切可想而知。龙字在金文中从“巳”，“巳”字就是古代的蛇字。夏族先民崇奉龙的图腾，他们的神话传说中实际上是龙蛇不分的。神话中的女娲和伏羲，都是人首蛇身。据闻一多的考证，夏族重要后裔之一的吴越，城門上也画上龙和蛇来趋吉避凶。从这些事例，可见在古代神话中，龙和蛇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闻一多的这些考证，对于我们理解“龟蛇”帮助很大。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蛇和龟一样，在神话到处充斥的先民时代，它们是被视作祥瑞的。

然而这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可以成为祥瑞的东西多得很多，麒麟、凤凰、白虎、丹雘……，不胜

枚举。为什么龟蛇常常联在一起，而且在它们出类拔萃的地方，总是和水很有关系呢？例如龟山和蛇山，是隔着长江对峙的，龟蛇的石刻，是常常出现于水神庙前的。

这就不能不使人想起“山海经”“拾异记”这一类神话古籍中，关于夏禹治水的传说了。

龟蛇对峙并立，和这些神话传说，关系是异常密切的。

照那些古代神话的讲法，大禹治水的时候，有一只大乌龟和一条龙跟着他。大乌龟驮着天上神奇的“息壤”，让大禹随时撒下来变成堤防和陆地。那条叫做“应龙”的龙用尾画地，开辟了江河。“拾异记”铺陈“山海经”的说法，叙述当时的情形是：“禹尽力沟洫，导川夷岳，黄龙曳尾于前，玄龟负青泥于后。”这一龟一龙，就是大禹治水时的好搭档。

照那一类神话古籍的讲法，这只大乌龟不仅帮助禹治水，以前献策给禹的父亲鲧去偷天帝的“息壤”来治水的也是它。帮助禹治水的不仅有这条“应龙”，授他度量天地的玉简以治洪水的伏羲，就是一个人首蛇身的大神。而且大禹本人，在那些神话中也被说成是一条黄龙变成的。

不仅治水这一方面有龙（蛇）有龟，兴风作浪，造成洪水灾患的那一方也有蛇有龟。那个到处作乱后来被大禹征伐的共工，在神话里也是人面蛇身，而且他的部属也都是蛇身。屈原的“天问”对古老的神话传说提出了一百七十多点的质疑。里面有好几处都问到了这些事情。“何以要使巨鳌在海里匍匐，鼎着五山使它们安稳，何以又让龙伯钓去巨鳌，使它在海上飘零？”“应龙教夏禹疏通九河，它是怎样用尾巴画地？”（根据郭沫若译诗。）从“天问”中的这些词语，可以想见这一类神话传说当时流传之广和对人们思想认识影响之深了。

在这些神话里面，蛇和龟，都是能够对水起决定作用的巨灵。真象是“风从虎、云从龙”似的，水，是由蛇和龟来操纵的。大禹因为得到了蛇和龟的帮助，因此才治得了洪水。

神话自然十分荒诞无稽，然而它产生的历史社会根源，却是十分现实的。这些神话是古代民族对于自己先民所崇奉的图腾，关于自己著名先人的传说，以及洪水、战争等等故事在长时期中杂糅结合，错综变化而成的。

有一件事情很清楚，龟和蛇，一直被视为操纵洪水的灵物，加上了大禹治水神话的广泛传播，它们的地位更加显赫了。龟和蛇被相提并论，在“山海经”中并不止夏禹治水一处，那里面提到一些奇怪的民

族，說他們用青蛇做裝飾，接着又說：“一曰：……各操一龟。”龟蛇在這兒是聯在一起的。“山海經”里面也已經有了“蛇巫之山”和“龟山”这类的地方名稱。龟蛇也是聯在一起的。

講到這兒，我想：對於龟山蛇山隔江對峙，水神廟前常有龟蛇石刻這一類事，可以作這樣的臆斷了：它是和我們民族的古老神話傳說密切關聯的。魚在水里游動，人們是視作尋常的，然而龟蛇在水里游動的姿態却着实使人贊嘆；人們的拜物情緒不由得心曠神怡。這兩樣東西的出現，是人們希望用它們來制伏洪水的象征。由於它們常常聯在一起，才刺激了明代以後那些想“格物”但自然知識又十分淺陋的人們製造了“雌龟偷蛇”那樣荒誕不經的傳說。

我們可以想象：在古老的年代，有人來到長江岸上，那時武昌、漢陽隔江對峙的兩座山峰還沒有

名字。這些人要來給它們命名。他們看着驚濤拍岸的長江，俯瞰着它的滾滾流水，回憶着它的可怖洪峰。他們就想，讓這兩座山叫做蛇山和龟山吧！讓它們象傳說中的龟蛇一樣，來制伏洪水吧。經他們這樣一命名，生活在那種神話氣氛中的群眾莫不稱善，於是世代相傳，古老的名字就一直叫到現在。

至於水神廟前有那樣的龟蛇石刻，那正象基督教之有十字架，佛教之有“浮屠”一樣，都是“題中應有之義”，是用不着解釋的了。

現在的長江，象毛主席所吟詠的：“一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這東方第一大橋就架在蛇山龟山上面，真是妙極美極。長江南北聯系起來了，古代人的朦朧的愿望由這一代人的手把它完成了。這一代人正在大踏步創造着比神話更瑰麗的奇跡！

广东省1958—1962年科学工作规划在編制中

广东省过去几年来科学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全省有大小独立研究机构四十个，在研究工作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由于过去尚未有统一的规划，研究力量还未充分发挥，存在着一些问题。我国第二个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已开始执行，科学工作必须有计划地进行，目前广东省编制五年科学工作规划的条件也已具备。为了动员和组织科学技术力量密切配合广东生产建设事业的大跃进，充分发挥科学研究的力量，有计划地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最近成立的广东省科学工作委员会正在积极组织各有关单位和专家，开始编制1958—1962年科学工作规划，并决定在3月间召开全省科学工作会议进行讨论。

2月3日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召集了省、市有关厅、局、中央驻地方机关、科学研究单位以及高等院校等负责人和科学家共一百多人，举行会议，传达了去年国务院科学工作规划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的精神，布置编制广东省五年科学工作规划的工作，提出编制科学工作规划的任务与要

求。在编制规划时，必须明确科学研究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目的，并贯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需要与可能相结合的原则，根据国家十二年科学事业的远景规划，结合广东社会主义建设以农业为重点的情况，围绕着全国农业发展四十条纲要（修正草案）和广东省1958—1962年的农业发展规划，提出科学研究工作的重点项目、科学机关的协调、科学工作条件的改善以及干部培养等意见，使规划既能保证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和年度计划中有关本省负责或协作的部分的完成，又能适应本省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目前，编制五年科学工作规划的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并已成立了农业、工业、医药卫生、基础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等五个临时专业小组，各专业小组将按学科分别组织科学家进行酝酿，征集各有关方面的意见，然后着手草拟出广东省1958—1962年科学工作规划纲要。

（见军）

百年前广州絲織工人的生活情况及其参加 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史料

胡希明

关于广州絲織业的实际情况问题，据1957年8月广东省文史馆向广州市的絲織业老工人调查，他们众口一词地说：广州的机行，是在雍正年间开始的，是由江浙来的师傅传授的。然而我们翻遍本省志书，并无关于絲織业的记述。至今仅存的老工人，对于百年前絲織业的实况，仅凭记忆，故传说不一。兹根据广东省文史馆调查资料加以整理，大致如下：

絲織行別

蟒袍行：又名朝蟒行，是絲織业中最老的行，織成品是供皇帝及文武官员服用的，花纹有龙、凤、虎等。不再分小行。

十八行：即用八条緯絲组成一齿筥来挑織花纹的，八絲緞也属于此行。大行内再分三十余小行。

十一行：八絲再加三絲名为十一行。即是说除会八絲的技术外还会三絲斜的技术。大行内约分为几个小行。

金彩行：織香云紗，分有二、三小行。

广紗行：有旧广紗、新广紗、三紗及已忘名称的四小行。

这些小行，是因各大行的内部工人，从关系或感情而分组的，并非脱离原行的独立组织。

该馆另一调查资料说：百年前广州絲織业，还可分为五行，即洋货庄三行（安南货行、新加坡货行、孟买货行）、本地紗綢庄一行和福州货庄一行。

当时孟买货要染色挑花，较他行货色为特别讲究。贸易额也较大。

屈大均著广州竹枝词中，有云：

“洋船争出是官商，大字门开向二洋，五絲八

絲广緞好，銀錢堆滿十三行。”

这首诗，应该是百年前洋商对絲織业的剥削和广州絲織成品大量输出的写照之一。

絲織工人的組織——西家行

根据许多位老絲工记忆所及的往事，可综述如下：

当絲織业兴旺时候，有过几万工人，东家行（资方）是以錦綸書院的錦綸堂为集议之所，西家行则以先师庙（今广州中山七路冻家祠之右）为集合地点。

西家行立有规矩，大家都要遵守。如有犯规，就会受到开除出行的处分，出行之后，全行不再收留。

每行每年做“牙”四次，各有固定的日期，一般是三月开工，五月“关公诞”，八月“先师诞”，十一月“完神”各一次，有事时也临时召集，由牙首向各工人收款设席，牙首是轮流担任的。许多事都在席上商讨解决。

每行设有“先生”（或称师爷），由大众在工人中推选，负责对外交涉及料理内部文件。有月薪，做牙时可免费与席。

西家行为了工人利益，常向东家行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例由西家行的先生与东家行的先生先行交涉，如果不能解决，就全行不做工（罢工），休息期中，“揽头”（或称当家，大部分是西家行工人，揽头及其家人也做工，一般是向东家领取材料，发给工人们，并供给工人们膳食）照样供给伙食，在不做工期间，大众挑选部分工人，在各行门口巡视，如有工人私自上工就公议开除。

西家行与东家行的斗争，每次都是胜利的。如

东家行不履行諾言，还要于执行諾言后，罰款若干，此款全部用于購買鞭炮，庆祝西家行的胜利。

关于西家行的威力，在清人著作（作者姓名、时代无可考）的章回小說“万年青”（或名乾隆游江南）中，也有过記述。作者用“这人道”的口吻，描写錦綸行的情况說：“你这老先生是外路人，我不妨直对你說，否則多言惹祸。只因錦綸行中人众財多，又最义气，一鬧出事，通行使錢，出力帮助。东家行里，有身家的居多，平素安份，若这西家行，都系手作，單身汉子，十居七八，爭强斗胜，惹祸踴跃。一經有事，东家亦不敢阻止，反要随口附和以博众伙欢心，若不如此，即上会館，知照通行，不接这字号生意。故此每有因小事議罰，东主爆竹，通行摆酒，賠不是者以为常事，此是該行东弱西强的向例。”

依据老工人的口述与此小說中的描写，大致上是相符的。

絲織工人的紀律

关于清代广州絲織工人的紀律，比較詳尽的原始材料，应是“叢信众立”的“叢信館規”。原文如下：

“古者朋友，联岐二之形骸，孚合一之膈膜，忘年忘分，同志同心，不在春秋，紹期耐久，况复由来一脈，于今序屬五倫，幸值錦綉之齐荣，适經綸之尽美，但念怡怡手足，須当聚首，时勤而无駐足之区，故觅談心之所，俾得友直友諒之相規，合力合心之互顧，但貴循規蹈矩，幸无越分妄为，誠恐人心难拾，遂定片紙規章，愿毋愆情而負义，共守旧模而范誠，此幸甚焉。

謹將議規列下

一議本堂兄弟宵行必禁，夜犯必懲，防御奸匪，庶免慢藏誨盜之虞。

一議凡待人必要和顏悅色为首，务当堵惡扬善，有事宜当斟酌，切莫欺弱畏强，此为剛柔相济之根源也。

一議館中不得容留窩藏匪类，并屯貯违禁等物，及包揽外人在館領取行中花紅，声明确据，立即驅逐。

一議邀來朋友在館出入歇宿，若有被他偷窃什物，为邀客之人身上賠回。

一議鋪位只許晚攤朝拆，因地狭人多，以免相碍，各宜为要。

一議凡有东家秤絲綫到門秤者，不得阴謀詭灭，如有私典押不交回东家者，即当此人館底扣回，抵償交还东家，余外充公，复將此人出館，如无館底者，不得在館秤絲綫，恐有意碍涂污本堂名目。

一議不許在外滋事生端，为非作歹，煽騙撻誘，鬧娼鬪禍等情，如违斥逐，以免干連。

一議在館不得酗酒喧嘩，酒后不得粗言俗語，犹恐冒犯鄰里，最宜严禁，免失規模。

一議凡有妇女过門，不得花言呼喚，有失观瞻。

一議館中所置什物，如有錯手毀爛，原人即日置回，以免临时无应用。

一議严禁大小賭博，招集盲妹狡童妓妇，在館歌唱歇宿，如违斥逐。

一議館內設立竹簽，凡遇有事派簽到者，立携簽到館共議，并館中有事必要和同众友鳴鼓而攻。

一議外人不得在館歇宿，及在館滋擾鬧事等情，有碍本堂名譽，但正人君子，只許住三五天之間，确系館友限住十天內，如过外即要登牌簽香油費用。

一議館友不是住館与及外人，不得私自上楼，及入房內私拆各床鋪，如有违犯者，即作盜論，以免多疑。

一議偷窃館中什物，及不問自取，如有人見証指出者，立即传簽出館，將其人館底充公，折半归指証得領。

以上規條务須遵守，如有违犯者定必照例执行，各宜自重为要。”

絲織工人的另一組織联和堂，也有“常规”：

“一議本館乃專为同人駐足而設，凡駐館各友不能恃众橫行，禍福无門，为人自招，同业同居，宜一团和气，縱有意见参差，各执一是，只宜集齐館友，評分曲直，不能輒逞野蠻执拗，致伤同館和气，倘有在外招搖生事，往娼寮賭館滋鬧等情，本館概不肩担外仍查訪，若果由本館人无理取鬧者更將原人鞭責，并革去館底；拘逐前科館底充公免追。

一議本館內无拘大小物件，欲借用者，須先对館友声明，挂号，始能取去，倘有遺失毀破，須借用之人賠还，无得推諉，如有违例，不問自取或毀破不賠，即將原人照前条革逐。

一議凡住館各友衣物，未經原人允許，不能擅取，违例者即作盜論，亦照前条革逐。

一議本館除同人住宿外，无得招聚館外閑杂人住歇，违例致生波累，即为經手招呼之人是問。”

絲織工人与武館及天地会

在广东各地，关于“机行仔打胡惠乾”，“錦綸行摆擂台”的故事，流传已久，且甚为普遍。这些故事，对于絲織工人当时的生活情况，有着具体的反映。

据现存的七十五岁老工人：叢信館的“二哥”黎洪說：

“百多年来，机行工人，在做工的余暇，常請拳师到館教練武术。但不是全体参加的，参加与否，听每人的自愿。

練武的目的，是通过这練武来巩固本身的組織，形成一种自卫的力量。同时，为街坊作公益事业，例如义务性地救火，捉贼；都是不取报酬的，但接受街坊送来的一些礼物。”

另一位年近七十的老工人陆巧初說：

“絲織工人所重者是忠义二字，好打不平。本行兄弟尤其是一同練武的师兄弟，如被人欺侮，查明情况后，便出力帮助。

以前，工人的日常生活是很苦的。譬如吃飯，百多年来流行着几句口語，是：‘早餐头一刀（即猪血），午餐竹夾帽（即烏榄），晚餐阿弥陀佛（即油豆腐）’。除每月初二、十六两日，由东家負担‘作牙’，每次每人四两猪肉外，在清朝时代，每餐买菜只有一个銅錢。

住在館內（宿舍）的工人，依规矩不能烟、酒、嫖、賭；每晚无事，便練習武术，在清末，还有武館十多个，每館多的有百余人，少的也有几十人，多数是請师傅到館（宿舍）教武，少数到其他武館就学。

練武艺的目的，也有点娱乐的性質，借此以調劑生活上的單調及煩悶。

有人說，練了拳就会手硬，以致影响了絲織的技术，那是无根据的，練武的人身体好了技术也跟着好，因此从清乾隆年間起，机行練武的人，約占百分的八十以上。”

关于机行工人与天地会的关系，我們找到的材料大致如此。可作旁証的，是：

天地会又名三合会或三点会，在清初康熙时，广东即有此秘密組織，其宗旨在“反清复明”，太平天国“頒行詔書”中，“救世安民諭”，有云：“查尔們壯丁，多是三合会党；查思洪門歃血，实为同心同力以灭清。”絲織工人，是一貫地不对清朝效忠

的。流传故事中之机行仔打胡惠乾，也說明了这点，因为当时的胡惠乾并不忠于少林派“反清复明”的宗风，而与旗人童千斤等合作的。其次，三元里抗英的义勇都“头裹紅綳”，李文茂抗清起义的义勇也以紅巾为标志，这与天地会“头包紅巾，身穿白衣”的标志是有关联的。絲織工人参加这两次斗争，与天地会必有密切的关系。

絲織工人在其館（宿舍）內，依例公推大哥、二哥、三哥等三人，有事商議，由大哥先发言，后及二哥，其他兄弟有意见，随后发言。这种兄弟关系的組織方式，与洪門、天地会的組織方式也有相似之处。

即因此，机行工人与天地会，应有其深切的关系；虽然这是他們历来諱言的。

参加三元里打仗

关于广州絲織工人参加三元里抗英斗争的情况，据住在广州叢信宿舍（絲織工人的宿舍，在今龙田大街）的老絲織工人潘天海（已歿）說：

“三元里打番鬼的事，我們听父亲說过：当时，紅毛鬼（指英人）欺侮我們过甚，在西村、南岸、三元里一带奸淫擄掠。我們广东人对于妇女被人侮辱是最憤激的。所以在三元里一带打起来，一連打了好几天。

我們机行的人，最講义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当时机行里便有几十間武館，每人都会些武术。

三元里打仗时，正值我們行中的淡月。三元里的乡民，用紅帖来請我們帮手，我們行中人，都踊跃参加，初时出劲三四百人，以后增到一千左右。

我們以七星黑旗为队旗。

初去时是自己食飽飯去，以后由乡民供給一餐。

前后打了好几天。战后，乡民送来了几十箱餅犒赏打仗的工人。

陈棠是花县人，是我們西家行的人。”

另一老工人陆巧初說：

“参加三元里打仗的絲織工人，按时期來說，應該是八絲行。

八絲的旺季是每年七至十月。三、四、五月是淡月。也正是当年三元里打仗的季节。

三元里打仗后十年，很多絲織工人，又参加了以李文茂、甘先为首的紅巾軍，仅广紗行就有百多人。紅巾失败后，清朝官吏，到館捉人，这些人

从容被捕，絕不連累他人。

有一位撕花工人参加过紅巾，事后住在館里，一天官兵来捉他，他还按照館里的规矩，把‘晚攤朝拆’的床板挂好了才跟着官差走，那一走，自然是被杀害了。”

絲織工人的杰出人物 —— 陈棠

在过去的志書中，并没有纪录陈棠这个名字，但依据我們的調查考証，陈棠这个人是与广州絲織工人不可分开的，尤其是与絲織工人参加三元里反英斗争是不可分开的。

在三元里的战火尚未燃烧之前，据“夷务始末”及英人宾汉著“英兵在华作战記”所云，四月初一日，陈棠已經集合了义勇数百人，协同清軍四川北鎮总兵张青云守西炮台，开炮击伤英軍巨舰一艘——英軍司令爱尔斯的旗舰摩底士底号（据“英兵在华作战記”）。其后英軍登陆者百余人，遭遇陈棠的伏兵，全数被歼。英軍因此退回南岸。

清軍統帥靖逆將軍奕山，于事后奏报，也不得不說“乡兵急公好义，奋勇杀贼”，且指出：“陈棠自募义勇，在西炮台协同官兵堵御，打仗出力。”

馬克思、恩格斯于論鴉片战争文中，对此战役，也作了高度的评价，他說：“……不久以前在珠江的軍事动作中，华人在大炮射击和防御方法上，表现了这样高度的技术，致使人們怀疑在中国軍隊中間，是否有欧洲人参加，在一切实际事务中，——須知战争多半也是一种实际事务——华人远胜于一切东方民族……”（“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国”第七十三頁）

陈棠及其义勇于西炮台战后，到五月廿五日，又对自縉溪登陆的英軍，設伏阻击，杀了一个英兵（“英兵在华作战記”）。当三元里战争爆发之后，陈棠又应約出队千余人，参加战斗（据絲織老工人口述，詳另文）。死事者有梁永图（泮塘人，见南州書楼藏的“番禺县志采訪册”）。

另說，陈棠还杀了一个英海軍軍官，俘获了一柄金剑，上有“鎮守叻咄吐伯爵之业”的英文字样，和一枝双头手炮。后来盛传杀的是英將伯麦，其实非是。

西炮台战后，奕山为着冒領战功，上奏清廷，侈談战績，在奏章中，虛構了一个“杀黑白夷匪三百余人”的“东北西北义勇头人梁彩瑛”。把义勇的

战功都归之这个查无实据的“或人”。于論功行賞中，也提到陈棠，說：“蓝翎即选府经历、县丞陈棠，請补缺后以应升之缺升用。”至于陈棠是否由此而一行作吏，則无可查考。但机行老工人們說：“陈棠以后当了紅巾。”

我們推想：陈棠应该不会貪恋奕山所“恩賞”的那支“蓝翎”。因为当时奕山保举了大批“得力人員”，都得了“白石頂子”和“蓝花翎”。民謠嘲說：“有頂皆白石，无帽不蓝翎。”又說：“鬼子来，走得快，有白頂蓝翎戴。”作为机行的西家行首腦，以“忠义”为信約的陈棠，决不致貪此微賞而失大义。同时，当时参加三元里抗英斗争的人物，如顏浩長（手刃英將毕霞的定拳長），甘先（城北少年的首領），周春（首登四方炮台的豆皮春）等人，在战后，都不受清政府的獎賞，而且先后为清政府所迫害，最后都参加了紅巾軍和太平天国。和他們休戚与共的陈棠，自应不在例外。

贅 語

1841年5月30日（清道光廿一年四月初十日），广东人民在广州三元里展开的抗英战争，集合南海、番禺、从化、增城、花县四百余乡的劳动人民（据新发现的碑文，参加此役，并不仅是城北一百零三乡的农民），在平英团的旗帜下，凭借簡陋的装备，对重炮坚兵的英帝国主义者进行壯烈的战争，其规模之雄伟，战果的輝煌，在世界人民反帝战争的历史中是重要的一頁。

至其影响所及，正如毛主席所指示：

“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毛澤东选集卷二第六零二頁）。

这次战争，其主力是自动組成的农民，已为众所周知的史事，但近年来經我們的多方調查，参加这场大战的，除农民以外，还有广州城內的絲織工人和打石工人（关于五华县旅省石工参加抗英作战考，拟另文）。然而，这些史实，却因官書不載，私史不传而逐漸湮沒了。

本文所述，多为原始材料，有待于更广泛的搜集和更精細的整理，倘能因此“引玉”，或聊供参考，那正是我們的希望。

1月31日雨夜。

1898—1899年广东遂溪人民反抗法帝国主义侵略广州灣地区的斗争

(續完)

五 遂溪人民的英勇抗战与清政府的屈辱投降

在遂溪人民积极准备抵抗的同时，中法之間的外交談判于1899年3月开始在北京、巴黎間恢复举行。对于法人恃强侵占我国領土并拖延划界問題，两广总督譚鍾麟与广东巡撫鹿传霖在1899年2月24日上奏光緒帝，表示了自己的意见。首先指出法兵登陆后的暴行：“不照会地方官，径行登陆占据炮台，竖立法旗，并于离台后数十丈建椿造桥，意图永久占据，任意修筑、掘毀坟墓，人心已怀愤恨，复縱法兵入村騷擾，反借詞民众哄斗，竟放枪炮，伤斃村民先后数十命，焚毀民屋数十間，海头村附近各村，不堪残虐，窟集数千人，众情汹涌，几酿衅端。”^①关于划界問題，指出系“有意耽延，其心叵测”。而强占徇洲炮台，尤出情理之外。并指出目下情形，“万难再事迁就”。要求轉商法国，“另派公正委員，迅速来粵勘界”。“但將广州灣租作泊船囤煤之所，其强占之徇洲、海头炮台等处，法兵务于未勘界之先，全行退出。不得借詞混爭，以弭衅端。”^②譚鍾麟的意见，本来亦是屈辱的意见，但在3月4日，法国公使至总理衙門，商量恢复划界談判时，法使毕盛竟指責譚鍾麟的反对态度。認为“广州灣系帝国政府所租讓，而非一地方官員所租讓”。并且威脅地說：“如果我人不是极端忍耐和节制，这些事实，就將挑动起我人軍隊与地方官之間真正的冲突。”^③关于中国駐法公使庆常向法外交部提出的二項要求(1)对法国提出的划界方案，作一些压缩和修改；(2)在未定界以前，法兵不得开进未划界地区。为法国外交部所拒絕。并且指示毕盛，要求按照軍事当局的要求占领必須的領

土，并坚持中国政府必須实行全部諾言。因此在5月27日，毕盛就向总理衙門提出有关广州灣管理公約草案，并声明即將占领所要求的各主要据点的强硬意见。在巴黎，法国外交部長接見中国公使庆常时，宣告已授权海軍，占领各据点。并对两广总督的态度，“予以非常严厉的譴責”。事情很明显，到此时机，法帝国主义，已借口地方官的不同意，准备扩大其武装占领。到6月30日法远东舰队分队总司令高礼容海軍中將給法国海軍部的报告，声称在6月24日和25日已占领三个据点。并称中国地方政府拒絕移交行政卷宗。在两广总督譚鍾麟給总署的报告，說法輪四只，帶兵千余，至海头汛停泊，并派兵分駐赤坎、門头、新墟、黄坡等处，并面告道員潘培楷謂“地已归法”，广貼告示，查收遂溪、吳川粮册，催撤厘卡等情形。足証法帝国主义，已毫无忌憚地进行对我国領土主权的掠夺。这种公开的无耻的瘋狂侵略行为，不能不引起爱国的遂溪人民的无比的愤怒，与坚决的反击。

在进行組織武装反抗的同时，遂溪各阶层人民，紛紛起来要求抗敌御侮，在5月23日，“法四画官(相当于尉官)在赤坎潮州会馆口出大言，謂遂界已有成議，以万年桥为限，数日內欲在赤坎之沙灣嶺頂，起造兵房”^④。万年桥地近遂溪县城，这一消息传出后，引起广大人民的愤怒，“无不切齿奋臂，欲与决一死战”。地方士紳，要求李鍾珪轉稟督撫，“速謀抵制之方”，并要求調刘永福大軍来

①② “清季外交史料”，卷137，第1—3頁。

③ 法国外交文件(1898—1899)第11号。

④ 李鍾珪：“遂良存贖”——“据情轉請院宪設法保全地方票”，近代史資料1956年第4期，第30頁。

遂，以資鎮懾。李鍾珪在5月26日致電廣州督、撫，詢問以万年橋為界之消息，是否確實。廣州復電：“總署寄圖，并無此事”。這樣，更增加人心的憤慨。法兵在5月27日曾一度闖入黃略村，又勇因受約束，未與計較，法兵自動退出，但形勢已到一觸即發的關頭。

從6月起至8月初，清政府所派劃界專員潘培楷與雷瑯道周炳勛仍在赤坎與法水師提督高禮容舉行會議，談判過程中，法方在吳川縣屬，只允讓出黃坡一墟，而遂溪縣界反欲增多和擴大，界綫延至石城縣屬安鋪埠的北羅海口^①。並且指責潘培楷位望太輕，不願與之商量。這樣，談判便成了僵局。事實上，法國外交部早已授權高禮容，作一些不重要的“細節性的讓步”，而達到他們更重要的目的。

法帝國主義為了掃除談判的“障礙”，對清政府繼續施行壓力，一面由海軍部授遠東艦隊分隊司令高禮容以行動之權，一面要求清政府撤換談判代表，畢盛并在7月19日向總理衙門提出撤換兩廣總督譚鍾麟的要求^②。在7月12日法國遠東艦隊分隊司令給法海軍部報告，已透露出賣國漢奸廣西提督蘇元春有擔任談判代表的消息。

清政府總理衙門，在法國外交與軍事壓力下，繼續作了可恥的讓步，總理衙門在8月10日給清政府的報告，同意另派代表，果然是廣西提督蘇元春，擔任欽差，負責會同法員辦理界務。蘇元春原為廣西提督，中法戰爭後，在廣西經常與法帝交涉，成為賣國的漢奸。畢盛得到這一消息，非常高興。他在8月19日給法國外交部的報告說，“蘇將軍現被任命為駐廣州灣的帝國全權代表。如果我們的兵額立刻得到增加，我可預言這一措施乃是‘十全’的。”^③這就是說，畢盛已經預料到，在軍事壓力下，法國可以從這一賣國漢奸得到滿足。但帝國主義者卻沒有預料到，中國人民從1899年9月起，就展開了反對賣國投降與法帝武裝侵略的廣闊規模的鬥爭。

抗法義勇的組織，在赤泥嶺誓師後，群眾的鬥爭情緒，空前高漲。在愛國熱情鼓舞下，文車營義勇會於1899年8月下旬，向駐赤坎百姓村高嶺的法兵營，組織了一次八十人的夜襲，群眾持着火藥抬槍，在走近法兵營時，因燃火的香綫火滅了，再燃點時，為法兵警犬發覺狂吠，法兵開槍打傷義勇楊亞的腳，義勇見敵人已有戒備，始撤退回來。這是抗法義勇與敵人前哨戰的開始。

義勇團練，在8月初赤坎談判停頓後，操練更加辛勤，人民抗法的意志，更加高漲。起初，法帝

國主義以為各鄉舉辦團練，系烏合之眾，不堪一擊，當時未予以注意。竟有漢奸，向法水師提督獻計，說團練不擊散，對劃界必多障礙，在漢奸的出賣和慫恿下，法帝國主義於1899年10月9日（舊曆九月五日），組織了一次對義勇根據地黃略村的進攻。而在第一次進攻中，法帝國主義就運用了聲東擊西的陰謀。

在10月8日下午，法兵就放出謠言，說明日攻打麻章。當時練勇負責人馮紹琮聞訊，即向李鍾珪會報，并嚴加戒備。乃9日天明，法兵五百名（後據調查實不足二百名），用聲東擊西之計，潛由赤坎埠外渡河，經福建、東山等村，直趨黃略村背後，進行偷襲。當時黃略練勇，因為聽說法人攻打麻章的警信，即派出隊伍支援，走到新坡地方，遠遠看見法兵數百，在東面疾走，知道它必攻黃略，我軍即回村保護，行至中途，與法兵相遇，法兵首先開槍，我軍亦即開槍還擊。戰鬥打響後，黃略村的群眾，聞聲齊出支援，東路華封、平石，西路麻章練勇，皆趕來支援，法兵偷襲的陰謀未得逞，在我軍奮勇沖擊下，退至雙港村，我軍三面包圍，又退到海邊新埠地方，被我包圍在新埠，相持至下午，法軍由海頭派出援兵百餘，到福建村上岸，時已天黑，不敢接戰，乃掩護撤退回百姓嶺兵房。這一戰役，我軍戰士，表現出無比的英勇，當場殺死法兵八人，傷數十人，給法兵偷襲的陰謀，以嚴重的打擊，我軍犧牲二人，傷十五人。更重要的，是通過“新埠之戰”，挫折了敵人的銳氣，提高了抗法人民作戰的信心。

在遂溪人民給法帝國主義以正面的打擊後，本來是法帝國主義首先挑釁，而他反噬由李知縣所唆使的民兵的襲擊，法國海軍少將庫爾約耳，在海頭給法海軍部的報告，認為情勢是嚴重的，并準備占領赤坎作為反擊。而駐海頭法軍官龍基，寫信給李鍾珪，為他們10月9日的挑釁行為辯護，遭到李鍾珪義正辭嚴的駁斥。李鍾珪首先指出：10月9日之事，法方以為三畫官到麻林頭等處遊覽，去黃略甚遠，亦在百姓村圍內，并無逾越的謠言的無恥。李鍾珪函中說：“麻林頭在何處地方？詢之士人，皆稱不知，百姓村圍何時劃界，敝縣不知。且今界

① 李鍾珪：“且頑老人七十自叙”，第243頁。

② 法國外交文件（1898—1899）第22號。

③ 法國外交文件（1898—1899）第23號。

务未定，尺土皆我华界”^①。又指出“初五之事（指10月9日）先一日外間皆知明日打麻章，是以黃略練勇出械巡防，乃貴統帶用声东击西之計，密令三画官于初五天明，帶兵百余，暗从福建村間道直趨黃略村后，練勇在新坡望見，回村保护，貴兵即开枪打伤我多人，嗣后各团齐出救援，貴兵乃漸退至新埠。此当日之实在情形”。以严正的事实，駁斥了敌人无耻的謊言。又明确地指出：“如果游历，何必帶兵多名？何以不先知照徹县，若謂在百姓村围內，现在对仗之地，明明离百姓村十余里，此围以何地为界？何时划与貴国？令人不解。”^②彻底地駁斥敌人的无理侵略行为。最后对法帝欲用开花炮將各村“扫平”，并將李鍾珪支持人民的行为，參告到总理衙門的威脅語言，李鍾珪代表人民表示了严正的态度，說如果如此，是有意挑衅，祸患將更大。并且自豪地說：“徹县之不怕撤任參官，犹之百姓不怕开花炮也。”^③表示了中国人民的尊严和不可征服的意志。

在遂溪人民对法帝的侵略，进行英勇的反击时，苏元春尚未到广州灣，法帝国主义在遂溪人民抗法卫国的高漲情緒下，不敢妄动。一面进行造謠，說“两广总督，为了阻止新任就职，已組織了叛乱”^④；一面在9月29日向总理衙門提出了書面抗議，說苏元春迟迟其行，是不可容許的，并且威脅地說：“这种作法結果会使和解的締結更不容易，甚或不可能。”^⑤用公开决裂相要挟。总理衙門在10月1日复給毕盛的照会說苏元春已于9月16日离开北京，并同意电催他在一到上海后，即赶往广东，不再考察其他地方。这一卖国的“欽差”，果于10月18日到达海头。用李鍾珪的話來說：这位欽差大臣到海头，“所乘者法兵舰，所駐者法兵营，苏使此来，不啻一法国官員，余（李自称）在赤坎埠預备之行台，曾不一顧。”^⑥这位卖国贼来干什么勾当，已很显然的了。

对于李鍾珪领导遂溪人民，进行武装抗法的斗争，法人恨之刺骨，因为遂溪人民武装的严密戒备，团結一致，法人不敢輕易发动进攻，一面暗中增兵，一面放出空气，說苏軍門到，必不令李鍾珪躬身其間^⑦。果然，苏元春到了海头后，即不要李鍾珪前往，參預其事。苏元春到达海头后，即与法提督高礼睿开始卖国談判。在10月29日法国駐海口領事給法国外交部長的报告，很乐观地說：“苏將軍已經接受我們的定界”。他并說：“在談判終結以后，他將研究我們租借地周围的綏靖問題”。但在割讓碇洲島与东海島問題，統治階級內部引起

了严重的分裂。苏元春在談判中，出卖祖國領土，將东海、碇洲兩島讓与法国，遭到两广总督譚鍾麟坚决的反对，譚鍾麟打电报致总理衙門，認為“碇、东两島为五府商民出入必由之道，万不可輕弃”等語。当时清政府給苏元春一个电报，申斥他“办理此等重要事件，何以未与該督撫商明，遽行允許租界，草率迁就，殊屬冒昧。”^⑧并要譚鍾麟“与苏元春妥筹酌中办法，……务須彼此和衷，勿存意见。”^⑨譚鍾麟也另有电报給苏元春，說他將“两島租讓与法国，是未經授权的”^⑩。毕盛在11月3日給法国外交部的报告：認為“总理衙門这种态度是由于广州总督的新阴谋而产生的，因为他繼續制造紛乱，并煽动居民和慫恿中国政府抗拒我們”。但是苏元春的卖国，是有法帝国主义撑腰的。苏元春打电报給总署，說“碇、东两島，早为法兵所据，不肯作为通商口岸”，并說法兵“急欲进兵剿除黃略、麻章两村，以图报复”。并推諉地說“誠非口舌所能为力”。在这样情况下，清政府又軟下来了，在复电中把譚鍾麟申斥了一頓：說“譚鍾麟等身任地方，早应防患未然，保全疆土，岂得临时談諸議界大員？”又說“該督捍卫海疆，究竟有无把握？”又說“断非意气用事所能結束”^⑪。从这些电报的詞句中，我們可以看出清政权的腐朽与軟弱无力的卖国外交的实質。在談判將趋于决裂的时候，法国駐海防司令，打电报給海軍部長要求增兵，法国外交部立电印度支那总督，要求即派两营步兵到广州灣去，并且命毕盛向总理衙門对苏元春同意的協議不被批准問題提出抗議，并要求对受到袭击的行为，保留賠償的权利。这样，中法之間的形势，就趋于严重紧张的地步。

就在法帝积极增兵进行威脅的同时，遂溪人民进行了鋤奸运动。黃略营勇陈家輝，胆勇过人，他身怀短刀，乘夜冲入法占領区，探听軍情，并擒获汉奸六人，当场斩杀。又汉奸“李膏药士”（綽号），

①②③ 均见李鍾珪：“遂良存贖”——复法四画官龙基書，近代史資料1956年第4期，第33—34頁。

④ 法国外交文件（1898—1899）第27号。

⑤ 法国外交文件（1898—1899）第28号。

⑥ 李鍾珪：“且頑老人七十自叙”，第234頁。

⑦ 李鍾珪：“遂溪剿稿”油印本，第2頁。

⑧⑨ “清季外交史料”，卷140，第19—20頁。

⑩ 法国外交文件（1898—1899）第32号。

⑪ “清季外交史料”，卷141，第1頁。

假裝賣藥為名，乘一白馬徘徊打听消息。为陈家輝发现追击。在1899年10月24日，又組織了二十人，潛入赤坎埠，于夜晚暗藏路旁，暗杀了赤坎大汉奸潮州會館陳敬五（綽号八百五），这些事都大快人心。替法国人当翻譯的汉奸张逸亭的弟弟，帶領眷屬，在10月31日由雷州赴海头，路过鋪仔墟，因为当地人民对于汉奸张逸亭卖国的憤恨，同时已知道該处附近乡村已被割讓，因此把他的弟弟和眷屬扣留了。因为广泛的鋤奸运动，予法軍以打击，法帝乃准备全部占領赤坎，并向麻章練勇进攻，当时雷琼道周炳勛，逃上广玉兵輪，开往海头。法軍艦三只，駛至赤坎海面，在11月5日，发动了对遂溪人民的第二次进攻。而它的借口，就是扣留张通事（翻譯）的眷屬問題。

因为第一次战斗中，法兵受到了中国人民严重的反击，他們不敢正面进攻。首先在赤坎沙灣外，用軍艦大炮，轟击麻章，自早至午，放了二百六十余炮，然后派兵四百余人，从“洪屋下”及“官曲村”两路进攻麻章，麻章練勇英勇地予以反击，法軍又在高嶺，开放排炮和开花炮轟击，因为練勇都伏在牛車路坎內（遂溪牛車路坎高大，可以藏人，調查者曾目击），未被击伤。而此时黃略义勇，东路平石、华封义勇，南路志滿义勇，俱聞炮声赶到，我軍士气大振，各营練勇，用抬枪分排遙击，法軍死伤甚多，战至下午六时，法軍大敗潰退，逃回百姓嶺营房，我軍追击数里后，获全胜收兵，这是遂溪人民抗法斗争中最重大的胜利，这一战役，法軍陣亡八名，內有一画軍官一員，伤五六十人。又軍艦开炮时，炮身炸裂，死伤十余人。而我軍仅黃略伤五人，內二人伤重，麻章四人，俱輕伤，其余各营，未伤一人。胜利的主要原因，是各村人民的爱国热誠，團結一致，不怕牺牲，巧妙地运用地形和路边車坎作战，敌人不知練勇所在，而大炮、开花炮，又都冒过，轟击的效果不大，麻章仅仅损坏民房五間。因此到11月7日，法軍艦只好垂头丧气地开回海头，把兵和炮亦調回海头去。这一战的影响非常巨大，它使得敌人不敢輕視遂溪人民武装的力量，只得施用阴谋，对人民武装进行分化和破坏。

首先是作为中国“欽差大臣”的苏元春，他駐在海头，对于法兵进攻麻章，他不一言，但法軍打败后，又出面打电报給李鍾珪，說只要將张通事眷屬吊出，即可息事，并誣蔑团練为妄行械斗。李鍾珪在复苏元春的电文中說：“法人来打，（百姓）亦不能束手待斃”。予以严正的駁斥^①。关于释放张眷問題，因为鋪仔墟百姓，扣留作为人質，只要

法兵不打該村，即可放出。后因苏元春派委員来，經過李鍾珪說服，张眷于11月8日释放。到11月12日，法軍又組織对平石村的进攻。首先由被法軍占領的門头炮台，开炮向平石村轟击。然后法軍多人，渡海向平石村攻击，遭遇到义勇坚强的抵抗，当场击斃法一画、二画軍官各一名，并被練勇取首报功，平石村义勇，只伤三人。这一事件，引起法帝的惱羞成怒，認為中国民兵杀害了他們的軍官，遂派人到广玉兵輪上，強將雷琼道周炳勛，參將陳良杰扣留，作为人質^②，并特加渲染地向我国总理衙門，提出严重的抗議，說法軍艦“笛卡兒号”官員是在門头散步时被杀害的^③，以掩飾它向中国人民进攻的罪行。法国外交部并命毕盛向总理衙門提出抗議和下列要求：（一）广州灣勘定租界，即行批准；（二）事由遂溪县主使，即作凶犯看待，应將知县并团丁凶手，均即正法；（三）被害者首級，尚在遂溪县署，应即送还；（四）解决广东省交涉各种积案。毕盛在11月18日致法外交部的报告，明确指出，“应该負責的官員就是知县和总督，因为总督反对我們（法帝自称）一再提出的控訴而支持了知县”^④。在清政府接到抗議后躊躇期間，11月28日毕盛又致总理衙門照会：“前案各节，未允照办，应再行加重”^⑤。到12月5日，毕盛又向总署提出，“撫恤”被害者家屬銀二十万法郎，并將两广总督即行革职^⑥。又提出工业租讓的要求：（1）从广州灣至安鋪的鉄路綫建筑权。（2）高、廉、雷三州矿山的开采权。这时，正值中国新任駐法公使裕庚至巴黎，法政府拒絕接受国書，以为要挟。而在12月8日法国外交部給毕盛的訓令，要他必須“坚持貶黜知县和撤換总督”^⑦。在这严重情况下，腐朽的清政府，手足无措，总理衙門首先把責任推到譚鍾麟身上，要他严緝平石凶犯，并將遂溪县李鍾珪，先予参办。而譚鍾麟在这一問題上尚稍有民族立场，他复电給总署說：“查法弁于門头开炮攻击之际，帶領多人前赴平石，显系往打該村，致被杀害，实所自取。即使謂为游历，当界議未定之时，亦不应往；且地方官未据知会，更不能任保护之責。李令相距数十里，法使謂

① 李鍾珪：“遂溪剿稿”油印本，第4頁。

② 同上，第5頁。

③④ 法国外交文件（1898—1899）第39号。

⑤⑥ “清季外交史料”，卷141，第10—13頁。

⑦ 法国外交文件（1898—1899）第43号。

戕二法弁系該令护勇团丁所为，殊屬有意誣陷；鈞署拟先令参处，固为曲合起见，唯麟等实无詞可措，請由鈞署酌办。”^①这样的反駁，而且明白地指責总署办外交，是曲合外人意旨，便更扩大了統治階級之間的矛盾；清政府为了維持其腐朽政权和对外卖国投降，自然不能容許部屬异己者的反抗，因此，在法帝的压力下，清政府答应了法帝的全部要求。在12月16日毕盛拍給法国外交部的电报，报告广州灣事件，已經接近获得全部滿意。在12月20日和25日給法外交部的报告中，提供了全部內容：两广总督譚鍾麟被免职，大卖国贼李鸿章被任为两广总督；遂溪县知事，已經受到貶黜处分；划界协定一到北京，即請皇帝批准；安鋪鐵路附近公有或无主土地，全部讓与；高、雷、廉三屬矿山，租給法华公司；逮捕和处决杀害法軍官二名凶手的命令，业已发布；中国賠償被害者家屬二十万法郎^②。这些要求的被全部承允，正說明了清政府对法帝国主义的彻底投降，虽然个别統治者有不同的意见，甚至有稍具民族正义感主张抗法保家的官僚紳士存在，但为了剝削階級的本身利益，它是不容許异己的意见存在的。至于人民的流血牺牲，祖国領土主权的丧失，自然更在这一班卖国贼“考虑”之列了。

就在清政府进行卖国談判的同时，苏元春以“免得法人得步进步”为借口，奏报在11月16日与法海軍提督高礼睿，簽訂卖国的划界协定：“广州灣租界条約”。主要內容，包括下列各項：

(1) 广州灣租借期間九十九年。

(2) 东海、南洲两大島，仍然租讓，只是退出麻章、黄略、新埠三村，与吳川县屬黄坡、石門、三柏等村。赤坎、新墟、志滿皆划入租界。

(3) 所租地归法国一国享用。

(4) 法在租界內可筑炮台、駐兵并設备防守。

(5) 准法国由赤坎至安鋪建筑鐵路，鐵路沿綫所用土地，由法国給价，凡鐵路及电綫所抵之处，准許法国在水面岸上，造屋停船。

就在簽訂这划界协定的前一天，卖国汉奸苏元春还帮助法帝国主义进行了一次极为狠毒的阴謀。那就是法帝国主义，准备对黄略村义勇，进行一次报复性的进攻，而在11月15日晚間，由苏元春出面，命他的隨員黃輔文，用苏元春名义，写信至麻章練勇领导亦即团練总领导人馮紹琮謂：“奉軍門諭（指苏元春）界务已定，赤坎归法，黄略、麻章屬华，即日勘界，各团不得执械出队，致滋事端”^③。馮紹琮当即把情况会报給李鍾珪，原来，麻

章、黄略、文車三营每日清晨都出队至赤坎巡哨，这时馮、李会商决定，既然苏軍門有此通知，遂飞知各营，各守各地，靜候勘界，不必开往赤坎。不知这样正中敌人分散力量，各个击破的阴謀，更重要的，是敌人不但借苏元春口，說出假消息，作卑鄙阴險的偷袭，而且“各守各地”的命令，彼此不相救应，使群众怀疑練勇领导人通敌卖国，而引起內部的分裂；这一非常恶毒的，瓦解我軍斗志，分化練勇团結的阴謀，是通过苏元春一手制造出来的。

为广大义勇所預料不及的这一次大规模的进攻，在1899年11月16日清晨开始，法兵先以火炮轟击麻章墟，并以少数人佯攻麻章，以牽制麻章的練勇不敢他往。而以大队八百余人，分三路进攻黄略，来势极为凶猛，黄略义勇大半在田間割禾，聞警仓卒抵御，原只有練勇三百五十人，助战村民，也不足五百人^④，在众寡悬殊，敌人炮火极猛的情况下，黄略村人民，发揮了英勇无畏的精神，浴血抗战，从侵晓战至八时，牺牲很大，退回新埠、陈村仔一帶，在泥溝炮壘中坚持作战。当时滿望西路麻章救应，总不见到。麻章、志滿两营，为敌人炮火威脅，停留在赤泥嶺，不敢前进。只文車营在哨官杨秀湘率領下，坚决前来支援黄略，在九东地方，为敌人攔截，杨秀湘手骨被击碎，仍然坚持指揮作战，后因伤重，抬下火綫^⑤。李鍾珪当时聞訊，面悬駐在万年桥高州鎮馬介堂部下潮勇数百名，前往黄略救援，这些腐敗的官兵，迟迟出队，及到黄略，已下午二时，敌人用开花炮轟击村中起火焚烧，潮勇不敢前进。这时敌人已至厚田嶺头二层案山，接近黄略村，在众寡悬殊，死伤惨重的情况下，黄略义勇乃下令先疏散老幼，然后义勇向遂溪县城撤退，下午四时，黄略村遂为敌人暂时占領。虽然在战斗中遭受到严重的挫折和重大的牺牲，但黄略村人民英勇地抵抗敌人的惨酷的进攻，已尽了当时最大的力量。不分老幼男女，浴血抗战，除牺牲者外，全部撤退出村，无一人甘作亡国奴。

在这一战斗中，黄略村哨官王喜卿、王明卿、王炳章，文車营哨官杨秀湘等，为国捐軀。黄略义

① “清季外交史料”，卷141，第8—9頁。

② 法国外交文件（1898—1899）第48号。

③④ 李鍾珪：“遂良存牘”——“稟陈法人設計攻破黄略村，旋即收复事”，近代史資料1956年第4期，第37頁、149頁。

⑤ 王国强：“遂溪、湛江人民抗法斗争史料”打印本，第12頁。

勇战死六十九名，伤一百二十五名。文事义勇战死十八名。黄略村居民住屋被焚毁千余间，十去其六，牺牲惨重，可见当时黄略村人民英勇抵抗的激烈。在黄略淪陷后，当时黄略村公局长王緝堂事先逃往廉江，被李鍾珪下令追回，并調各路練勇来城，于17日（旧历十月十五日）清晨反攻黄略，法兵退至赤坎，黄略村遂又光复。李鍾珪积极主持救死扶伤和撫恤的工作，他发电致广州請款賑济，努力做善后的工作，并給死者家屬以撫恤，伤者以治疗。他在給上級的报告中，回溯这次惨痛的教訓，已初步認識到敌人的阴謀。他說：

“自开办团練以来，严加約束，各团紳士勇丁，莫不听命，从未輕到法兵房左近‘滋事肇衅’。乃法人心怀嫉忌，屢次構兵，尤以黄略族大人众，百計攻取，此次竟誣苏軍門隨員写信，以懈众心，出不意以攻无备，其謀至狡，其心亦至狠。但苏軍門駐节海头，屢任法人攻打村墟，絕不阻止，誠不解其何故。”①

遂溪人民抗法武装的存在，为帝国主义所嫉視，这是事实，李鍾珪当然不能进一步認識苏元春代表統治階級利益与帝国主义相勾結这一丑惡本質。虽然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但李鍾珪领导人民积极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一点是應該肯定的。他在被撤职后，未离遂溪之前，拒絕参預苏元春的勘界工作，他并把团練重行整頓，認為今后法帝侵略野心不可遏止，“遂溪东南团練，非唯不散，尤当极力整頓”。他把过去两营并为一营：志滿麻章并为一营，华封黄略并为一营，挑选有智謀之营官哨官，并換新式武器。这些都表现他不畏权势，和重視人民利益的地方。因此他虽然被清政府撤职，法帝国主义甚至悬出賞格要暗害他。但他在离开遂溪时，得到人民的热烈欢送，并且在抗法老人的回忆中，至今留下“李官好”的口碑。

就在黄略村被敌兵攻陷的那一天晚上，卖国贼苏元春与法帝国主义就“广州灣租約”签了字。以阴险的偷袭，和人民的血作代价，为向帝国主义投降的“献礼”，充分說明封建統治者卑鄙卖国到如何的程度！但人民的血不是白流的，遂溪人民反抗法帝国主义侵略广州灣地区的斗争，迫使法帝国主义自动縮小了租借的范围，从最初的要求方圆一百数十里的租借区，縮小为三十里左右（指陆上），从距遂溪县城不远的万年桥为界，縮小至离城四十里的赤坎埠寸金桥为界，“寸土必爭”，“一寸河山一寸金”，說明了人民反侵略斗争的意志。遂溪人民反

抗法帝国主义英勇斗争的史实，正如其他革命史实一样，教育了广大人民，認識到不推翻封建統治者与帝国主义势力这两座大山的压迫，而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是永无翻身之日的。而抗法斗争五十八年后的今日，湛江、遂溪人民正沐浴在解放了的伟大祖国的幸福的阳光下，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六 結 語

1898—1899年广东遂溪人民反抗法帝国主义侵略广州灣地区的英勇斗争，是在十九世紀末叶，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所爆发的一次人民反帝运动，它具有广闊的规模和深远的影响。首先它是在帝国主义力謀瓜分中国領土时期，在中国的南方，所树立起来的第一面反抗的旗帜！它虽然爆发在广东省遂溪县，而斗争的意义，决不限于广东。因为在割地狂潮时期，帝国主义者紛紛掠夺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在清政府卖国投降政策鼓舞下，簡直成为“狂瀾”，莫可遏止；而遂溪人民反抗法帝国主义侵略广州灣地区的斗争，是对所有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的一次有力打击和严重的警告；那就是說，广大的中国人民，不能容許侵略者这样做；遂溪人民以自己的行动，针对帝国主义瓜分阴謀，进行坚决的斗争，而当时的情况，如列宁所指出：

“欧洲各国政府，已經开始瓜分中国了，不过他們开始不是公开地瓜分，而是象偷窃賊一样鬼鬼祟祟地瓜分。”对帝国主义的强盗行为，遂溪人民以自己的鮮血，为保卫祖国的領土主权而直接給帝国主义者以严重的打击。因此，这一斗争的性質，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領土主权的爱国主义的正义斗争，它是在义和团反帝运动之前，全国人民反帝斗争的一部分，是中国南方人民与北方人民相呼应的英勇行动，它是繼承着鴉片战争以来广东人民反侵略的光荣传统的又一次英勇斗争，因此它在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历史上，应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亚洲人民反殖民主义斗争的历史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遂溪人民反抗法帝国主义斗争的过程中，亦可以說明这一斗争的严重意义，首先帝国主义侵略的野心，决不以租借一港一灣为滿足，在清政府出

① 李鍾珪：“遂良存贖”——“稟陈法人設計攻破黄略村，旋即收复事”，近代史資料1956年第4期，第38頁。

卖国家主权予取予求的情况下，更助长了帝国主义的贪欲。在法帝国主义取得云南、广东、广西三省不割让予其他国家的许诺后，这三省就成为它的势力范围，进一步取得矿山开采权，而借停船囤煤为名，又强迫租借广州湾，并进行武装占领，强迫当地政府交出行政权。由此可见，帝国主义所谓租借地，不过是一个侵略的触角，如果遂溪人民不奋起抗战的话，则得寸进尺的帝国主义野心，决不可遏止，因此情势的严重性，不仅是租借广州湾问题；遂溪人民的斗争矛头，虽然指向直接侵略的法帝国主义，但其意义，也决不限于法帝国主义。根据这样的理解，我们说：1898—1899年广东遂溪人民的抗法斗争，它阻遏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割地狂潮的发展，并直接打击了法帝国主义，阻遏了法帝国主义势力向中国西南各省的扩展，因此它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这一斗争所以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与斗争本身的广泛的群众基础是分不开的。斗争的领导权虽然掌握在一部分具有民族意识的地方官吏和士绅手里，但其组织的群众基础，是广大的人民，而且是在广大人民有迫切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要求下，县和乡的统治者，才被迫出而领导，因此斗争是由群众所发动，由群众直接参加，特别是具有民族斗争传统的三点会员，在群众中起了主导的作用。因此遂溪人民抗法斗争，是广大人民的反帝运动，它代表全民的利益，团结一致地与帝国主义进行英勇的搏斗。

从斗争的经过，亦可以使我們明确地见到，统治者与人民对帝国主义者两种不同的态度和两条路线的斗争，那就是统治者的卖国投降路线，与人民的爱国抗敌的路线，随着斗争的深入，统治阶层内部也起了分化，遂溪人民抗法斗争，其不同于其他的反侵略斗争，主要是得到统治阶级某些上层人物的支持，从两广总督谭钟麟、广东巡抚鹿传霖，到遂溪知县李钟珩，地方绅士代表人物冯绍宗、王緝堂，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这一斗争或直接领导人民抗法运动，其中李钟珩尤为突出。他不仅直接领导这一斗争，加强人民武装的组织训练工作，并且始终不懈地坚持民族立场，反对苏元春卖国行为，直至自己被罢黜，仍然对人民武装做了一些善后工作，充分说明了他在遂溪人民抗法运动中所起的巨大作用。虽然在某些问题的处理上，他仍然是站在

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立场，但重要的是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他能把民族的利益放在主要的地位，他的爱国主义的光辉行动是应该肯定的。统治阶级中部分人物所以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人民抗法运动，是与当时国内形势分不开的，在帝国主义层层进逼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情况下，统治阶级中部分官僚，与封建地主阶级向新兴资产阶级转化的一些代表人物，在中法、中日战争后，在政治上都有了革新要求，而这种要求，在一定时期内，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与反帝爱国运动相结合的。遂溪人民抗法运动，所以能表现出官、绅、民一致的特点，是与当时政治社会情况特别是1898年“百日维新”运动的政治影响有一定关系的。但另一方面，人民大众与统治者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始终是基本的矛盾。因此在帝国主义与统治者相互勾结的情况下，人民的局部的反抗运动，还是要遭受到暂时的失败。

遂溪人民的抗法斗争，从其组织的规模和斗争的长期性说来，在广东人民反帝运动的历史上，是很突出的。因为它有坚强的组织，经过一定的训练，并且从自发的斗争到有组织的武装反抗，前后经过一年半之久，虽然武器比较差，但作战非常勇敢，在与法帝作战的三大战役，除最后黄略村之战，因为中了敌人阴谋而失败外，其余每次都得到胜利，并在作战中锻炼了自己，阻遏了敌人的扩展，不使它越雷池一步，这些事迹，写下了中国近代史的光辉的一页。三元里人民的反英斗争，虽然也给英帝以打击，但从武装斗争的规模和坚持的长期性说来，遂溪人民武装，在这方面，却显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遂溪人民的抗法斗争，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虽然暂时地被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联合势力所镇压。但它阻遏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瓜分中国的凶焰，打击了法帝国主义，缩小它侵占广州湾的范围，表现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决心与不可征服的坚强意志，表现了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崇高品质。

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人民不仅收复了广州湾，并且正把湛江市建设成为祖国南方大港。湛江、遂溪人民，将永远纪念抗法斗争的先烈；并且永远学习他们不惜牺牲坚决维护领土主权的爱国主义的崇高品质。遂溪人民抗法斗争先烈永垂不朽。

稿 約

(一) 本刊欢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投稿。

(二) 本刊欢迎下列稿件：

1. 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观点和社会科学原理闡述我国当前政治上，思想上，学术上的重要問題；

2. 批判資产階級的哲学思想、社会科学理論等方面的研究論文；

3. 通俗闡明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和社会科学基本問題的著作；

4. 华南地区的科学研究資料和学术性調查材料；

5. 国内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的評介。

(三) 本刊文字以語体文为主，稿長一般不超过一万字。来稿請用稿紙謄写清楚，并示詳細地址。不拟采用稿件，負責退还。

(四) 来稿发表后，即奉稿酬。

(五) 来稿請寄：广州市德宣西路广东科学館內理論与实践編輯部。

理 論 与 实 踐

月 刊

1958年第2期(总第2期)

編輯者：理論与实践編委会
广州德宣西路广东科学館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大南路43号

1958年2月15日出版

印刷者：广东人民印刷厂

发行者：广东省广州市邮局

預訂处：全国各地邮电局、所